GJWTCKYC
国际问题参考译丛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Geopolitics

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

【英】杰弗里·帕克 著
GEOFFREY PARKER

刘从德 译

新华出版社



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源于19世纪后期，一开始就引发了极大的争论。原因就在于它主张介入国家政策的现实事务，因而导致了学界的特别关注。一战后，地缘政治学在德国深深卷入国家政策的制定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涉足其领土扩展政策的合理化和计划的制定，以及使纳粹在欧洲居于统治地位的宣传合法化。基于此，二战后的德国地缘政治学说连同纳粹主义意识形态武库中的其他内容统统遭到唾弃。

地缘政治学的复活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新地缘政治学发端于美国和法国。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将地缘政治学说引进其有关外交政策的论述中。因此，地缘政治学很快进入美国已确立的政治和国际关系词汇中。本书即是对地缘政治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探讨。

ISBN 7-5011-6056-2
9 787501 160563 >

责任编辑　王国荣
装帧设计　肖　东

ISBN 7-5011-6056-2/D·957
定价：18.00元

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

〔英〕杰弗里·帕克 著
刘从德 译
石 挺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英）帕克著；刘从德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1
（国际问题参考译丛） ISBN 7－5011－6056－2
Ⅰ．地… Ⅱ．①帕…②刘… Ⅲ．政治地理学 Ⅳ．K90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104562号
京权图字：01—2001—1627号

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
〔英〕杰弗里·帕克 著
刘从德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http://xhcbs.126.com
中国新闻书店：（010）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40千字
2003年1月第一版 2003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056－2/D·957 定价：18.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010）65895562 65897685

国际问题参考译丛

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
【英】杰弗里·帕克　著

八十年危机：1919—1999年的国际关系
【英】提莫·邓恩／蒂切尔·考克斯／肯·布斯 主编

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和自卫队
【美】彼得·卡赞斯坦　著

美国学者解读中国安全
【美】迈克尔·皮尔斯伯里　著

反恐时代
【英】彼得·哈克莱罗德　著

生死巴尔干
【黑山】巴托·托马舍维奇　著

大象和孔雀——解读印度大战略
【美】斯蒂芬·科亨　著

变——日本变局将如何改变世界均势
【美】米尔顿·埃兹拉蒂　著

目 录

第一章

时代的术语：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

保尔·克拉维尔（Paul Claval）在 1994 年写道："地缘政治学是时髦的术语（à la mode）"，而意识形态则变为了"过时的术语（passèes de mode）"。现在风向已变：二战以来在精神生活中经历数十年的实际禁锢后，地缘政治学复活了。克拉维尔认为这一命运的转变缘于世界态势的变迁，因为冷战已趋于终结，国际舞台的新轮廓开始成型。克拉维尔断言，伴随超级大国对抗的结束，东欧集团的崩溃已滋生了一种氛围，其中"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问题的反映显得更为重要"。

"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源于 19 世纪后期，一开始就引发了极大的争论。原因就在于它主张介入国家政策的现实事务，因而导致了学界的特别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地缘政治学在德国

深深卷人了国家政策的制定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涉足其领土扩展政策的合理化和计划的制定，以及使纳粹在欧洲居于统治地位的宣传合法化。基于此，二战后的德国地缘政治学说（Geopolitik），连同纳粹主义意识形态武库中的其他内容统统遭到唾弃。这必然会对这一主题的其他方面产生负面影响，此种境况殃及了整整一代人。

地缘政治学的复活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新地缘政治学”（new geopolitics）发端于美国和法国。就前者而言，特别是与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密不可分，他将地缘政治学说引进其有关外交政策的论述中。正是由于基辛格的认可，地缘政治学，连同其形容词“地缘政治的”，很快进人了美国已确立的政治和国际关系词汇中；在法国，大约也是在同一时期，地缘政治学由拉考斯特（Yves Lacoste）领导的一支新的政治地理学派予以了重新介绍，这集中反映在《希罗多德杂志》（Hèrodote）中，而也正是当地缘政治学重新获得其学术资格后，才在法国进人了一般的政治词汇中①。

地缘政治学在这一特定时期复活的缘由可追溯为政治语义学和国际关系粘合过程中的某种不经意的创举。从语义学上而言，它是一个表述了政治行为和这种行为产生的地球环境间的某种特殊关系的术语。我们或许可以像伏尔

---

① 亨利·基辛格从1969年至1975年担任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手，从1973年至1977年间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使用地缘政治一词旨在强调日益增长的世界多样性，以及他认为在大国对抗情形下分析美国全部外交政策时非现实主义的方法。

1968年产生学术争鸣时，法国地缘政治学重新兴起。这集中反应在Y·拉考斯特编辑的《希罗多德杂志》中，第一期发行于1976年。这一期刊的副标题是“战略”、“地理学”和“意识形态”，但在1983年更名为“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评论”。

泰对上帝进行臆断一样作出这种推断，如若20世纪70年代没有地缘政治学，似乎有必要发明一个或找到一个与之极为类似的东西。到了20世纪80年代，政治家，新闻工作者，商人以及法语和英语世界的学者们都在他们涉及从全球变暖到跨国公司论题的演讲、论文和著作中塞进这一词。的确，在如此多变的境况下，其确切的含义或者说其与特定情势的关系常常会模糊不清。然而，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或许正是这种模棱两可使之具有了一种独特的魅力。在任何特定的条件下，其确定的含义似乎更符合这样的事实：它是那些本能地觉得与其时代相关的术语中的一种；它正可谓是反映现实呼声的术语。它是一种顺应时代的术语。

如果说地缘政治学已变为时髦术语的事实可在一定程度上由国际形势的彻底转换来加以解释的话，那么，更为有意义的是，在人类及其地理环境间的全部关系的认知方面业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包罗一切，因而其词义实际已发生整体变异。20世纪70年代以来，将人类视为是能操纵自然的“主宰”的思想，逐步被认为人类只是整体环境中的“参加者”的思想所取代，其倡导爱护和尊重自然界。这一认识表明，全球生态系统是一种脆弱而又完美的平衡系统，极易遭致无法弥补的毁坏。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早期的工业进步，尤其是那些与能源供应相联系的工业以及因此发展而导致的内燃机的广泛运用，十分清楚地表明，必须寻求一种根本的改善途径来阻止显然正在加速的环境恶化。显而易见，观念已经发

生转变，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认为人类无所不能的观念已让位于更具长远意义的认识，即人类除了能够毁灭这个星球以外别无所能。这正是约翰逊（Johnson）和泰勒（Taylor）所言的“危机中的世界”形势的实质之所在。

这些新观念导致的后果在于，操纵环境的政治让位于爱护环境的政治。如果说这对于20世纪早期居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而言是一场变革的话，那么从地理哲学的意义上看则并非如此。整体词义的变异使地理学思想中的人境关系理论显得尤为突出。人类越来越认识到其成功的活动必然受制于环境，必须认识其局限性和可能性。对环境的这一认知原本就存在于本世纪上半叶由法国维达尔地理学派发展和完善的“或然论”中。这一理论认为，整体的人类行为受环境所提供的可能性的制约，成就的获得仅仅取决于从这些可能性中作出正确抉择，而不是试图置之不理。[①] 正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所言，要征服自然必须先尊重它。这正是20世纪大部分时期里那些将“发展”视为一切，而“自然”只不过是在等待“改造”使之对造世主更为有用的人们所遗忘和忽略的东西。

冷战结束以来，对地球的清醒认识日渐增强，这既表现在直接的环境保护方面，也体现在对政治决策应充当的

① 维达尔学派指的是20世纪早期由保罗·维达尔（Paul Vidal de la Blache）所创立的法国地理学派思想，其最基本的理论是环境“或然论”，现实的环境包括有很多可供人类选择的可能性。这一思想与环境决定论针锋相对，环境决定论断言，地理环境决定人类所为，并无真正的选择，人类只有适应环境并在其约束下行动。地缘政治学中的或然论和环境决定论将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作详细的论述。

重要角色的认识方面。半个世纪里被统统冠以了“发展”标签的人类的众多活动所导致的明显毁灭，加上诸如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之类的事件，实际已经加剧了对人类整体发展方向的忧虑。大多显然应归咎于人类活动的环境恶化，促进了对星球是根本的统一体和邦吉（Bunge）所言的“人类空间的毁灭”的危险的认识。因此，唯有通过集体的行动才能阻止这种毁灭，而且，在当今世界，这意味着必然是一种全球范围的行动。邦吉断言：“这个星球对和平而言并不太小，但对战争而言则过于狭小”。

所以，整体词义变异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地球科学凸现出来，这已充分说明“地缘的”成为了知识界的一个口头禅。在某个特定的言论背景中，它作为前缀强调了对环境保护的认识，而作为政治学的前缀则隐含着政治行为必须考虑在全球范围。

最近地缘政治学命运的广泛复兴表现出与过去劫然不同的情形。布鲁恩（Brunn）和明斯特（Mingst）断言：“在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所有问题中，或许还没有那一个像地缘政治学这样引发如此之多的争论”。祂们将之归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所受到的操纵，20世纪40年代以来这一点已被广为接受。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但并非事情的全部。尽管地缘政治学在学术界遭唾弃的直接原因无疑根源于其与纳粹的联系，但导致疑惑的更长久的原因还有许多。要想了解如此情形何以产生，弄清楚这一问题异乎寻常的学术连系十分必要。地缘政治学源于分离的双亲——政治科学和地理学——起初这两种学科都将之视为对

方的一个私生子。此种尴尬的情形意味着因权宜之计似乎应将它丢弃时它就可能——而且曾经——遭一方或双方的遗弃。当那些反对它的地理学家们借口其更具政治学色彩而非地理学色彩大动干戈时，政治科学家们则极不情愿地要将地理因素作为政治学的核心来对待。虽然拿破仑（Napoleon）断定国家政策取决于其地理的名言得到了广泛认可，但这决非意味着他们已承认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决策中蕴含了这一点。两门学科都在他们的言论中兼容了对方的某些方面，但又极不愿认同一个他们共享的独立的分支学科。[①] “地缘政治学”一词最初虽是由一个政治学家锻造出笼的，然而一开始它更受地理学家们的青睐，尽管它处于争论之中，但是这些地理学家仍然视之为政治地理学的一部分，即使他们唯一的目的在于推翻其可靠性。在他们所表露出的对其令人不安的特性的关注背后，隐含着对它可能会对地理学传统的实践活动带来危害和潜在的重要性的一种忧虑。（见第二章）

政治地理学家们所表现出来的怀疑集中于这一主题的根本性质和目的问题上。在20世纪上半叶，地缘政治学就如大多西方地理学家所理解的那样包含着为国家目的而运用地理学知识的内容。[②] 因此，就使它受制于国家的操纵，并使他们试图实施的那些特殊政策合法化。正是由于

① 本世纪早期许多地理学者完全否认政治地理学是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这一思想在法国学界尤为盛行。维达尔本人坚持认为人文地理学是一个整体，而政治方面只是一个构成部分。因此，政治地理学也只有在整体框架中才能被真正理解。维达尔的学生琼·布伦赫斯轻蔑地称作为“所谓”的政治地理学，他实际上将它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一部分。

② 当时最重要的西方政治地理学学派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学派，这里所指的主要是这些流派的影响。

被理解为与政策制定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以致于哈罗德·斯普劳特（Harold Sprout）将之贬为实质上的"地缘政策"（geo－policy），因而缺乏一门学科所期望的客观性。至于在二战前夕写作的德温特·惠特尔西（Derwent Whittlesey），他认为地理政治学研究的是地球与国家间的关系，因而在国家本身之间的关系中有必要包含地理的方面。惠特尔西使用"地缘政治的"（geopolitical）一词作为政治地理学的形容词。他写道："简而言之，其主题就是地缘政治的式样与结构。"他认为"地缘政治的"是一个"紧缩形容词"，远胜于"臃肿的'政治地理的'（politico－geographical）"。然而，他同时又认为他所言的"众所周知的地缘政治学教义"旨在"使政治地理学服务于这一或那一特定国家的目的"。理查德·哈茨霍恩（Richard Hartshorne）在他的出版于同一灾难之年的巨著《地理学的性质》（The Nature of Geography）中将政治地理学十分简单地定义为"国家之地理学"，以此区别于他所谈论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的特殊领域……其中地理学……被利用于超越了知识本身所追求的特殊目的。"因此，在哈特向看来，地理政治学是涉及人类空间活动的政治方面的所有内容的严肃学科。正因为如此，它被看成是"纯洁的"学科，截然不同于为政治和政客们的需要而亵渎自身的"不纯的"学科。哈特向的总体结论在于，他认为地缘政治学无法成为"地理学的主要方面之一"。他也十分清楚这是同一时期地理学家们普遍持有的观点。他断言："Geopolitik 能够成为政治地理学的合适的替代品，然而很难为德国以外的

地理学家或政治学家所接受，即使在德国国内实际也极少被政治地理学家所认可。”

自那以后，一切都已改变。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地理学与政治学界的新一代重新启用地缘政治学，并把它带回到国际论坛的核心地位。此次重新启用涉及追溯其纳粹之前的源起，因而能够对其学科地位进行全面的再评估。其结果在于，它不仅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围，而且也使进一步探索政治学与地球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这是研究当代世界问题的主题之一。政治科学与地球科学交会于地缘政治学，它所释放出的崭新光芒成为了增添其合法性的要素之一。因此，它已变得与“传统的”政治地理学截然不同，这并非是因为其客观性的问题，而是缘于其内容、方法论和宗旨的真正差异。如果说地缘政治学确实值得冠以“新”字，那么这个复合词的两部分实际上意味着其一贯所为。因而其实践的中心目的在于“拯救地缘政治学之传统”，为此必须将之与国家及其政策分离开来。

本书所运用的地缘政治学基本概念旨在简化源于空间和地理学观念的国际关系研究。因此它是基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特别是在美国、法国和英国得到发展的“新”地缘政治学。这无疑包括20世纪40至70年代期间被归于政治地理学一般领域的很多内容。地缘政治学的主要分析手段是政治地图，其方法则包含于对其特性的考证之中，借此理解其所揭示的现象和滋生其形态的过程。世界政治舞台的各组成部分被视为空间客体，其相互作用构

成空间现象。研究的目的在于解释这些空间客体作为整体组成部分的行为及相互作用，其所要达到的根本目标在于了解整体地缘政治空间和任何既定时间里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过程。这一研究必须形成整体，因为如若试图考察和解释地理空间特殊客体的行为特征，就有必要考虑这些客体功能的众多差异点。

传统地理学的研究集中于分析诸如气候、自然资源和地貌等地理因素对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地缘政治学的涉及面则更宽泛、更全面。地理空间被看成是一个整体，而在更为传统的地理学观点中被视为现存“要素”的现象的存在构成了这一整体的组成部分。所以，其研究的方式就在于对整体中地缘政治客体的剖析。基于此，地缘政治学分析可谓包容全部，而本质上看来，局部和特殊的现象就被归于对其所构成的整体的解释中了。

因此，对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的理解必然涉及对这些处于相互作用的整体分析。内在的原因就在于其空间特征自然而然抖露其行为的根源。这些整体行为模式共同构成地缘政治空间的总和。

地缘政治分析被分为三个阶段进行。首先是对基本空间客体自身特征的考察；其次要探视空间客体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空间模式，这包括对不同地理空间区域中相互作用模式差异性的观察；最后是将地缘政治空间作为一个整体的分析，从而确立对其全部特征的判断。这就是世界政治地图，其显现出的内涵构成了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最终研究阶段及根本目的。地缘政治观的“内

涵"，包括了对总体上谓之"秩序"所赋予的不断重复的行为模式的探究。关键问题是，这种对秩序的探究受制于客观的因素，并不像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始终构成对特殊国家空间利益的长久抑制。这就是地缘政治学为了全球的整体利益而不是某些特殊部分的利益而"再生"的根本。

可见，地缘政治学的具体运用与其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大相径庭。由于这一区分在过去并不明了，因而，涉及地缘政治学的众多方面都是附和了斯普劳特（Sprout）的观点，即它是"地缘政策"（Geo - policy）。然而，实际上，地缘政治学以一种实用的方式被分析和研究并非其真正的最大问题，从唯理的观点来看，真正的问题在于其研究和运用之间缺乏一个明确的区分。这一分支学科的命运已经受制于那些从事这一研究的人的目的，他们因而已经找到他们所要寻找的东西，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政治部长们要求他们所找寻的东西，这样，学术真理与政治野心搅和在了一起，严谨的学术成了国家目标的牺牲品。

事实上，过错并不在于实用的地缘政治学科，而在于对任何学科知识而言实用的方式。解剖学的奇异观点就提倡只对人体进行独有的学术研究而不付诸实践运用。但是对于哈特向来说，地缘政治学是"地理学在政治中的运用"，同时，他还断定"其价值及重要性的评估取决于它服务于政治目的的价值"。显然，根本的要求在于它可被视为完全不同于学术研究的东西，并被如此操纵。必须认识到，正如所有科学一样，存在既"纯"而又"实用"的

东西。

就实用而言，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法国的新地缘政治学和30年代存在于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如出一辙，只不过其意图不同而已。哈特向的问题不在于运用于政治目的本身，而在于运用于政治目的的价值，他写道："既然在德国人看来它应该服务于民族政治，那么，来自其他国家的有关其消极价值的观点就可看成是对其积极价值观点的抵消。"这一点和法国的新地缘政治学的根本差别在于，他们已将人类看成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只考虑某个特殊国家的利益。正如其他诸多学科一样，地缘政治学可运用于"超乎知识本身所追求的"许多不同目的，其价值则取决于观察者的视野，以及他或她运用于任何特殊政治目的的价值。这些是根本的道德问题，而且，在现代地缘政治观点中，无论他们被标以"好"或"坏"的标签，都必须取决于其对人类整体而非某个小部分的影响的评估。然而，道德问题尽管十分重要，但他们也得置身于一门"纯"学科之外。

最后，有必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这里所界定的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是何联系，在地缘政治学被视为"不纯"的那些日子里，政治地理学则依然"纯洁"，并在其庇护下适用于政治行为的所有地理范围。在惠特尔西看来，政治地理学根本上而言就是研究"地球与国家"间关系的学说，这也包括国家间关系的地理方面。但是，就国际关系空间研究的地缘政治学的界定而言，留给政治地理学的问题也必须作出回答，这必然会导致一个或更狭小或

更宽泛的界定。狭义的政治地理学将国家视为一个政治单位进行研究，旨在分析政府的影响及基于其疆域内全部人文地理的政府决策。例如，选举地理描述了特殊政策所诱发的国内变化及这些变化的原因。政治地理学更宽泛的界定则被归为近代学科，它将地缘政治学当成从空间上研究全部政治行为的一部分，无论你选择哪一方面，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重叠部分，因为他们都必须要涉及存在于地理空间中的国家整体的自然特性。但是，必须铭记在心的是，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之间重叠的确切的特性远不如两者之间的差别，而且，他们研究目的迥异。即便地缘政治学在此被界定为基于空间视野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并非说明事情的终结，而只不过是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目标发生了变化而已。

便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基于地缘政治学的特性和目的所发生的变化范围及重要性，我们将考察20世纪初期地缘政治学的起源及发展。

第二章

宏伟的征服蓝图：地缘政治学的缘起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一词源自希腊语，“Ge”或“Gaia”原意是地球之神，“polis”则指的是古希腊的城邦国家。“Ge”的含义所指的是各种类型的人类家园，而“polis”的意思是人的统治和组织。因此，从词源派生而言，“地缘政治学”一词指的是地球和国家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但其含义又远远不只如此。它所强调的国家概念不单单指“位于”地球上的一种现象，而且也指“属于”地球的各类现象之一。其特征源于它是地理空间的一个部分。描述整个地球的“地理”（Ge）概念涉及某一特定国家所占有的地球之一部分与地球整体之间的关系；而“政治”（polis）概念则指单个国家与其余国家的相互关系。换言之，在区域地理及政治环境和他们所构成部分的物质世界及人类整体之间，存在更

为宽泛的关系。

地缘政治学的起源可追朔到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和德国的博物学家、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他们两人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尽管没有资料证明这两位学者曾经见过面，但是，其思想的共生关系在社会科学内部拓展了新的视野。虽然契伦被公认为是这一术语的创造者，但他的兴趣起初是受到了拉策尔思想的启迪，也正是通过后者的研究它才广为人知。

鲁道夫·契伦（1864—1922）是阿普萨拉（Uppsala）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曾担任瑞典国会中的保守党成员近6年之久，在那里，他将右翼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渗入了政府的职能之中，并表露了对自己的小国在一个大国主宰的世界中未来命运的担忧。在他的早期经历中，主要学术研究涉及国家的历史及组织结构方面，然而，拉策尔教学的影响成了他生活的转折点。德国地理学家有关地理因素对国家的本质及行为的影响的思想使契伦受到启发，并使他以崭新的角度来审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弗里德里希·拉策尔（1844—1904）出生于卡尔斯鲁厄，早期曾致力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而后转入地理学。他认为这一研究是关于人与自然现象的综合理论，有助于解释自然和人类行为的分布特征。他曾先后在慕尼黑和莱比锡大学任地理学教授，正是在那里，他发展了他的人类地理学思想。拉策尔对人类行为的政治方面情有独衷，1897年，他的《政治地理学》一书出版。这被普遍认为是现代

政治地理学中极为重要的成就，对德国和其他地区的这一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契伦将地理学及地理学方法运用于政治方面的工作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19世纪末，运用地理学方法去理解并阐释政治问题和国际问题还鲜为人知。相当精确地展示地球的自然和人文特征的地图由来已久，但其官方用途主要限于战争和军事目的。英国的“全国地形测量局”和法国的“军事地图绘制局”，这样的政府组织的存在进一步证实了官方地图绘制的军事目的。一直所欠缺的是对地图因各种目的所显示的数据的解释，而不是下次战役的计划。也就是说，从它所显示的数据中提炼出更深层次的含义。一直以来，地理因素影响国家的命运被接收为普遍的原则。例如，自17世纪以来，地理因素的考虑就在法国战略思想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到了大革命时期，这些对于使关于法国在欧洲的角色的法兰西思想系统化方面具有重要性。这种思想在拿破仑的头脑中也极为明显，它不仅表现为对于地理学重要性的总体评论，而且更特别的在于他坚信其军事上最可怕的对手是“二月将军”（le Général Février）[1]。然而，这种源自地理学思想的观点的出现就如一个舞台，舞台的背景有时往往能影响舞台上正在上演的人类戏剧[2]。没有

---

① “二月将军”指的是1812年俄法交战时，法国军队所遭遇的恶劣天气条件。拿破仑认为与其说是俄国的军队，倒不如说是俄国的冬天是他最可怕的敌人，也是他全军覆灭的主要原因。

② 沃特留斯（Ortelius）在1570年绘制的世界地图是最早的现代世界地图，被命名为“全世界区域”（Theatrum Orbis Terrarum）。在默卡托及其继任者们未决定“地图集”是更恰当的术语而加以使用之前，“区域”一词被广为接受，用以表明世界是一个整体。

人认真尝试把各种构成空间范围的因素综合起来，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查。这一点也不可能被提早预料，因为，自16世纪以来世界地理知识的急剧增长，并没有伴随人类对地球现象无限变化的认知能力的相应进步。达尔文主义标志着科学理论的伟大进步，但是把这一理论应用到人类社会却仍然存在争议。社会达尔文主义已有了长足的飞跃，但是它却遭到了那些认为人类超越了自然界的人们的强烈反对。

自然科学家拉策尔明显地受到将科学方法运用于人类的愿望的驱动，而在契伦的背后，热衷于创造性思维的动机似乎截然不同。19世纪90年代国际局势的显著恶化使契伦深为忧虑，在契伦及当时的大多数人看来，存在于19世纪大部分时间并极大地稳固了时代进步的既以确定的秩序正在被打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源自于“会议体系”的“欧洲和谐”，在维持和平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①。事实上，欧洲80多年内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而只是出现了可以有效控制的局部争端，这些构成了当代欧洲在19世纪的特点。国际会议的定期召开旨在维护欧洲秩序的稳定并解决可能破坏秩序的争端，然而，到19世纪末期混乱的迹象出现，新的和潜在的破坏性力量逐渐

---

① “会议体系”是国际主义协同机制的早期尝试，它源自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所召开的维也纳会议，这一会议为欧洲大陆带来了普遍的和平，并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会议是19世纪初五大强国代表的聚会，它们是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会议相继召开于亚琛（Aix－la－Chapelle，1818年）、多堡（Troppau，1820年）、卢布尔雅那（Laibach，1821年）和维罗那（Verona，1822年）。会议日益被视为无力解决欧洲大陆的问题。而最终被为解决特别重要问题所召开的专门会议和国际会议所取代，其中最有名的是1878年所召开的柏林会议，它声称要商讨“东部问题”，即列强卷入其中的巴尔干半岛问题。

失去控制。欧洲各强国不是适时地去寻找解决的途径，而是忙于对动荡的巴尔干的控制和殖民势力范围的分配。政治和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导致了国际竞争的进一步激化和帝国力量的强烈叫嚣。

长期形成的普遍的不安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旧的国际格局。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诺尔道（Nordau）和德国的尼采（Nietzsche）这些哲学家们捕捉到了即将发生的时代终结的气氛（fin de siècle），已经确立的国家和国际行为模式不仅受到根本的质疑，而且还盛行各类启示性的预言。诺尔道就认为"文明世界显然弥漫着没落的气氛"。透过这种气氛他看到了恐怖政治哲学的出现，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思想都对现存秩序的承受力提出了挑战，它们都拥有极具影响力的拥护者。对于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来说，最能唤起对一战前整个时代追忆的意象是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诗《骄傲的塔》，他在这首诗中写道："巨大的死神在俯视"。时代正如塔一样，其外表虽然华丽，但其根基正在被侵蚀。

弥漫在大部分欧洲的不良预感滋生了对过去的安全和信心的怀念，这种怀旧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契伦极为关注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局势的一个特殊症候在于，其倾向于回归到古老的无宗教信仰的思维模式中去，在这种时代行将结束的气氛中（sekelskiftet），北欧地区关于上帝没落的思想转变成了"国家没落"以及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的迫在眉睫的混乱思想。

契伦本人也分享了支撑这种思想的普遍失望情绪，他个人的政治观点主要是因此而生。他的结论是，欧洲强国正在走向一场无法避免的残酷的战争，并为瑞典在可能随之而来的混乱局势中的命运而担忧。契伦完全意识到了瑞典作为小国的脆弱和无能为力，因而它不可能阻止灾难的发生或防止这一后果的出现。在契伦看来，国家最为重要，它的存在是维持秩序和防止混乱的唯一真正保障。他确信国家是领土组织的基本单位，其安全是第一位的。他的地缘政治思想使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家是“凌驾于个体之上的人”，而正是国家观念的冲突成了“即将到来的全球战争”的根源。其维护空间范围的思想源于他认为缺乏对传统政治学派的理解乃至研究的考虑，以及对现实世界和正在显现的威胁的真正实质的考虑。另一方面，地理政治学观点就是指追逐国家利益的更现实的行为过程的观点。正是某种包括了乐观主义的实证的东西使人们相信欧洲尤其是瑞典能够从时代终结思维的可怕景象中解脱出来。

这种失望和恐惧的气氛，直接的原因表面上看似乎是由当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失控所致，事后看来，内在的根源在于第一次全球地缘政治危机的“终结”。近五个世纪以前开始的长期的地理大发现和地理扩张的停止诱发了这一结果。其所具有的重要性正如布赖斯伯爵（Lord Bryce）所言，“它翻开了划时代的一页”。到19世纪末，世界的完整性最终被揭示出来，但它所表明的含义似乎产生了更多的失望。19世纪末世界强国所面临的现实就如

巴比伦的亚历山大临终时一样，已没有多余的世界可供征服了。布赖斯在 1902 年的罗马宣言中指出，“对地球的探索现已完结”，“文明世界的人们在某种意义上认识了他们以前一无所知的家园”。这表明了他所言的“世界进程”的完成，他将之看成是“特别重大和决定命运的事件”。拉策尔的追随者和阐释者，美国地理学家爱伦·森普尔（Ellen Semple）在将这一“决定命运的事件”看成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个长期过程的顶峰时，把它置于了更为长久的历史视野中。她认为“已知世界的地理范围从古至今不断扩展”，人类“地理视野”也不断地延展。她把这种进程定义为“历史进步的扩张领域”，并视之为“世界进程的驱动力”。这在弗兰德·布劳戴尔（Fernand Braudel）后来所定义的“长期过程”（longue durée）概念中或许是真实的，在时代终结的紧张状态下，其效应在于产生了一种紧迫心理。对于几个世纪里习惯于想像在无限的范围之外还有无穷的新陆地的欧洲人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境况，它加剧了对全球有限不动产的争夺，无疑包括巨大的财富和资源。正是世界的探索趋于完结才成为了 19 世纪末帝国繁荣的心理环境的地缘政治基石，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在那些直到当时仍始终致力于扩充已知世界的边界的发现者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帝国宣称对新发现陆地的控制，并纳入其政治边界之内。E·拉维斯（Ernest Lavisse）认为，“世界的占领现在看起来似乎已和平地完成了”，“他们在变更的图纸上勾画出了宏伟的蓝图”。在新的多彩政治地图上，强国用他们所偏爱的色彩展示了其所拥有的

地区，他们似乎要将政治猎获描绘得和置于它们之上的自然特征一样稳固和长久。实际上，描绘新的地缘政治景象的“宏伟蓝图”与描绘海洋、河流、山脉的“宏伟蓝图”似乎没有差异，形容词“自然的”用来表明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因素时没有多少差别，全新的视野最初是用帝国的视角来审视的。世界上依然是空白地带的填充不可避免地与宣称对它们的政治控制密不可分，直至当时在地图上仍旧是黑色的地区，那些令人向往和神秘的地方，就会在有限的全球空间中恰如其分地转入确定的领地内①。

正是这种新的滋生了地理定局观的制图学中的精确性，导致了国际局势愈加紧张，竞争加剧，出现强权帝国主义。拉维斯曾预言：“不难推测，当所有可得的领土被占领以后会发生什么”，他还曾在较早的时候对全球的欧洲领地的“表面”平静提出警告，随后，他又得出了可怕但却具有先见之明的结论“这里和任何地方一样预兆着战争的爆发”。在布赖斯看来也是如此，他认为“全球进程的完成是决定性的，它标志着世界史上极大地影响全人类命运的危机的到来”。然而，布赖斯与拉维斯不同的是，他根本上持乐观的态度。尽管他用了“生死攸关”和“危机”这些词，但是他相应的结论则极为不同。他认为，全球进程的完成“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这“使世界

① 整个疯狂的进程在19世纪末伴随“瓜分非洲”而达到高潮，实际上，直到那时“黑色大陆”腹地还不为欧洲人所知。这是欧洲帝国主义达到顶点的标志，殖民的狂热显然是源于世界开发趋于完结的观点。对于欧洲各国的政府来说，这是“勾画蓝图”的大好时机。其中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控制下的领土范围迅速增加，而这些大都是源于在非洲的殖民地。

具有了新的统一性”。因此，人类家园已从“臆断中的混乱状态进入科学的有序状态”。他的结论是，“前途似乎乌云笼罩，但曙光已现”。

布赖斯从“混乱”到“有序”的理论基石在于他坚信科学的力量会造福人类。这也是他持乐观态度的原因，同时也成为那些面临时代终结的预示而努力寻求希望的人们持乐观态度的原因。其中的愿望之一就将人类与当时似乎很大程度上与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没有瓜葛的自然界连系在一起，这种关于人类及人类活动的自然观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的久远传统，它认为在人和自然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恰恰相反，广义上的“自然”包括了人类。其根本的观点在于，既然人类和非人类很显然都是同一个包罗万象的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那么，人类活动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基于对自然界及自然法则的正确认识。因此可以推断，人类和其它物质一样必须服从自然的法则。弗朗西斯·培根认为，“要想征服自然界，就必须服从她”，这概括了也曾出现于17和18世纪对“理性时代”的无知提出了警告的自然主义观点。19世纪末的许多科学思想中也包括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观点。拥护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地理学家彼得·克鲁鲍特金（Peter kropotkin）写道：“我无法接收一种不包括人类的自然地理理论”。他认为不包括对人类进行研究的自然研究毫无意义，那只是“经院式的”运用。

然而，促成19世纪末期自然主义思想与在此之前的理论完全不同的重要原因是由科学领域的两个新的因素所

决定的。一是对自然现象进行解释的进化论占据了主导地位；二是科学科目日益专业化的趋势。作为文艺复兴思想内在统一体的知识被分割为不同的部分。19 世纪末地理学的根本观点认为，应该不惜任何代价阻止这种分化，应重申领土现象的一致原则。这也成为了 19 世纪上半叶人文地理学领域的重要先驱、著名德国地理学家卡尔·李特尔（Carl Rittler）的重要主张，他把世界看作一个作用的整体，李特尔的门徒们认为新的专门研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戴卫·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将这种统一体观点定义为"地理学实验"，因而有必要"把自然和文化置于一个解释的框架内"。正如利文斯顿所言，进化理论在这一方面前景最佳，虽然这一理论被惠予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词，而实际上它的根本观点是新拉马克思想（neo－lamarckian，拉马克是法国博物学家。——译者），而不是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拉马克思想关于有机体的特性在其存在时期通过改进而延续下去的观点，似乎与将进化原理运用于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更相一致。如果将之视为可以改进和变化的空间有机体而置于地理学的框架中进行考虑，会更有意义。地图被证明是在一个大的模型中标明人类和非人类资料的特别有用的方式。因此，它是反映将科学原理运用于人类活动的理想方法。斯蒂芬·霍尔（Stephen Hall）认为，正是地图的"总体认识"使"科学知识和社会世界观之间建立一种观念连系"成为可能。

因此，世纪之交的时代精神（Zeitgeist）源于一种由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构成的忧虑和不稳定的混合体，两者

都包含有重要的地理因素。布赖斯在 1902 年的文章中对两者都进行了论述。当“混乱”趋于“有序”和运用科学方法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从而给人们带来希望时，全球空间被分割完毕又产生了一种幽闭恐怖症，这种综合症在契伦自己的著作中也得到了反映。他认识到，摆脱北欧国家不祥预言的途径在于将科学原理运用于政治领域，为此，他从拉策尔的著作中寻找到了答案。

拉策尔的方法建立在运用其自然科学知识来认识和解释人类活动的基础上。在其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地理学著作中，他进一步发展了关于国家的地理范围和国家行为的思想。其基本理论观点是，国家和自然界的事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对其行为的解释最好是将之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行为。它本身要大于各个组成部分之和，这些组成部分既包括了自然的成分，也包括了人类的成分。他将之定义为国家的“生物地理学概念”（die biogeographische Auffassung），使之不同于其他生物体的特征在于它是统一体，一种空间统一体，也可视为一种人类统一体，这一特殊的生物有机体不仅存在于地理空间中，而且也是其组成部分。和这种空间特征相联系的最重要的特征是空间（Raum）和位置（Lage），国家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两者的相互作用。

由此，拉策尔进而推论，国家作为有机现象遵循其领土增长和发展的原则。这些法则与国家作为地理空间中现存的一个实体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基于这一点，他考察了国家的特性及其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因此，他把进化理论

运用于对国家的解释，并将其行为模式与自然界有机现象的行为模式进行比较。拉策尔断言，国家的发展稳固地建立在其领土的基础上，要想进一步发展壮大，就必须使其领土优势最大限度地增长。也就是说，为了发展，国家必须确保充足和合适的生存空间，这是国家权力的基本组成部分。国家拥有的这种权力越多，就越有可能攫取统治地位（Herrschaft）。国家的主重目标被视为是追求权力（Macht）。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点，那么国家就会成为一个大国（Grossmacht），并逐渐成为世界强国（Weltmacht）。若要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就必须进行领土扩张，这也是成就显赫的国家和那些碌碌无为的国家之间的差别之所在。为了阐明这些有机体理论，拉策尔并不是通过类推的方法来进行论证，而是坚信，从很真实的意义上而言，政治现象本身既是自然的又是有机的，它和自然界的其他现象一样，经历相同的过程，遵循同样的法则。他的基本观点是，学术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宇宙法则的研究，而这些法则必须客观地用于对地缘政治现象的认识。

契伦马上就意识到了拉策尔的思想是一个全新的认识国家的视点，而正是这--点使他采取了新的关于国家及其行为的思想和理论方法，他称之为“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它最早成型于1899年，他起初的定义是“国家作为空间范围的科学”，不久他又阐述为“国家作为空间的一个地理有机体或现象的理论”。他在政治学方面的早期研究使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一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特殊观点，似乎将对更加充分地认识国家的行为作出了重

要的贡献。对契伦来说，地缘政治学实际上只是他所设计的一个更宽泛分析系统中的一个分支，其它的分支主要有民主政治学（Demopolitik）、经济政治学（Economopolitik）、社会政治学（Sociopolitik）和权力政治学（Cratopolitik）。虽然每一个分支所涉及的是国家及其职能的一个独特方面，但是契伦认为，由于地缘政治学构成了其他分支的基础，因而它是其中最重要的。他采用了拉策尔的两个理论前提：国家是一个空间有机体；国家最根本的特征和行为模式都源于此。然而，他还针对拉策尔的两个前提补充了第三个特征。契伦的三个特征是地形政治学（Topopolitik），空间政治学（physiopolitik）和形态政治学（Morphopolitik）。前面二者与拉策尔的位置和空间理论相联系，而形态政治学则主要涉及国家的形状和形态特征，这些显示了一个国家的成功或失败。

因此，契伦认为地缘政治学是一种能够对现象进行明晰的科学，而这些在过去只能靠推测或臆断。在这一点上，他遵循了拉策尔所倡导的研究中的完全客观性。直至当时，国家主要被看作是一个合法的和立宪的统一整体，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被视为源自于一系列成功的谈判，政治联姻，再加上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的宗教祈祷。这就好比一场国际象棋的对局，正确的下法决定最终的结局。既可能是和平，也可能是战争。既然没有必要摈弃这些传统被接收的合法标志，那么契伦的观点就在于，还存在另外一种更好的国家合法形式，即其地理空间。正是国家作为一个地理统一体的事实，既被看成是其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

因素，又被视为其存在的最强有力的缘由。在拉策尔之后，契伦同样认为，正是其作为地理空间的统一体的特征，使之转化成了某种根本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组成它的个体之和。为了全面认识国家及其行为，他强调诸如地理区域、自然资源、生态状况、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等空间因素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他在理解国家进化为当时的形态时还考虑到了他所言的“历史的方面”。因此，他认为人与国家极其相似，经历从青年到成年，再到老年的生命周期。它同样具有一种“智力”和“意识”，并由此产生需求的冲动以及选择实现这些需求的最佳手段。他区分了他所界定的“标准的”和“替代的”地缘政治学，前者涉及到国家的空间特性，后者则侧重于研究国家作为更大的系统的一部分。因此，“替代的”地缘政治学是把国家放在更为宽泛的范围内，国家间的关系构成了理解国家本身和整体系统如何运转的基本方面。它包含了领土扩张和大国的特殊国际地位这些因素。契伦认为科学方法的运用及其所包含的客观性是全部研究的核心。他写道：“必须认识到，系统并不依赖于任何关于国家特性的现存观念，无论是将国家看作一种生命形式的观念，还是将之看成是一种合法的和合乎道德的统一体的观念，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任何主观的设想都是站不住脚的。方法适用于所有的国家，无论其大或小、友好或敌对，衡量他们的标尺是一样的。”显而易见，国家是否是一个有机统一体的问题在契伦看来并不是最根本的。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科学作为确保客观性的唯一方法的地位，同时，他也把这看成是

地缘政治理论的基本特征。

契伦对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体现在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时出版的名为《作为生命形态的国家》(Staten som Lifsform)一书中，这本书不久就被翻译成德文并于1917年以《Der staat als lebenform》的书名出版。正如契伦本人深受德国的影响，尤其是拉策尔思想的影响一样，反过来，他的著作对德国本国后来的发展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契伦和拉策尔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照亮那些似乎依旧黑暗恐怖的角落。两人都努力逃离诺尔道的暮色和黄昏而寻找布赖斯所看到的"透过窗户所折射的亮光"。他们都认为地缘政治理论是实现这一点的最佳途径。然而，他们也都保留了与他们视为根本的那些客观原则不相符的一种隐藏的政治议题。即他们各自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所不同的是，当拉策尔寻求利用新的观点来合理解释和推进德国的世界地位时，契伦则试图利用这些思想来帮助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摆脱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所面临的危险境地。但是，拉策尔并没能见到"骄傲的塔"最终被撤除和事态的急转直下，契伦则亲眼目睹了一战的灾难。尽管他完全意识到了自己所提倡的理论不可能一夜之间得以实现，但是他对结果依旧持乐观的态度，并认为"即便一个人见不到阳光，能听见公鸡的啼鸣也是令人快乐的"。

在评价契伦的思想的重要性时，鲁什·契伦—比约奎斯特把他看作是"世纪之交的他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他的思想也反映了这一点。然而，他虽然和拉策尔一样试

图用自己的理论来解决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但是，他也和拉策尔一样，通过倡导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适用更为宽泛的理论又逾越了这些问题。

米歇尔·科里恩曼（Michel Korinman）认为“德国是地理学家的摇篮”。18世纪以来，被称为“历史的眼睛”的地理学研究已经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处于欧洲心脏地带的地理位置也使德国成为了地缘政治学家的摇篮。正是在德国，新的地缘政治思想找到了最易接收的根基，虽然起初认为是契伦开创了这一领域，但实际上拉策尔思想对这一学科在那儿的发展产生了最大的影响。拉策尔的思想的含义很快就得到了承认，并在德语世界广为传播。对于拉策尔来说，尽管普遍法则的探讨是根本性的，但是，正是那些源于德国地理位置的特殊问题证明是德国的最大利益之所在。这反映出拉策尔的著作中纯学术与其运用于国家的需求之间的差别。这一点在一个意欲将自己看成是其地理学牺牲品的国家里引起了共鸣。德国把从普鲁士继承而来的位于欧洲中心被敌国包围的命运（Conditio Germaniae）看作是其与生俱来的不得不毫无怨言承受的沉重负担。拉策尔思想的吸引力在于它以一种更明确的方式阐述国家地理学。如果欧洲环境发生变化，德国中心位置的劣势可以转化为优势。每当德国衰弱之时，它总是成为欧洲的主战场，强国争夺的场所。然而，在强大的中欧内部，一个强劲的德国完全能够扭转局势。因此，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将问题转向解决的地理学思想深深扎根于拉策尔对祖国的热爱之中。

在拉策尔的《政治地理学》出现不到10年的时间里，同样采用这一名称的著作问世了，作者约瑟夫·帕奇（Joseph Partsch）把统一看作是中欧获取力量和权力的最重要的途径，他作为布雷斯劳（Breslau，现名为弗罗茨瓦夫。——译者）大学的地理学教授试图论证和阐述位于大陆心脏的一大片跨国地区，他把这里视为具有变为权力中心的潜力。他将中欧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区域来考察，并分析了它相对于欧洲其余地区尤其是与周边强国之间的强势和弱势。他研究的主题是“伟大文明地区的根本统一”，这一地区在过去常常被战争弄得四分五裂。帕奇断言，这里存在和平与合作的趋势，至于过去的冲突已被“工业和平的良好愿望”所替代。确立这种良好局势的关键在于德帝国与奥匈帝国之间联盟。颇有意义的是，帕奇著作的英文版先于德文版发表，从而使英语读者能够首先了解到在政治地理学的一般领域中德国的最新思维。

帕奇的《中欧》一书发表于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所编辑的名为《世界区域》的一套丛书中[①]，麦金德可以称得上是19世纪末期英国新地理学的开创者，他和拉策尔一样都意识到了在强国主宰的世界中政治地理学的重要性。他的《不列颠与不列颠海

---

① 这套丛书由威廉·赫里曼公司出版。根据帕奇的序言，麦金德邀请帕奇在1897年撰写了《中欧》一书，也是在这一年《政治地理学》首次出版。与1902年撰写的《大不列颠和不列颠海》大致相同。随后，帕奇的《中欧》以更长的德文版出版发行。虽然这两本书都是区域地理学著作，但它们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其基本意图是对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的世界主要区域力量的强弱进行评价。十分有趣的是，这套丛书的另外两部著作分别是爱丽丝·里克拉斯（Elisée Reclus）的《西欧和地中海》以及彼得·克鲁鲍特金的《沙皇俄国》。这两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家关于地理学的地位思想与麦金德和帕奇的相关思想大相径庭。然而，他们和为这套丛书作出贡献的其他大多地理学家们一道，都强烈地意识到了地理学的政治革命和区域范围的重要性。

洋》一书是系列丛书中的第一篇，他试图将英国的世界权力置于其地理的和地缘政治的背景中去分析。两年之后，也就是在帕奇的书出版不久，麦金德即向皇家地理学会提交了一篇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契伦和拉策尔未曾提出的观点，即从全球范围的角度提出了地缘政治设想。根据李特尔的传统理论，这一设想的基础是，认为世界从地理学的意义上而言是一个运转的整体，能够进行合理的解释。正如拉策尔一样，麦金德把这一理论运用于政治地理学，但是区别在于，拉策尔倾向于把国家看作是在有限的地理空间中寻求生存的独立有机体；而麦金德则认为存在一个不断重复的国家间关系模式。几乎是在布赖斯预言"世界进程"已经终结和可怕的危机即将来临的同时，麦金德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同样的问题。布赖斯那里的"世界进程"被麦金德称之为"哥伦布时代"，它始于15世纪的欧洲扩张和征服世界的大的历史阶段。他也认为这个时代正在趋于终结，并预言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其它部分的崛起，这些国家直至当时仍处在欧洲海权国家的控制之下。他的论文的中心论点是，海权国家处于优势地位的时代行将结束，而陆权即将回归。

麦金德的基本地缘政治主张是，世界的历史可以从地缘政治理论的角度解释为海权和陆权的对抗，同时他对这种对抗进行了历史的回顾。他认为，两个对抗的主角始终存在力量的此消彼长，但是，两者之间又总是存在一种固有的均势，因此任何一方都无法获得对另一方的绝对优势

地位。他们各自都具有某种优势，籍此他们可以重建均势。这就是为什么要坚持两极格局的原因，尽管从表面上看它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国家间关系模式。1904年，麦金德把他的理论运用于世纪之初的局势中，并指出全球对抗中的两大角色是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他把这种局势看成是封闭世界的一种结局，而这一点在过去开放的世界里一直在不断地延续。当他看到最大的优势位于陆权一方时，他对最后的结局甚为担忧。

正如拉策尔关注德国的局势一样，麦金德也十分关注英国的形势，尤其是为大英帝国在20世纪初飞速变化的世界中的命运担忧。然而，麦金德透过现实的世界局势认清了全球的现实，他首先阐述了全面的地缘政治世界观。由于他的论文侧重于研究陆权的上升，所以被称为“心脏地带”论文，它是对英语世界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最重要的长期影响的著作之一（见第5章）。同时，他和拉策尔的著作一起对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如此，拉策尔的思想直到《政治地理学》发表十多年后才真正被介绍到英语国家。但那时拉策尔本人已去世，国际局势也已发生重大变化。拉策尔的思想主要通过美国地理学家爱伦·森普尔的著作才广为人知，森普尔曾是他在德国的学生之一。森普尔认为，对英语读者们来说，拉策尔的著作还“一无所知，它是一个被封闭的宝库”。她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一书中解释并发展了拉策尔关于国家和国家行为的领土范围的思想，尤其强调了

"历史上陆地因素的重要性"。她强调，拉策尔理论的目的在于"在表面的不稳定中寻求恒定和共同的东西"。也就是说，确立地理学的法则。她写道："变化的事件的根源仍是一成不变的稳固的地球"。这促使她强调这一理论的科学特征。拉策尔已经把它置于"稳固的科学基础之上了"。他是第一个"从现代科学观的角度"来研究这一学科的人，"并通过对全球范围的归纳得出结论，而他的前辈们并没有把握到这些"。森普尔在接收了拉策尔大部分思想的同时，摈弃了其关于社会和国家有机体的理论。她认为这一点渗人拉策尔理论中的缘由，是"因为拉策尔是在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对欧洲思想具有广泛影响的时代确立他的原则的"。森普尔在1911年就认为已被"普遍遗弃"的这一理论，被她从其对"拉策尔理论的重述"中剔出了，这样做似乎会在这个体系中留下一个巨大的漏洞，但在她看来并非如此，她坚持认为它对于拉策尔的著作而言从来都不是真正核心的东西，"它就好像宏伟建筑物周围的脚手架一样……立在那儿，在移去脚手架之后，其稳固的结构表明，这些对于整体而言是何等无关紧要。"

在森普尔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拉策尔不容质疑的理论基础。因此，她的著作根本上而言表现出乐观的气息。这种乐观态度源自于拉策尔的思想和他们所依赖的"稳固的地球"本身。"所有人类活动最终所依赖的陆地"的重要性，在她心目中是与历史进程的思想连系在一起的，她断言："对于一种进程理论面言，它（陆地）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

拉策尔的观点对法国的影响远远超过除德国自身之外的任何地区。德语知识在那儿的传播要比在英、美广泛得多，特别是在与德国接壤的东部边境地区。维达尔很快意识到了德国地理学家们著作的极端重要性。然而，他在关于《政治地理学》的长篇论述中，立即又对拉策尔的决定论、他的有机概念和他仓促“确立法则”的尝试提出了异议。维达尔在这一点上想要承认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他所言的“方法论”（principes de méthode）的存在，在他的观点中，他十分清楚地表明，政治地理学只是“整体之一部分”，即“生命地理学”。

尽管维达尔本人早期提出了这些质疑，但拉策尔思想仍然对法国现代政治地理学的建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森普尔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同一年出版的卡米尔·瓦劳克斯（Camille Vallaux）的《土地与国家》（le sol et l'Etat）充斥了比森普尔的著作中还要多的拉策尔思想。虽然维达尔和瓦劳克斯一样都是拉策尔的追随者，但瓦劳克斯并不是不加批判地接受后者的政治地理学思想，尤其是将国家视为有机体的观点和被理解为环境决定论的观点都受到了强烈的质疑。瓦劳克斯同时还对拉策尔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这是拉策尔著作中的主要败笔。瓦劳克斯坚持认为，他的书在“方法和灵感”上都与《政治地理学》迥然不同。《土地与国家》成为了包含有机和无机科学的《大百科全书》中的一卷，瓦劳克斯宣称其意图是要把这一个学科置于“真正的科学”（une science

véritable）之中，而他所研究的目的是理解并解释政治现象的空间范围。尽管普遍“法则”的观点还未被人们接受，但对现象进行分析的普遍“原则”已经存在，因为“没有特殊的科学”。

虽然人们起初承认拉策尔的重要性，但还是对其著作对德国角色地位的设计产生了普遍的忧虑，这一点在法国表现得尤为明显。达尔文主义者关于竞争生存的观点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第三帝国是要使德国成为欧洲的霸权民族。拉策尔的分析无疑增强了德国作为一个强大国家的信念，其注定是要进行领土扩张并获得统治地位的。由于这种设想被普遍认为与作为德国政治和军事上层野心的东西极为相似，因此不可能以纯“学术”的方法予以接受。另一方面，拉策尔在德国的支持者们又认为，莱比锡地理学家是一个严肃的专业学者，他最为关注的是从科学的角度对国家的行为法则作更深人的理解。这一点，法国地理学家布伦赫斯持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拉策尔的思想境界太高以至于无法忽视其它民族的贡献。他可以超越现实政治的迷恋从而确保他能够透过德国洞察人类。然而，许多自诩为拉策尔的信徒的人们最终表明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并不严谨。

在拉策尔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理论发展过程中，他选择用“政治地理学”一词来描述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但是他所研究的内容与契伦的“地缘政治学”毫无差异。拉策尔出身于自然科学，他认为地理学是核心部分，而“政治的”——正如早期的“人类的”一样——只是正在研究的

一门学科的特殊方面的标志而已。而另一方面，出身于社会科学的契伦则把“地理”（geo－）放在前缀的位置上。尽管他的思想在后来的发展中似乎更注重地理的方面，但是地缘政治学作为他创设的更宽泛的分析系统中的一部分，仍然保留了一席之地。术语的差别的确反映了两人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它对地缘政治学研究随后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

正是政治地理学而不是地缘政治学成为了研究“地球和国家”的“合法”学科主流，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应取决于这样的事实，即用德语写作的拉策尔的影响要比用瑞典语写作的契伦的影响大得多。当时，契伦的著作被译成外文的唯一版本就是德文版，正是在《政治地理学》的发源地第一次使用了“地缘政治学”一词。两者之间出现分歧的根源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德国地理学建立过程中内部存在的分化。关于这一学科的未来地位颇有争议。究其原因在于，“地缘政治学”一词用于描述了一个特殊思想学派，它倡导地理学家们积极参与国家事务，这使他们和学术主流派完全不同，学术主流派主张政治地理学远离政治。这种分歧成为了不可逾越的鸿沟，以至于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实际使关于地球和国家的研究以这种方式发展不再可能，而拉策尔和契伦都曾希望它能够如此。

第三章

战争与（德国）地缘政治学的衰落

到1914年，建立了还不到半个世纪的德意志帝国，就成为了欧洲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国家。它不仅位于大陆列强的前茅，而且正在变为一个触角伸向全球各个角落的海上强国。德国能够在19世纪末奇迹般地迅速屹立于强国之林，是以经济高速增长为基础的，这一点在其重工业部门最为明显。当时，一个国家的现代武器生产能力取决于其煤、铁和铜的产量，它们是衡量一国真正实力的最重要的标准。因此，令德国人普遍感到失望的是，其国际地位与其新兴工业实力并不相符。然而，他们渴望这一状况应该立即予以扭转。

德皇威廉二世充当了改变这种失望情绪的先锋。这位野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君主是当时德国外交政策中不稳定和煽动性因素的根源。显然，

要实现所期望的目标，必须对统治了大半个 19 世纪的世界秩序发起强有力的挑战。在这一秩序中，大不列颠占据着世界霸主地位，是当时最庞大世界帝国，并且在世界财富和国际贸易中占有最大的份额。但在 19 世纪最后 10 年中，德国在铁和钢的所有重要部门的实力都超过了英国，这使德国对分享更大的世界权力及拥有相应影响力的欲望愈加强烈。这种欲望最突出地表现为德国渴求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用德皇威廉二世惯用的话来说，就是占据“阳光下的地盘”①。

米歇尔·科里恩曼指出，这一时期的德国可谓是心系全球（Pensait le monde）。而由于德国是“地理学家的摇篮”，因此德国对世界大国（Weltmacht）的向往有着牢固的地理学及地缘政治思想的根基②。帕奇等地理学家以及瑙曼（Naumann）等政治学家强调，与奥匈帝国结盟对于德国而言至关重要，而围绕两个日尔曼强国进行的中欧联合，对于日尔曼帝国的实力与安全来说意义重大。同时人们深信，只有通过发展海权，才能真正夺取世界权力。因此，德皇威廉二世重申了他的信条：德国的未来铺设“在水上”。在《政治地理学》一书中，拉策尔表露了他对海权重要性的关注。他比麦金德更早地指出了陆权（Landm? chter）与海权（seem? chter）之间的历史性对立，并因此

① 出自布雷兹·帕斯克尔（Blaize Pascal）的这一著名短语经常被德皇威廉二世所用，“阳光下的地盘”（“Ein Platz in der Sonne”）标志着德国对其世界强国地位的全面认识。

② “德国心系全球”（Quand l' Allemagne Pensait Le monde）被科里恩曼视为一个地缘政治计划。

得出结论指出，海权提供了夺取世界霸权的最便捷的途径。然而拉策尔也认为，一个真正的大国，二者缺一不可。美国海军战略家阿尔弗莱德·马汉（Alfred Mahan）曾经表达过同样的观点，他所著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在德国享有盛名。马汉特别谈及了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以发展他的海权至上理论。他的理论在一战前的那段岁月里给德国带来了思想上的巨大震撼。

因此，德国的舆论分成了两种思想流派，分别由更热衷陆权和更强调海权的人组成。受财政预算所限，两种观点不可避免地相互对立。前者强调建立一支实力强大的足以抵御侵略的军队以及巩固以德国和奥匈帝国两国同盟条约为核心的强大的中欧集团[①]。更为重要的是，陆权理论认为必须把东方视为实力的源泉之一，因而特别关注“东进”（Drang nach Osten）的主张。这不仅要求发展同东欧国家更密切的关系，也要实施一些庞大的计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柏林——巴格达铁路项目，其目的在于经由巴尔干和土耳其建立一条连接德国和中东的陆地通道。海权思想则受到德国殖民主义思潮的蛊惑，它鼓吹夺取殖民地，认为海上力量的建立是国家强大的先决条件。显然，马汉的思想是这一流派的理论支柱。这些思想对德皇威廉二世极具吸引力，他虽然极度倾向于把大不列颠视为德国的头号对手，但同时也认为大不列颠是实现超级大国计划

① 德国和奥匈帝国1879年的两国联盟是俾斯麦欧洲政策的基石。它标志着两个日尔曼强国自1866年奥普战争后的和解。

的典范[1]。正是在这一理论支配下，德国倾力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而这样做却导致了英国的高度警觉并诱发了一场使一战前两国间关系处于决裂状态的海军军备竞赛[2]。实际上，德国采取了双重政策，它试图既巩固其在欧洲的地位，又夺取海外势力范围。因此，陆权和海权共同在德国对于其将要扮演的国际角色的观念中起到巨大作用，这就必然滋生向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现状发起挑战的危险战略[3]。

这种地缘政治观被一些历史学家视为一战前德国中产阶级的观点。比如，卡来欧（Calleo）认为德国不仅想要对现状发起挑战，而且还要有最终夺取霸权的野心。然而，仅凭地缘政治学的论著就说明征服世界的阴谋计划是十分困难的。帕奇把和平看作是中欧政策的主要目标，但是要靠建立强大的政治大厦来保证。同样，许多殖民地政策的拥护者们设想通过暗中与大不列颠的协议达到更为公平地瓜分世界领土和资源的目的。然而在德国的政治界和学术界广为传播的世界大国思想引起了人们对德国野心的

---

① 《海权对历史上的影响》（马汉，1890）对德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他的命令之下，德国海军的每一艘船都发放此书。颇有意义的是，此书也被译成了日文，而且日本所有的军队和海军学校都要求阅读。

② 由大元帅特皮兹（Tirpitz）所领导的海洋思想流派导致了新一代强大的战列舰队的建立以及同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英国的政策是确保英国的海军力量超过任何两个外国的海军力量的总和，但同德国的军备竞赛的耗费却拖垮了英国和德国的财政。

③ 1901年6月18日，德皇在汉堡的一次讲话中将“阳光下的地盘”和“我们的未来在水上”的观念结合了起来。这次讲话的主题是关于在中国发生的列强镇压义和团反抗的胜利结果。使他感到极其满意的是，德国在这一事件中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并且因此无可争议地跻身于世界列强的行列。有关的引文如下：

尽管我们没有一支应有的强大的舰队，我们却为自己夺取了一块阳光下的地盘。现在我的使命就是，务必使阳光下的这块地盘永远成为我们无可争议的财产，以使我们在国外领地上的活动和贸易，我们国内的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以及我们在海上的航行都能沐浴到充足的阳光，因为，我们的未来在水上。

普遍关注。这必然会导致形成当时的激烈气氛。战争到来的时候，一大批政治学者和地缘政治学者把它看作是发起挑战和将伟大的思想付诸实践的历史机遇。一战的头两年，出现了一批地缘政治学的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弗里德里希·瑙曼的《中欧》，这本书于1915年在德国出版并于次年被译成英文。其主旨远比十年前帕奇的著作要强烈得多。瑙曼强调战争十分重要，因为它能导致变革。他写道，"只有在战争年代，我们才兴致广泛地接受重建的变革思想。"他认为"这种新结构"唯有在"处于流血和国家动乱中"的战争时期才能确立。瑙曼把建立一个统一的中欧看成是德国参战的关键目的。他强调，"中欧是战争的果实"，"我们在战争的经济困境中坐在了一起，我们曾经共同奋战，现在我们决定共同生存"。在这本书的英文版序言中，阿什利（W.J. Ashley）表达了他的观点："由于世界冲突的爆发，这本书成为了德国最为重要的著作"。阿什利说，瑙曼一直是德国最广为人知的政治学作者，战争"给他提供的机会被他立即抓住了。"阿什利认为这本书"集当时德国思想之大成"，尽管它不是最早涉及这一领域的著作。他说，作为"未来世界列强之一"的中欧的联盟已经成为"德国政治的主导思想"，瑙曼已将"渴望"转化为了"系统的计划。"

一战中契伦的几部德文版的重要著作也出版了。其中，有《当代大国》（Die Grossmachte der Gegenwart，1914）和《生命形态的国家》（Der Staat als Lebenform，1917）。这些著作对于思考德国的未来角色地位以及使其角色地位得

以提升的战争的重要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契伦指出："战争""就像葡萄酒一样，从不说谎"。同瑙曼一样，契伦相信这场战争为创立一门新的地缘政治学提供了机会，而且由于他提出的中欧集团不仅包括了巴尔干，还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地区，因而设想在欧洲中部难以逾越的地带建立一个地缘政治区域。契伦认为，这样做的必然后果是法俄两国的影响受到排斥，这样的愿望在当时被解释成了"战争意图"，并且随着战争的进程这种意图被阐述得越来越明确。虽然阿什利所说的"系统的计划"在东方最为显要，但同时也有必要在西方针对比利时的所获而作出调整，以保证对莱茵河地区更为稳固的控制和使德国更易接近海洋。

这种思想受到德国整个地理界的一致欢迎，并且准备集体支持将地理学用以促进德国的国家利益。科里恩曼指出，正是战争使德国地理学家们的"理论思考"集中于那些他们以前从不关心的问题上。理查德·亨尼格（Richard Hennig）也认为，"战争是地理学的发动机，"它必然被用来给国家形势带来令人满意的变化。

未来的这项重大的变革性计划使1918年11月的失败成为了极深的创伤，这是国家命运的重大转折。但是德国人普遍难以接受长久沦落的状况。凯斯勒（Kastner）指出，"我们坐在一间叫做欧洲的等候室里"，"苟延残喘"。德国这一大国的崩溃，导致了德皇威廉二世及民众所觊觎的使德国夺取"阳光下的地盘"，变革世界秩序的行动彻底失败。取代从莱茵河地区延伸到多瑙河甚至更远地区的中欧

计划的，是一个帝国不复存在的小小的奥地利和在凡尔赛和约中失去了东普鲁士及西部阿尔萨斯——洛林（Alsace Lorraine）的大片领土的德国。不足为奇的是，在这种格外凄凉的氛围下，这个国家转而接受看起来能给人希望的政治思想。这些政治思想从极左到极右不等。其中既有民族社会主义，也有地缘政治思想，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发源地：慕尼黑。战后的德国处于动荡之中，而没有任何地方的情形比巴伐利亚首府更为糟糕。慕尼黑位于德意志世界心脏地带的多瑙河中部，在这里，解决德国问题的最激进办法被提了出来，并试图付诸实践。因此，民族社会主义和地缘政治思想交织在一起。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主张，对于一个衰落而又弱小的德国而言，应采取意大利的法西斯体制，而地缘政治思想则主张利用政治地理学服务于国家复兴的需要。在20年代的慕尼黑熔炉里，这两派锻造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联盟，它延续了整整一代人。

一战后在德国兴起的地缘政治思想源于拉策尔和契伦两个人的思想。推崇拉策尔理论的实践者们认为，要制定和实施最符合一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必须对该国的地理学有全面的了解。处在当时的环境之中，地缘政治学者的主要目标是制定一项使德国得以复苏的行之有效的战略，从而恢复其大国地位。而且，他们甚至确信德国在19世纪末的崛起极为偶然，它之所以衰落，部分是因为对国家的地理状况及其存在的局限性缺乏全面的了解。他们期望地缘政治学思想将纠正这一错误，并因此从一开始就将地理学运用于国家的需求。莫尔（Maull）指出："地缘政治思

想涉及国家的空间需要，而政治地理学只是考察国家的空间条件，”“它试图借助其结论指导现实政治。”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地缘政治思想的主要倡导者是卡尔·豪斯霍费尔将军（General Karl Haushofer，1869—1946）。豪斯霍费尔是个地理学家，也是巴伐尼亚军队的前任将军。他极力倾向于将地理知识看作是对德国从失败和屈辱里复兴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他认为德国领导人“对地理现实的忽视”是德国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雄心勃勃地着手改变这一状况。豪斯霍费尔说，地缘政治学的挑战，源于其“对政治实体进行更科学化保护的渴望”。他的地理学背景使他十分熟悉拉策尔的著作，他和他的同事们根据战后德国的问题着手改编《政治地理学》一书。1908年是豪斯霍费尔发展其地缘政治学思想的关键时期，当时他被派往日本和远东执行一项特殊使命。正是根据在那儿看到的情况，他开始研究世界权力的地理基础。同时，他也非常了解契伦的著作，加之他和契伦本人的交往影响了他的思想的形成。

1918年战败后，德国地理学家普遍觉得凡尔赛条约苛刻而不公平，应该被推翻。然而，至于地理学应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卷入政治事务中，在德国的地理学家内部存在很大分歧。地理学家在此问题上分裂为几派，豪斯霍费尔所在的那一派确信地理学家应该扮演积极角色。由此，支持“传统”政治地理学的一方同赞成“新”地缘政治思想的一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豪斯霍费尔看来，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是地球表面的国家分布情况及其运转的地理条

件，而地缘政治学则是研究“自然空间中的政治行为”。劳腾萨奇（Lautensach）将这一笼统的区分又推进了一步，他认为在政治地理学中国家被视为一个静态的事物。而“地缘政治学则涉及到政治进程的过去和现在，基本上是动态的概念”。斯托克斯（Stoakes）也指出，“认为科学研究能够洞察政治命运神奇功效的设想，”“是将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划分开来的显著标志”。

1924年，豪斯霍费尔担任“地缘政治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的编辑，该杂志在慕尼黑出版。尽管该杂志公开的目的是研究地缘政治学这一新“科学”，而实质上它却是考察德国局势的地缘政治因素，并分析如何使其对德国有利。他也对德国的领地划分进行了剖析，及其对于有效制定政策的意义。“地缘政治学杂志”中还给英国的世界权力和意大利与日本所面临的难题留下了篇幅，同时也关注更广泛的事件，尤其是那些给德国带来影响的事件。与拉策尔的根本不同在于，拉策尔能够如布伦赫斯所言“透过德国洞察人类”，面豪斯霍费尔及其杂志的认识通常只停留在德国。构成豪斯霍费尔研究基础的是对整个欧洲普遍衰落的斯宾格勒主义观点，以及他对德国注定要将欧洲大陆带回到传统的欧洲中心，并使之恢复世界心脏地带地位的信念。

正如从中欧的角度来看地缘政治思想与德国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样，从世界的整体环境来看，地缘政治思想与欧洲有着更广的联系。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豪斯霍费尔深受哈尔福德·麦金德思想的影响。他认为麦金德1904年的

文章是“全部地理世界观中最伟大的”，并将其喻为一部“地缘政治学的杰作”。其中适用于德国的部分构成了豪斯霍费尔个人世界观的基础。泛地区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在全球背景下划定了德国未来的势力范围。因此，整个研究波及到了意大利和日本的地缘政治学，而这两个国家在二战中成为了德国的主要盟国。德国从地缘政治的立场考察了墨索里尼妄图使意大利征服地中海的野心，认为它极其符合德国征服中欧的愿望。尽管意大利长期以来对大国地位抱有野心，但其薄弱的工业基础使之远不能同德国的实力相比。所以，豪斯霍费尔认为意大利不能对德国在整个欧洲的统治地位构成任何威胁[①]。

从一开始，豪斯霍费尔就一直对日本抱有特别的兴趣。他认为日本是用以进行地缘政治分析的一种国家典型。日本在 1936 年参与签订反共产国际条约后，它在德国地缘政治思想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因而，在“地缘政治学杂志”中使用了为德国在欧洲的统治权进行辩护的同样的话语为日本在远东谋取霸权地位的目标进行辩护。日本被描绘成未来世界强国之一，一个泛地区的中心，并且能够和德国一道以一种新的、由德国和日本共同操纵的世界秩序代替旧的以盎格鲁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在德国的慕尼黑及其它地方，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地缘政治学者，包括埃沃尔德·班什（Ewald Banse）、乌尔夫·谢沃特（Wulf Siewert）、柯林·罗斯（Colin Ross），约翰

① 俾斯麦的欧洲政策中极为轻视意大利。他认为意大利胃口虽好，却没有生就一副好牙（“心有余而力不足”）。

尼斯·库恩（Johannes Kühn）、理查德·亨尼格（Richard Hennig）、柯特·沃温克尔（Kurt Vowinckel）和豪斯霍费尔自己的儿子阿尔伯利奇（Albrecht）。他们和其他许多人一起对德国地缘政治议程的设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地缘政治学杂志”的编辑，豪斯霍费尔仍旧是个决定性的角色，但到了30年代，整个研究就变成了一个集体计划。

地缘政治学从一开始就被称为一门科学和艺术（Wissenschaft und Kunst），其主要理论基础是生物进化论。但是，由于地缘政治学在慕尼黑的发展，使之成为了一种融合了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物理学的综合理论。国家被视为一个有机体，一个遵循生物法则的“超个体的生命体”。这个国家有机体是地区性的，但其对成功的追求又是空间性的。那么，用以描述这一状况的术语基本上就是个拉策尔式的。因此，这个国家在空间（Raum）中存在，而它的成长与发展需要生存空间（Lebensraum）。生存空间学说（Lebensraumkunde）研究的是国家取得成功的地理意义。拥有庞大空间（Grossraum）是一个强国自由与安全的关键。正是自决之争（selbstbestimmungstreben）使那些强国与其它国家区别开来。强大的国家不断扩张，必然会吞并那些不太成功的小国。那些真正触及全球的国家是跨越空间（raumüberwindende）的国家，而那些小国正好相反，是囿于空间（raumgebundende）的国家。

尽管地缘政治学被看成是一门科学，但它只是一门应用科学。地理学知识是“预测发展趋势及制定未来政策的

'科学基础'"。用豪斯霍费尔的话来说，它是"应用型的理论，能够指导现实政策达到必要的目标而又不至于脱离坚实的基础"。然而，豪斯霍费尔承认，纯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从来就没有很明确的划分。认为"纯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界限很容易被跨越。"而且最终他承认他自己也曾"偶而跨越那些界限"。

这样，在地缘政治思想和国家政策目标之间必然有一种紧密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政策源于对政治进程受制于地球现实的途径的研究"，而其目的十分简单，即"揭示政治活动的地缘政治决定因素"。尽管地缘政治学据称是对普遍现象的论述，但是某个特定国家的迷恋却反映了极为不同的现实。正如瓦劳克斯所说，没有特殊的科学存在。

豪斯霍费尔认为陆权和海权的对立问题一直是"地缘政治学中最普遍的现象之一"。两者都很重要，但在运用上也都存在地缘政治局限性。因此，虽然海权被认为能够最有效地实现跨越空间，但他同时又承认陆权也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赢得对庞大空间的统治。陆权被视为德国最高利益的关键，而这要求推行中欧和东进双重政策。豪斯霍费尔认为未来的德国首先应该是一个与中东、俄罗斯和中亚连系在一起的的东方国家。除此之外，他还发展了泛地区理论，这种理论设想形成一种大区域生存空间(Grosslebensformen)，即在大陆规模上的庞大的地缘政治实体，其中最重要的是泛欧洲（PanEnropa)、泛亚洲（PanAsien）和泛美洲（PanAmerika)，而它们的形成和发展

集中表现为区域决定论（Schicksalsraumen），即命定的空间。毋庸赘言，欧洲命定的空间在德国，而亚洲的则在日本。

地缘政治思想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是其环境决定论。作为土地（Boden）和命定的空间（Schicksalsraum）等概念内在的基础含义是：一个民族的命运表现在其自然环境中。本质上而言是空间而不是人决定了历史的进程及大国的兴衰。这种环境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同纳粹种族主义者的计划相冲突。从其纯粹的形式上看，地缘政治学与种族主义极为不同。源于达尔文主义的种族主义曾在 19 世纪后期对欧洲的思想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并被用来为欧洲民族至上的观点进行辩护，同时它还被用来将帝国主义看成是进步和文明的进程。这一点在德国的思想中尤为重要。尽管民族（Volk）的概念是民族和国家地缘政治学的一部分，但其文化特征却根源于土地，而且民族本身也受到环境的制约。表现为文化区域（Kulturboden）、语言区域（Sprachsboden）和最终为帝国区域（Reichsboden）的民族区域构成了其他一切的基础。

综上所述，纳粹分子和地缘政治学者各自的主张显然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论基础。地缘政治思想绝对不是二战期间许多西方政治地理学家所认定的纳粹主义的地理学。回顾早些时候的慕尼黑，这两者确实有着紧密的联系，原因在于卡尔·豪斯霍费尔与副元首鲁道夫·赫斯之间的亲密友谊。一战后，当赫斯还是豪斯霍费尔在慕尼黑大学的一个学生的时候，接触到了地缘政治学。这使赫斯产生了明显

的转变，他相信“受过政治地理学熏陶的统治者，对世界会有一个整体概念”。他成为了纳粹党的上层人物了解地缘政治思想的中介。比如，豪斯霍费尔经常被邀请去给纳粹特殊人物集会做演讲。1923 年的慕尼黑暴动之后，希特勒和赫斯均被关进伦茨堡，豪斯霍费尔经常到那里拜访他的朋友和弟子。[①]

就在这一时期，希特勒写出了《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书中引用了中欧，生存空间和东进等地缘政治概念。可以肯定，豪斯霍费尔在拜访赫斯的同时，也同希特勒见了面。他们对地缘政治学术语的使用表露了豪斯霍费尔的思想——或许是通过赫斯——对元首思维的影响。最有把握的一点是，那一时斯的整个氛围很适于地缘政治思想的传播，这些思想必然融于一个强有力的综合体，充作纳粹的教条。然后，这些思想被用来为第三帝国所推行的政策进行辩护，尤其是领土扩张政策。

尽管豪斯霍费尔极力鼓吹德国的东方命运，但他并不因此认为同俄国开战是东方政策的必然或不可避免的结果。相反，他认为同苏联合作是德国应该采取的最佳战略，他坚持他最初的看法，即德国在实现超级大国的进程中全球的头号敌人是英国，而不是俄国。他的这种认识使他更倾向于 1925 年的《罗巴诺条约》中的政策而不是 1918 年的《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条约》中的政策；因而也更倾向于后来 1939 年《苏德协定》中的政策而不是

① 1923 年的慕尼黑暴动是纳粹党（NSDAP）企图接管巴伐利亚政府的一次尝试。其发动者是希特勒及一战的德军领袖人物拉登道夫（Ludendorff）将军。

1941年"巴巴罗萨计划"[①]。他必然会设想一个由强大的德国领导的延伸至东欧纵深的更庞大的中欧，但他并不认为这必定实施一项庞大的军事征服计划。

1941年5月，离德国国防军实施对付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还有6个星期时，鲁道夫·赫斯独自驾机飞英的消息震惊了德国。尽管官方称这一奇特事件不过是二号头目试图终止同英国的战争从而使德国有时间来对付东方而采取的极不明智的个人行为，但最近的研究表明第三帝国的高层领导人物，甚至希特勒本人对此事的纵容也不容忽视。希特勒曾明确表示他不赞成继续对英国作战，似乎十分乐意在两国之间达成任何和平协议，从而允许英国能够继续维持它的帝国统治。无论赫斯的真实使命是什么，豪斯霍费尔父子似乎早已知晓。卡尔自己也深受和平使命这种主意的影响，甚至卷入了一些与此有关的众多行动当中。因此，豪斯霍费尔父子立即被捕，尽管他们很快便获释，但从此卡尔的影响遭到削弱，"地缘政治学杂志"也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并且被迫与纳粹的观点和政策更紧密地保持一致。毫无约束的领土扩张和极端种族主义在第三帝国的最后几年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两者的结合导致了大屠杀的发生。纳粹分子的信仰认为，德意志民族是优等民族（Herrenvolk），斯拉夫民族是劣等民族（Untermen-

① 德俄两国1918年3月所签订的《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条约》使德国在东方获得了巨大的优势，但这一条约的条款被凡尔赛条约彻底推翻了。1925年，德苏签订了罗巴诺条约。那时，由于德国的"战争罪行"，而苏联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两国都是国际社会的"弃儿"，他们同意在贸易、武器生产和军队训练方面进行合作。对于德国来说，这给它提供了一种绕开凡尔赛条约苛刻条款的方法。

schen)，同时他们还有着了魔般强烈的反犹太主义倾向；而地缘政治学则信奉的是环境主义者的哲学，强调空间在国家命运中的重要性。因此，两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第三帝国建立以来，地缘政治学家们不得不容忍他们的政治领袖们真正喜欢的那些学识，而且经过这么多年，大多数地缘政治学家似乎已发现要采取一种实用方式（modus vivendi ）并不困难。无论如何，两者之间总是存在一片灰色区域。有些地缘政治学者自己就是种族主义者，而有些——但不多的——纳粹分子也愿意承认环境的重要性。结果，在地缘政治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受法律约束的、科学的环境决定论”和“浪漫的、主观主义的、对民族牧人般的狂热”之间出现了“某种融合”。其程度可以从种族理论（Rassenlehr）发展成了地缘政治学说的一个范畴这一方面看出来。民族和空间的概念明确地统一起来，而且从强调土地的自然环境转而强调由人类所创造、遍布人类痕迹的文化景观（kulturlandschaft）。这一点包含在鲜血和土壤（Blut und Boden）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它宣称是民族命运中的种族和空间联系起来的理论。这一点继而被用来为优等民族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初在东欧的占领和定居辩解。

这样，随着 1941 年后斗争的加剧，源于契伦、拉策尔和麦金德并被豪斯霍费尔重构的地缘政治理论，就被其强大而恐怖的政治对手所粉碎和改变。而“不变的”地缘政治学则被纳粹视为以牺牲种族为代价过于重视空间和环境，因而绝对不能接受。

起初，豪斯霍费尔似乎试图使地缘政治思想和纳粹保持一定距离。一战后德国出现了许多右翼党，他们与地缘政治学者有着相似的目标。然而，随着纳粹势力和影响的急剧膨胀，对于那些承认从事一门学科研究的学者们而言，将他们的理论付诸实践的真正可能性变得势不可挡。到 1944 年，许多地缘政治学者越来越关注战争和纳粹王朝的进程。他们不仅根本怀疑地缘政治学本身在策划德国战略时所扮演的角色，而且还对它与纳粹密切联系起来是否明智表示疑问。最尖锐的莫过于卡尔的儿子阿尔伯利奇，他一直跟随父亲研究地缘政治学，是一个对德国对外政策了如指掌的职业外交家。尽管他也是赫斯的密友，但对纳粹的态度却一直不如卡尔那么热情，而且从 1941 年起，纳粹及其在德国的影响越来越令他不安。赫斯驾机事件发生时，他正同反对派保持密切的接触，而且还是忙于为后纳粹时代的未来德国进行规划的“克雷邵圈”（Kreisau Circle）中的一员①。他当然也了解 1944 年 7 月 20 日发生在东普鲁士元首总部刺杀希特勒的未遂事件，因此，他与卡尔一道遭到逮捕，并受到帝国安全局长官莱茵哈德·海因里奇（Reinhard Heydrich）等不止一人的审问。卡尔再一次很快获释，而阿尔伯利奇却从 1944 年冬一直关押到 1945 年冬。那时由臭名昭著的罗纳德·弗雷斯勒（Ro-

① 赫尔穆特·万·莫尔特克（Helmut von Moltke）于 1940 年建立“克雷邵圈”的目的旨在反抗纳粹统治并讨论纳粹后时期切实可行的道路。其内容包括使德国“重新人性化”，从而对各种问题不再寻求军事化和独裁解决。由于得到了坚定的宗教信仰的支持，这个圈子不仅包括了专业人士和军人，还包括了阿尔伯利奇·豪斯霍费尔在内的一批学者。豪斯霍费尔在其议题中引人了一些非纳粹的地缘政治学方面的内容。尽管该组织并没有直接卷人 1944 年 6 月的刺杀希特勒计划，但其中包括莫尔特克和豪斯霍费尔在内的一些人还是被处死了。

land Freisler）掌管的人民法院（Volksgericht）每天都要宣判一批反纳粹者的死刑。1945 年 4 月 23 日，阿尔伯利奇在柏林被处决了，当时俄国已经占领了东柏林。日益充满纳粹种族主义思想的“地缘政治学杂志”在 1944 年 10 月就已经减少了出版量。美军抵达德国南部之后，卡尔被捕，但经过审讯，决定将他释放。1946 年 3 月 13 日，卡尔和马莎·豪斯霍费尔的尸体在巴伐利亚的家中被发现，双双自杀而亡。[①]

1945 年秋，豪斯霍费尔曾会晤了自封为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并深受豪斯霍费尔及其思想影响的埃德蒙德·沃尔什（Edmund Walsh）将军。沃尔什接受了地缘政治学这门学科的合理性。他认为就其本身而言，地缘政治学的主要罪过在于它同纳粹的联系而不是它的思想。他后来写道：“我完全反对（豪斯霍费尔）在他的理论和著作中得出的政治结论。”但他又承认在豪斯霍费尔的论著中有“50%的科学真理”。沃尔什后来陪豪斯霍费尔去了纽伦堡。在那里，豪斯霍费尔于 1945 年 10 月作为证人被传讯，并最后一次见到了鲁道夫·赫斯。由于这次的经历，豪斯霍费尔写出了《向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致歉》（Apologie der deutchen Geopolitik）一书，他在书中试图为自己的工作进行辩护。由于始终坚持地缘政治学的科学性，他声称他从未坚持“我的祖国正确与否”（原文如此）的信条。然而，他承认没能正确区分纯科学和应用科学，超越了两者

① 玛莎·豪斯霍费尔与她的丈夫始终保持着合作，并将费尔格雷夫的《地理与世界霸权》（1915）译成了德文。

间的界限。在他不断坚持地缘政治学的科学性的同时，他也主张地缘政治学者不能只是“一台生产科学的机器”，因为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写道，人们只是期望在1918年后地缘政治学家会关心这个被分割的国家的悲惨局面，特别是其生存空间的不足。尽管如此，豪斯霍费尔声称仍然存在着不偏不倚并不受特殊利益和特殊人物影响的“纯”地缘政治学说。他在《致歉》一书中的结论很耐人寻味，且意义重大。他声称尽管最初是拉策尔和契伦激起了他对地缘政治学的兴趣，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建立在盎格鲁·撒克逊地理学家的研究之上。其中他特别提到阿尔弗莱德·马汉、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es - Adams）、托马斯·霍尔第奇（Thomas Holdich）、哈尔福德·麦金德和伊沙阿·鲍曼（Isaiah bowman）。这一声明显然旨在将地缘政治学和西方国家所熟知的政治地理学联系在一起。通过这一声明，他断言人们会发现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不是什么不循常规的东西，只不过是具有普通科学方法论这一伟大传统的一部分。同时他还主张，即使西方地理学家不使用“地缘政治学”一词，他们实际上也已经着手同样的研究。看来，在战争的废墟中毁灭掉的只是豪斯霍费尔离别地缘政治世界时的遗言。

西方国家的政治地理学家们从一开始就对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所有研究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感。哈尔福德·麦金德马上与地缘政治学家的研究割裂开来，并且始终把他自己的研究称为“政治地理学”。对法则的探索，以及与此有关的决定论完全不能引起麦金德的兴趣。而自由意志的

贬黜和人类选择所受到的限制对他来说就像对法国的维达尔或然论学派地理学家一样难以接受。地缘政治学之所以吸引了美国政治地理学家的特别关注是源于它同第三帝国的联系及其政策。而伊沙阿·鲍曼是其中最早对其含义提出警示的。鲍曼说："地缘政治学具有质朴性及确定性""但其著作及德国政策中显现出来的却是幻觉、伪装、辩解及喋喋不休"。二战中，一些讲德语的政治学家在美国工作，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自己就是从纳粹手中逃离出来的。这些政治学家无所顾忌的警告美国人注意那种在德国推行、并且支持纳粹政策的地缘政治学的危险性。其中的重要人物有：安卓斯·多帕伦（Andreas Dorpalen）、卡尔·维特弗吉尔（Karl Wittfogel）、安朱·吉尔基（Ardrew Gyorgy）、罗伯特·斯特劳斯—休普（Robert Strausz – Hupé）和汉斯·魏格特（Hans Weigert）。在评论豪斯霍费尔之得益于麦金德时，斯特劳斯—休普认为"麦金德的设想与世界大国的军事哲学以及充分说明德国国家病况的衰落极为相符。"至于他所谓的"瓦格纳心态"，他进而指出，"即将到来的斗争看来是严峻的；其目标——统治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如同瓦格纳的英雄们朝着它不断行进的偏远地区一样遥不可及"。这种新德国"科学"的特点和目标占据了 报纸和学术刊物的大量篇幅。汉斯·魏格特认为地缘政治学是纳粹征服世界的战略的基石。魏格特写道，"卡尔·豪斯霍费尔博士和他在慕尼黑的地缘政治研究所，受益于麦金德的教诲，"断言"得到恐怖计划宣传和地图支持的冷酷的、顽固的、强有力的战争地理学，就是在这里出笼

的"。魏格特引用了福雷德里·桑登（Frederic Sondern）一段富有戏剧性的论述：受"陆军少将卡尔·豪斯霍费尔博士领导的""1000名科学家支持希特勒"。桑登指出，"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图表、地图、数据、信息以及计划从一开始就支配着希特勒的行动"。他认为"豪斯霍费尔博士和他的手下实际上主宰着希特勒的思想。"而且，在桑登看来，豪斯霍费尔实际上口授了《我的奋斗》。尽管魏格特不同意桑登等人更为极端的论述，但他显然也已经接受了第三帝国政策的背后就是地缘政治学家的观点。"很明显，"他写道，"豪斯霍费尔流派已经从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严格的地理决定论，并扩展到了形而上学领域"。魏格特得出结论，"地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只不过是一种仅仅在埋葬了自己的上帝并转而崇拜火星的国家盛行的能动的虚无主义"。

因此，现在俨然以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形式出现的地缘政治学，遭到了豪斯霍费尔声称从他们身上得到了灵感的那些盎格鲁·撒克逊地理学家们的强烈谴责。魏格特认为这种地缘政治学处于"黄昏"而没有未来。然而，这些地理学家所说的政治地理学和那种"不变的"地缘政治学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学科本身，而在于其所运用的领域。像沃尔什这样的思想家反对的是德国地缘政治学家们推断出的结论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在西方国家推行的政治地理学同样也极为关注国家利益，其主要倡导者们自己也已积极投身于政治领域之中。哈尔福德·麦金德曾一度是国会议员，而寇松勋爵（Lord Curzon）这个积极的政治地

理学家也曾担任印度总督（Viceroy）和外交大臣。他们两人都把俄罗斯视为大英帝国的头号威胁。1917 年十月革命后，寇松曾派麦金德出使俄国。麦金德的秘密使命是煽动乌克兰和其它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削弱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力量。麦金德作为“枢纽理论”而于 1904 年首次提出的著名世界观隐含了对大英帝国未来安全的关注（参见第七章）。法国政治地理学家的研究工作之根本目的也在于维护其国家利益。维达尔的最后一部著作《法国东进》（La France de l’Est）写于一战期间，这部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阿尔萨斯——洛林和法国重新联合而进行辩护的地缘政治论著。1919 年，一批法国地理学家作为专家顾问出席讨论新国际边界的凡尔赛会议。他们得出的结论与法国的中东欧政策不谋而合。鲁辛·加鲁瓦（Lucien Gallois）在《地理学年鉴》（Annales de Géographie）中呼吁法国地理学家对欧洲的新政治地理给予更多的关注，这一呼吁听起来就像是他们对民族履行义务的号召。他在谈到“对这些（新的）安排将会产生的国家及政治组织进行研究”的重要性时，首先考虑的显然是法国的利益。安卓·切诺丹姆（André Chéradame）的《泛德意志计划的真相》（Le Plan Pangermaniste Démasqué）一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瑙曼“中欧”计划的一个尖锐的回击。切诺丹姆驳斥了德国作者的欧洲心脏“和平局势”论，他认为泛德意志主义者的计划不啻于是统治欧洲大陆。泛德意志计划意欲从波罗的海延伸至波斯湾，以柏林——巴格达铁路为其轴线。凡尔赛会议后，德国地理学家

也谴责其法国同行们将地理学“政治化”。约翰·索尔奇（Johann Solch）写道：“他们现在指责我们建立了政治地理学”，“那么他们又如何看待法国地理学呢?”狄·马彤尼（De Martonne）的《欧洲中心》（L’Europe Centrale）一书遭到了整个德国的强烈批评。索尔奇在《地理学杂志》（Geographische Zeitschrift）的书评中写道：“作者打着科学客观性的幌子进行鼓吹”，他指责法国地理学家“混淆了科学与政治”。“法国地理学变成了什么?”索尔奇悲叹道，“在它考虑政治问题的时候，难道不是越来越不成其为科学了吗?”科里恩曼指出，一战后德国的地理学家曾谴责他们的法国同行从事了不久即众所周知的地缘政治学研究。

在阿尔弗莱德·马汉和伊沙阿·鲍曼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对于美国利益的类似的关注。自1898年美西战争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美国急需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甚至成为英国接替者的可能性。马汉对海权重要性的分析不仅仅是在学术方面，而且还在于为美国的全球角色地位进行辩护，他还认为要实现全球大国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他的思想对德国的影响远胜于在自己国家的影响，这无异产生了一种糟糕的副作用。同样，鲍曼在《新世界》一书中也不只是对一战之后的形势进行了完全客观的地缘政治分析。鲍曼设想的“新世界”要求结束欧洲帝国的领土特权，而将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远东推行

得极为成功的“门户开放”政策扩展到世界其它地区[1]。“新世界”包含了全球重构，这在某种程度和豪斯霍费尔建议的一样重要。同豪斯霍费尔一样，鲍曼致力于促进他眼中的国家最高利益。因此他也被冠以了“美国地缘政治学者”之名。利文斯顿评论道，“鲍曼假意将地缘政治学贬为伪科学思想体系，”但是……，他这一举动却机智地使自己摆脱了被人视为扮演豪斯霍费尔的美国翻版的危险。内尔·史密斯（Neil Smith）认为鲍曼“渴望成为豪斯霍费尔的美国同类，”但又不愿意“本身被塑造成美国的豪斯霍费尔”。这反映了鲍曼自身对地缘政治学的矛盾心理，他既十分小心又欲与之保持距离。他害怕地缘政治学，或者说——在利文斯顿看来——他害怕他自己成为地缘政治学家。利文斯顿的结论是：“鲍曼的政治地理学和德国的变种完全一样由社会环境所决定。”他认为“科学和政治的分界线是鲍曼无法划定的”。

全美国所关注的关于国家利益的地理学研究全部包容在政治地理学的名称下进行，随着美国参与到二战中，对地缘政治学的兴趣激增。这是“众人皆言地缘政治学”的时代，人们对于这门新的“德国科学”极度狂热。鲍曼认为“地缘政治学从德国移居到了美国”。M. 塔戈夫（Tagoff）在“纽约人”上发表的一首诗包含这样的对句：

---

① 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夺取了它唯一一个真正的殖民地菲律宾。基普林有一首著名的诗句：“白人的责任”，表明了邀请美国承担帝国“责任”的愿望。然而，尽管美国是镇压1900年中国义和团运动的列强之一，但其后来的政策却与其它强国大不相同。美国并不像其它强国那样寻求获取一块势力范围，而建议中国的贸易应该完全对外开放。这就是美国在远东推行的最早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后。

啊，奇妙的伤口止血剂！

噢，美好的新地缘政治学。

这种新的兴趣同孤立主义时期的外交政策相对冷漠的特点形成鲜明的对比。魏格特哀叹道："我们的血液里简直就没有全球地理知识"，而且这种匮乏必须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必须抛弃他所说的"往日的地理学"，"让我们把世界看作是一幅动态图，而非过去的静态图"。那种导致了夸大地缘政治学中的"神话和巫术"成分的无知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对地缘政治学实质的更恰当的理解。魏格特引用了豪斯霍费尔最喜欢的一句拉丁文"Fasest ab hoste doceri"（应该向敌人学习）来为这一目的辩护。由此获取的知识后来被用以创建魏格特称谓的"人性化的地缘政治学"，它可以使美国人更清楚地把握世界的特性以及他们的国家所需要扮演的角色。

尽管地缘政治学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但正如人们从第一次兴趣浪潮所料想的那样，它并不完全为美国的学术界所接受。20世纪40年代美国地理学界对它的抵制与二十年前德国地理学家们对它的反对极为相似。根本上而言，这是因为其整个内容显得过多涉及政治进程以至很难作为一门学科为人们所接受。同时，人们认为它是从敌方引进的，因而在盟军阵营里它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沃尔什最多只承认与它扯上联系是有罪的，而其他人的评价则更苛刻一些。那些日尔曼或中欧后裔地理学家们的反对最为坚决，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对它的了解胜过他们的盎格鲁——撒克逊同行。

结果，只有极少数人响应魏格特把地缘政治学“人性化”的号召。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大概得数沃尔什。他把地缘政治学定义为“一门人文地理学和应用政治学的综合学科”，认为它有着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以及康德的“古老而又复杂的世系”。他倾向于相信豪斯霍费尔的科学记载，并列举了美国历史中的几个例子，比如1803年获取路易斯安那州显然就属“地缘政治”之举。“所有这些慕尼黑专家的先驱者们所缺乏的只是等级；他们是没有职位的地缘政治学家”。他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待地缘政治学，具体到德国变种的最大问题是它过于强调物质内容，而忽视了精神领域。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在对外战略方面最好的预防是建立在国际公正立场上的一种美国地缘政治学”。除非将精神价值考虑在内，“他们〔现在的政客〕将只会制造另一次伪地缘政治学瘟疫”。同时，他还认为，“未来地缘政治学的式样……甚至现在就开始在一个广阔的范围内生长。”而这一点将是基于公平与尊重而不是权力与武力。他总结道，“地缘政治学既能够显得崇高也会趋于堕落”，“它可以在两者——实力的价值和价值的实力之间作出选择”。最后他援引在凡尔赛会议上遭了极大挫折的麦金德的“快乐的小天使(airy cherub)”来提醒政客们不要幻想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新秩序计划是直接从西奈[1] 承继而来。

---

[1] 麦金德的“快乐的小天使”负责警告聚集在凡尔赛会议的协约国的政治家们考虑世界霸权的现实。该警告采取了三段论式的形式，它概括了麦金德关于陆权和海权对抗的全部理论。

在汉斯·魏格特宣扬“人性化”地缘政治学而埃德蒙德·沃尔什推崇“精神”地缘政治学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倾向于几乎不加修改地接受豪斯霍费尔的地缘政治学。乔治·雷纳（George Renner）所倡导的欧洲“泛地区”包括以德国为中心的中欧联合，这使他被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指责为试图策划一个比纳粹所标榜的还要大的泛德意志。雷纳后来又致力于编写美国二战后最重要的一本政治地理学著作《世界政治地理》。这本书成为了战后一代的政治地理学的标准教科书。雷纳写道：“在最近这场反对轴心国的战争中”，“美国第一次意识到政治地理学的存在，”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是在地缘政治学的名义下学来的”，因此“许多美国人由于从前从未听说过地缘政治学，……就推断这门学科是新近才产生的，而且，由于他们注意到有些德国政治地理学家叫嚣北欧‘种族优越论’以及‘雅利安优等人种’论，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地缘政治学是主观虚构的……他们因此推断政治地理学是德国社会主义分子旨在征服世界的发明。事实上，这些推断没有一个是正确的。”恰恰相反，地缘政治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他认为地缘政治学之“父”是哲学家康德。他说，美国人通常没有意识到“几乎从二战伊始，美国就一直在运用地缘政治学原理为其军队的胜利进行运筹”。雷纳在谈到“这门学科的分支是政治地理学（有些人将它称为地缘政治学）”时断言，“可以把地缘政治学看作是政治地理学的简称”。雷纳借用了格利费斯·泰勒对地缘政治学的定义“对一国国情和资源的重要特征进行研究

以确定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来支持自己的论断。他写道：“因此，按泰勒的定义和阐述，可以推出地缘政治学就是政治地理学的同义词，并由此可以断定这两者的差异不是学科间的区别，而是生活在一种国家精神病态中的德国地理学家和生活在民主制度中的非德国地理学家之间的区别。”他得出的结论是，“将地缘政治学称为一种不道德科学犹如一拳打在稻草人身上。科学不存在道德与非道德，它与道德无关。科学最终被运用，才有道德与不道德之分。”雷纳认为，在现在这种和平时期，地缘政治学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它为国家提供了一种衡量自身国家实力和评价敌国实力的方法，它为在战争中拟定一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推测敌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的方法……因此它是赢得并维持和平的基础。”

就这样，在20世纪40年代，地缘政治学以其人文性、精神性及政治实用性受到美国人的欢迎。但这种欢迎无济于事。在《世界政治地理》再版时皮尔西（Pearcy）评论说：“德国地缘政治学被用来勾勒世界扩张的蓝图，而纳粹信条则和为德国扩张作辩护的那部分政治地理结合了起来。”正是如此这样才导致了“一些学者将政治地理学的原理从地缘政治学中分离出来”。地缘政治学被摈弃，而这一状况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

其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二战结束后，随着纳粹的全部罪行陆续被揭露，人们对纳粹统治的厌恶不仅没减轻，反而起来越深。地缘政治学臭名昭著难以恢复。其次，冷战的发动意味着世界局势的冻结，而地缘政治学也

随之冻结了。地缘政治分析变成了以冷战为目的的地缘战略分析，而政治地理学蜕变为关于国家和资源的平淡描述。在这一方面，《世界政治地理》的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的区别极为显著。在得以恢复前必需有冷战真正解冻的迹象，而这一迹象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才出现。

第四章

和平与（法国）地缘政治学的兴起

1976年元月，离卡尔和玛莎·豪斯霍费尔夫妇自杀正好是整整30年的时间，一份全新的地理学杂志第一期在巴黎出版了。名为《希罗多德杂志》（Hérodote），编辑是樊尚（Vincennes）大学的地理学教授Y.拉考斯特。其宗旨在于以激进的地理学观点分析现实问题。拉考斯特认为最能贴切表达其意图的术语唯有地缘政治学，相应地，《希罗多德杂志》的副标题就定为了："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评论"。从此，地缘政治学复活了，但这并不是发生在一个其曾经起源的国家，而是发生在一个对其极度反感的国度。"Geopolitik"转变成了"géopolitique"。

自二战以来，法国的地理学家们很少触及到地缘政治学的研究。甚至倍受尊敬的地理政治学（géographie politique）也因为与之有关联而受到

沾污，大多数地理学家都极为谨慎地避免谈及。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人而言，法文“géopolitique”实际就是德国“Geopolitik”的直译，因而遭到了最为严厉的批评。在那时，法国的地理学家并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来反对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而只是使用了“地理政治学”一词。正如英国的同行们一样，他们把地缘政治学视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因此，当一个人思考地缘政治学的性质及其在法国的发展时，他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20世纪上半叶，关于这门学科的思考实际形成了一种“反地缘政治学”，如果忽略了在德国所发生的一切，它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理解。《20世纪西方地缘政治学思想》一书中以“对抗地缘政治学的维达尔精神”（L'Esprit vidalienne versus Geopolilik）为标题的这一章集中分析了战争期间法德关于地缘政治学思考的根本区别，其中关键词是“对抗”，因为持传统的维达尔学派观点的法国地理学家们很快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德国所发生的正是对这门学科的一种可怕的歪曲。

综上所述，法国政治地理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德国地理学家们的大量工作，尤其是拉策尔本人的工作。在对拉策尔的《地理学年鉴之政治地理学》一书的书评中，维达尔已经认可了德国地理学家工作的重要性。虽然对拉策尔将国家定义为“生命有机体”持有异议，但他仍然宽容地认为拉策尔只是以类推的方法使用了这个概念。然而，维达尔一开始就认为，政治地理学不能与地理学的其它方面割裂开来进行研究。它深深扎根于整体人类

地理学之中，只能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进行研究。

那些从事这项研究的维达尔的继承者们并不赞同其先辈已阐明的意愿，即将刚刚起步的政治地理学重新拉回到作为整体的人类地理学中去。这可能归结于两个因素：一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招致的欧洲地缘政治环境的深刻变化；二是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兴起。必须承认，地理学家们不得不依据自身的观念分析已经发生的变化，这对于解释政治地理学的目的、方法以及探究其学术价值来说至关重要。众多地理学家在两次大战期间那段时期的工作表明了这种方法是可行的。阿尔伯特·德芒戎（Albert Demangeon）是这一时期法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类地理学家，在他所写的第一本书《欧洲的衰落》（Le Déclin de l'Europe）中，直接涉及到了地理学和国际政治学两门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但是，在法国解释和运用这一分支学科的进程很快就被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兴起所阻断，法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蒙上了长期的阴影。魏格特认为，"比我们更为杞人忧天"的法国地理学家们在理解地缘政治学的真正本质并作出相应反应方面，走在了其盎格鲁——撒克逊同行们的前面。魏格特将法国政治地理学家归类为"地缘政治学家"，并断言他们批判了"忽视人类而视空间和地球为一切的德国地缘政治思想。他们还全力反对宿命论，因为它使人类或多或少成为了地理要素中的一个客体"。德芒戎领导了这次学术声讨，他认为，德国地缘政治学令人"焦虑不安"，因而在一系列评论文章中对它的可信性进行了批评。他批评的根本点就在于，认为这一理论完全缺乏科学精神，并

明目张胆地服务于国家。他视之为“德国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并因此得出结论，“东进再次成为现实的秩序”。相反，他认为地理政治学源于文明和环境之间创造性的相互作用，正是它们产生了各国自身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德芒戎之后，其他法国政治地理学家接踵而至，马里·戈伯莱特（Yves Marie Goblet）指责德国地缘政治学家们创造了一种玄学，认为他们的自然现实根基与中世纪的炼金术士们如出一辙。因此，作为“服务于政治的虚假科学”和“追求狂热的拟人化国家”的地缘政治学，应予以摈弃。同样，杰奎斯·昂赛尔（Jacques Ancel）也将德国地缘政治学称为“伪地理学”，认为它只不过是已经抛弃了所有科学真实性的宣传而已。它的角色就是为“无限扩张”提供辩护。

然而，这些尖锐批评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法国地理学家们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政治地理学，作为或然论者、而不是决定论者以及强调环境对于种族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国家是人类和自然现象间强有力的相互作用的产物。在维达尔看来，国家处于运动之中，它是一个能动的实体，是时空演变发展的产物。由此可以推断，这与他们关于“自然”现象的观点是格格不入的。德芒戎强调运动是结束一国孤立状态的关键因素，“大刀阔斧的运动”是实现变革和统一的最佳途径。而对于昂赛尔而言，国家边界不构成任何绝对的障碍（abarrière rigoureuse），那只不过是一条暂时的边缘地带（périphérie toujours provisoire），因此没有任何事情是天然生成的。“一国的边界摇摆不定，不停

消长……边界只是一条政治等压线”。由此看出，在任何时期，地缘政治外表都只是昙花一现，拒绝承认这一点就会与真正现实相脱节。这些现实就是特定环境中的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文明，例如莱茵文明，它是一个连续存在的本质上而言一个强加于虚假政治表象之下的恒久现实，昂赛尔认为这种表象是由他所言的普鲁士的兼并及伴随它的强迫普鲁士化而形成的，按照昂赛尔的观点，现存国家，特别是大国，都是人为的地缘政治产物，虽然它们拥有持久权力，而事实上是脆弱的，最终将走向灭亡。由此，昂赛尔得出结论，“杰里科的城墙在羊角声中塌陷，它唤醒了被缚的沉睡民族”。其进一步发展不再是谋求强权，而是形成相互谅解和滋生对人类的固有现实极为敏感的联合。

两次大战期间，拉维斯的“易变更的图纸上模糊的线条”所描述的存在各种地缘政治现实的观点弥漫在法国的地缘政治思想之中。因此，在《欧洲的衰落》一书中，德芒戎指出欧洲大陆是一个整体，国家构成了这一整体的各个部分。他还进一步强调，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自主的地缘政治实体，而只是一个范围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整体中的一部分，因而必须认清是否能够阻止其衰落，以及是否是大陆整体之部分。德芒戎确信，极为根本的是欧洲整体的再发现，以及将“大刀阔斧的运动”视为构建内在的地缘政治结构，从而重塑欧洲大陆。鉴于此，莱茵文明被视为一个支撑其政治组成部分的地缘政治现实。莱茵河并非是一个自然疆界，而是一个自然连接的人类构件，它不是法

德之间的一条分水岭。德芒戎和费弗尔反对目前现实存在的“血腥而贫瘠的边境”，他们预测这里将会是“富裕而辉煌的通道”。因此，德芒戎认为“莱茵河的联合力量”构成了卓越的地缘政治现实，这一现实又深深地埋置于更为宽广的欧洲现实之中。这样，莱茵河地区就被设定为某一类别中的一个例子，而不是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为了进行这种分类，德芒戎使用了“区域和解”（ententes régionales）和“联合”（groupements）概念。当莱茵地区仍是德法之间争端的主要焦点时，它作为边境的角色被视为首要。可见，德芒戎的观点是一种革新的观点。他的搭档费弗尔认为莱茵文明超越了国家特性，包容了政治表象之下的——及其所遮掩的——人类现实。在费弗尔看来，国家“从来都不是上帝恩赐的，它一直是人的杰作”。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他认为唯一能称得上是“恩赐”的地缘政治实体是他所言的“大国的自然区域”。费弗尔称之为“现实”（mondes），正是在这种现实中诞生了主要的世界文明，由于此文明超越那些国家所设定的人工边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可被视为是一个“现实”。

德芒戎的欧洲观是其世界观的一部分。他断言欧洲霸权行将结束，新的地缘政治实体即将出现。在《欧洲的衰落》一书中，他认为最为重要的两大地缘政治实体是北美和远东，分别由美国和日本控制。在他看来，如果欧洲各国能够求同存异，那么欧洲有可能成为第三个地缘政治实体。鉴于日本在发展东方中的领导作用，他甚至建议确立日本的势力范围及推行远东的日本门罗主义。从一定程度

上说，德芒戎似乎能够接受远东的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无论是他还是任何其他法国的政治地理学家都不能接受欧洲出现这样一个单独的强权处于相似的地位。

当德芒戎和其他地理学家热衷于国际主义的方法时，维达尔则在其晚年又回归到了更多地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法国东进》根本上而言只不过是分离的东部再次与法国统一的借口而已，他认为它们"原本"就是属于法国的。他写道："法国的天赋使命"，是既要维护其地理上的完整，又要充当中欧与西欧间联系的纽带。由于中欧显现出令人担忧的自我封闭倾向，所以他进一步大胆断言这"违背了生存法则"。正是由于这一广阔而强大的地区而临更广阔的影响，使之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回复到了和谐状态。这听起来类似早期鼓吹的全球化主张，维达尔确信法国的世界使命与法国东进的自然本性非常相符。

20世纪上半叶，法国地缘政治思想中贯穿着两股截然不同的思潮，一个关注联合，另一个则关注权力。前者是一种理想主义，认为未来将是一种合作方式；后者则是现实主义，国家强权继续存在，必须顺应它的要求。维达尔在其著作中对这两股思潮都进行了分析。在法国东进这一问题上，他似乎从理想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更强调权力。自临近二战的那段时期，他的继任者的著作中也发生了相同的转变。比较昂赛尔的两部著作，写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地理学前沿》（La Géographie des prontiéres）和完稿于二战爆发第一年的《日尔曼人的奴隶》（Slaves et

Germains)，其侧重点有着显著的差异[①]。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他所倡导的和解的主张就被“保护西方民主，反对希特勒泛德意志化”所取代了。很明显，这一变化既受到和解原则失败的影响，也与1938—1939年期间欧洲事务中再度出现的“兼并”（Anschluss）和“强迫普鲁士化”（Musspreussen）紧密相联。昂赛尔充分意识到了德国的生存空间政策对其邻国而言意味着什么，因而必须加以抵制。早在1934年，德国纳粹分子刚刚掌权之时，戈伯莱特就将黯淡的国际舞台描述成了“暮色黄昏”（le crépuscule）。然而，戈伯莱特却乐观地认为，随之的黑夜不会长久，反败为胜的良机将再次呈现。他特别强调在新的地缘政治组织形式中进行“实验”的必要性，认为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形势也为“实验”的进行提供了良机。戈伯莱特预测，建立这种实验并对之进行分析，是未来政治地理学的主要作用。

1945年及随后的若干年里，大多法国地理学家都尽量避免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东西。虽说在战后规划和区域发展方面存在强大的实际冲击力，然而地理学家们倾向于回归到区域研究的更纯净的领域寻求慰籍。尽管这一态度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但欧洲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与20世纪30年代法国政治地理学家的许多观点一脉相承。随着20世纪50年代第一个欧洲合作组织的建立，地

① 杰奎斯·昂赛尔《日尔曼人的奴隶》一书写于“虚假的战争”期间。“虚假的战争”爆发于1939年9月，持续到1940年德国人侵低地国家和法国。法国沦陷后，昂赛尔被捕，被关进坎佩尔（Compiègne）集中营。1943年获释后不久就去世了，直到战争结束以后，他最后的这部著作才得以出版。

缘政治学中有关“联合”的思想变成了现实。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本世纪初的法国地缘政治学家们在有关欧洲思想的创立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法国东进》一书中，维达尔使用了《欧洲共同体》（La communauté europé enne）一词，法国外交部长阿里斯泰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的用语简直就是德芒戎的《地理学年鉴》一书中用词的翻版，特别是他在国际联盟的演讲更是如此。一战后，法国的政界和地理学界曾聚集于凡尔赛，勾画新的政治边界，20世纪30年代，他们又相聚于日内瓦，40年代再次聚会伦敦。在这些场合，地理学对政治决策起到了重要影响作用。地理学家对国际主义思想的影响极为显著。戈伯莱特1934年关于新的政治——地理组织形式的“实验”思想，本身就包含在欧洲共同体之中。

因而，共同体既体现了法国外交政策的巨大变化，也预示着欧洲国际关系新范例的发端。它表明，放弃基于民族的传统解决方法，而使民族的自身利益在国际框架内得以实现。尽管由于法国拥有比其欧洲大陆邻国相对较强的政治、经济力量，使之成为巴黎更具吸引力的抉择。但是，从地缘政治学角度来看，共同体思想的实现即是联合对权力思想的胜利，也是欧洲超越民族国家的胜利。

1976年1月，《希罗多德杂志》的出版成为法国地缘政治和地缘政治思想的重大转折点。它是对地理学重新评估的产儿，这种评估所产生的背景是发生于1968年震惊全法国和导致戴高乐政府垮台的重大事件。在这一时期，虽然高等院校的社会科学总体上在为学生运动指明意识形

态方向及引导未来政策发展方向等方面扮演了中心角色，但是，首先就地理学而言，由于数十年里避免卷人政治事件而受到削弱，因而似乎少有建树。然而，拉考斯特所从事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①]。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地理学的宗旨是什么?"他所得出的答案是，"地理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动战争"（他所著的一本书的书名)。过去，他曾断言，地理学被国家用于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而这些主要涉及增强发动战争的能力。

对制造战争的谴责使拉考斯特起初对地理学的传统角色以及支撑它的地理学的建构进行了猛烈抨击，然而，他又断言，地理学可以有别的选择，它能够被用于其它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涉及这一学科的有关问题时，必须有根本的变化。《希罗多德杂志》的研究在最初就是关于如何赢得这一转变，其中包括地缘政治学的回归。拉考斯特谈到，正是从那时开始，"在那之前一直遭到禁止的地缘政治学开始重现"。正如第一章注释 1 所提到的，刊物最初的副标题为"战略，地理学，意识形态"，但从 1983 年开始，将它改为了"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评论"。最初，《希罗多德杂志》的研究目的在于使用空间方法来更好地理解各种问题，以及促进更有效的行为。在远离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同时，《希罗多德杂志》也同样远离了传

① 1968 年樊尚大学一位学生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地理学极其愚蠢和完全反动(la géographie est complétement crétine et complétement réactionnairè)"，拉考斯特赞同这些学生的观点，认为地理学的确具有反动性，但同时又认为这并不表示它们就一无是处。于是，他和他的许多同事开始着手这门学科的复兴计划，正是出于这一计划而创办了《希罗多德杂志》。

统的法国政治地理学。不论针对维达尔地理学有多么强烈的批评，维达尔自身对地理学思想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批评直接针对地理政治学的实践者们声称，其比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更具真实的学术价值。在《地理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制造战争》一书中，拉考斯特声称，地理学始终被国家用于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他谴责地理学家们太轻易地默许其为统治、战争和政治控制服务。他断言，地理统治的全部信念促进了民族的领土范围，遮掩了政治矛盾，并以土地掩饰了国家。这一观点认为，新的地缘政治学的角色就在于战胜沙文主义，并更趋于客观性。从这一点来说，它坚持了其公开宣称的意图。为了克服传统的国际主义方法，《希罗多德杂志》和新地缘政治学开始涉及生态学和更广泛的环境问题，以及诸如全球贫困和有限资源的枯竭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20 世纪早期都极其关注环境问题的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家克鲁鲍特金和爱利赛·雷克吕（Elisée Reclus）的工作受到重视，并得以重新进行评价。

《希罗多德杂志》主张对地缘政治的本质及其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根本的反思，而关键就在于使它与国家和国家政策分离。20 世纪 70 年代《希罗多德杂志》典型的研究主题包括无政府主义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反殖民主义、拉美革命以及地理学从一门依附性的学科到具有客观性——但实用的——学科的转变。从它与传统的法国地缘政治思想的关系来看，它坚定地支持“联合”观念。探究拉考斯特所定义的由“两大地缘政治集团”所控制的二元世

界局势，其自封的任务之一即是对特殊地缘政治境况进行详细研究。一个恒久的主题在于分析世界新集团的出现及其对二元世界对立的缓解作用。拉考斯特所言的这种“大圆盘”（les grandes plaques）的形式只不过是一种地质学的类推，由于它与过去的那些自然概念极为相近而显得特别重要。如果“圆盘”能够成为世界权力的未来中心，那么这些术语就构成了对权力持久性的重要认识。20 世纪 80 年代，《希罗多德杂志》围绕力量的分配及这一分配的含义进行了讨论。克劳德·拉费斯丁（Claude Raffestin ）在《权力地理学》（Pour une géographie du pouvoir）一书中指出，拉策尔学派的权力往往导致极权主义，因而他提出的抵销方法是赋予地理学自主权。拉费斯丁探讨了将权力向外延伸到尚未涉足的地区和社会集团中去的可能性，并将之置于更广的政治变革背景之下。

尽管地缘政治学和地理政治学之间形成的差别旨在通过使用不同的术语强调研究方法的根本差异，但是，《希罗多德杂志》所作的最重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消除了分歧，并同时证明，它们相互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在拉考斯特看来，地缘政治学建立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只不过具有应对麻烦和问题的实用传统，虽然方式不同的两个方面都涉及国家及国家权力结构，但是，贯穿于 20 世纪法国地缘政治思想中的“联合”和“权力”观念之间的根本差异是能够进行区分的。然而，法文“Le pouvoir”（权力）虽与德文“Macht”（权力）的含义极为相似，但“ Le groupement”（联合）却与“Anschluss”（兼

并）根本不同。所有这些观念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细微的，每一种都对具有密切联系的现象进行不同的解释。从维达尔到《希罗多德杂志》，联合这一概念更多与区域结构的革新趋向相联系，而权力这一概念则更多地与全球范围的分析相联系。

20世纪70年代法国地缘政治学的再次涌现使人想起了20世纪40年代美国政治地理学家们的一场根本争论，即认为应该去其糟粕而留其精华。魏格特和其他学者的观点是，地缘政治学应该人性化而不是废除它，但是战后的环境证明不适宜这种人性化过程。美国地缘政治学的回归也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但是与法国相比，它起初在学术领域的影响要小的多。正如在本章开头所提到的，魏格特认为法国人比其英国的同行更了解地缘政治学，而且他将此归因于他们更接近其渊源。20世纪70年代，地缘政治学被再次引人美国并随之普及化，这主要应归功于享利·基辛格。他在思考全球问题时热衷于地缘政治学的使用。但是，基辛格使用这一术语时十分随意，对其含义并无明确或具体的理解。不久，它就被政治家和评论家们所采用，和拉考斯特一样，他们发现，他们正是需要借用这个词来系统表达其一定程度上强调领土范围的观念。20世纪40年代“众人皆言的”地缘政治学回归为20世纪70年代“媒介谈论的”地缘政治学之后，美国地缘政治学家赋予了它新的用途。和20世纪初期的契伦一样，它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术语，并迎合了激进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新兴趣。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性回到中心地位，用麦克斯·索尔（Max Sorre）的话来说，就是要把人文地理学人性化，而激进的地理学则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现实的问题上，包括不平等、种族、环境和不发达问题。皮特（peet）所著的《激进地理学》一书，副标题为“关于现实社会问题的特殊观点”，对于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的实用分支学科的有关问题进行了重新评估。同时，A. 阿布德尔—马利克（Anouar Abdel—Malek）声称，“事实”在于，地缘政治学“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政治地理学领域中占主导地位”，因而他指责它忽视了被他称为“精英分子的知识界，主要包括世界主义者及反民族的左派分子等”。他认为应该确信“地缘政治学……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逻辑论证中所起的作用”，并进而讨论了“地缘政治学在未来世界的形成中可能进行的运用”。随着冷战均势的结束和“次要矛盾”的凸现，他看到了“一个剧烈而复杂斗争格局的出现”。在这种背境下，地缘政治学对于应对未来的问题和正在形成的新世界“至关重要”。

十年之后，冷战结束，阿布德尔—马利克所称的“新世界权力均衡的形成”日渐明朗化。克拉维尔将地缘政治学的出现——或再现——视为是“集团瓦解，城墙倒塌”的结果，缘于“敌对和不稳定的环境，它（地缘政治学）所涉及的是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聚集和利用力量”。由此看来，地缘政治学就是利用现实世界的知识去理解和应对变化。当冷战的政治冰川时期达到顶峰时，强烈的对抗模

糊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覆盖北半球大部分地区近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冰冠掩盖了先前的地缘政治景观。冰冠的溶化表明了现存地理学的继续存在，在近意识形态和后意识形态世界里，全球性问题的多样性代替了冷战时单一问题的世界。

因此，地缘政治学表现为一种新的地球意识。它把政治现象视为根本的环境问题，政治现象是这个多维人类整体的一部分。[①] 在以 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为特征的旧地缘政治学和 70 年代的新地缘政治学之间，存在最根本的哲学差异。旧地缘政治学的观点侧重于分析领土的某一特定部分，国家注重对其最大利益的专心追求，即使这些会导致对抗和战争，而通常它们的确会如此。它常见的主题是空间、权力和两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新地缘政治学的观点则是全球性的。它的根本主张在于，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研究具有全球性影响的诸多问题的有效途径，没有一个“区域”问题的解决是孤立的和脱离其更广阔的背景的。

在法国和美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促成了 20 世纪 70 年代地缘政治学最初的回归。因此，它起初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加以利用，并呈现“新的众人谈论的景象（neo-barbershop)，但它很快就获得了大众媒介的极大观注。在英国，尽管政治地理学已经回归，但地缘政治学的再现

① 这种全球意识具有完整性，它建立在将行星系统视为一个运转的整体的思想基础上。利文斯顿所言的将所有社会科学置于一个概念之下的“地理学计划”，与这种思想极为相符。

几乎没赢得任何热情。人们依旧与之保持一定距离，认为它有别于政治地理学，本质上并不足为取。当地缘政治学的词典在法国和美国出现时，而英国却无动于衷。20世纪90年代，英美的新“批判地缘政治学”都试图发展一种旨在客观地考察国际事务的新地缘政治分析模式，这在链接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之间的差异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

探讨地缘政治学和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段时期最有意义的特点。与之相随的是对国家本身的作用提出的强烈质疑，并对目前所构成的国家是不是现实世界的最好组织形式也提出了质疑。除了它们显然无力独立解决诸如环境恶化和全球变暖这样的紧迫问题之外，正是它们的侵略和自私的行为造成了与人类相悖的局面。因此，它们可以被视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随着冷战的结束，新近显现的地缘政治学景观乍看起来因其多样性和精妙而显得温和并具有人道的和人性化的特点，这与意识形态对抗时期的严酷和单调乏味形成鲜明的对比，一种受制于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思想的景观似乎已让位于福里德里希·舒马赫（Friedrich Schumacher）·思想的景观①。然而，立刻就变得十分明朗的是，新近呈现出来的地缘政治学景观并不是它表面所呈现的那样不含

① 舒马赫坚持认为，共产主义的庞大思想模糊了人类的视线。在他所著的《小即美：仿若民众关心的经济学》（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1973）一书中断言，真实的人类规模是小规模，这似乎又回到人类的真正需要是否能够得到满足的问题上去了。

有暴力的倾向。根本上而言，它与20世纪40年代冷战初期存在的地缘政治学景观一样。它由主权国家所组成。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的解冻，此前的国家之间关系的对抗行为在诸多地方重新开始，这些行为方式已经冷却了将近半个世纪。虽然引起冷战后冲突的直接原因是边境冲突及自然资源的争夺，但隐藏其中的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这就是主权国家的自然特性和世界上类似国家功能上所固有的问题。

契伦将地缘政治学定义为"国家作为空间范围的科学"。这一定义比森普尔将政治地理学定义为"国家与土地之间的联系"更为贴切。它表明并不像对单一现象的整体分析那样对两个独立的现象间的"关系"进行更多的研究。因此这一含义更为明确。即国家不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地理因素影响的法律或政治实体，它更是由自身构成的一种空间现象，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如此去研究。对于契伦来说，这比国家是否有机体的问题更为根本。契伦指出，它有可能或不可能被视为一个有机体。但毫无疑问的是，它首先是一个空间实体。正是这一点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真正区分开来。于是形成了两种观点：其中一些人仍旧坚持"关系"方式，认为中心任务是确立主要源自于影响国家性质和行为的自然环境的"支配力"；而另一些人则追随了契伦的观点，认为国家是一个空间实体，并且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得到充分认识和解释。

正如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拉策尔和契伦都认为只有

民族国家才能构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体系。对他们来说，它意味着稳定、秩序和目标，它的存在也是这一切得以持续的保证。他们的这一思想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宣称，国家（他指的是民族国家）是政治存在的最高形式，具体体现在它所实现的是普遍的目标和愿望。从地缘政治的观点来看，民族国家使复杂的政治版图明确而清晰，并以一种基于民族观念的逻辑体系代替了进去形形色色摇摇欲坠的帝国。拉策尔和契伦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织体系，如若民族国家不复存在，那么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极有可能滑向混乱。这就是地缘政治学产生之初赋予其特性的依附于民族国家利益的哲学基础。

一个世纪之后，民族国家不再具有它从前所拥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这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地缘政治学不再局限于它以往的范围。相反，民族国家的作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而对高于和低于它的组织体系的可能性则产生了新的兴趣。特别是奥拉夫林（O' Loughlin）和赫斯克（Heske）提到的“全球规模机构”对于整个设想而言至关重要，并被认为是地缘政治学从“战争学科”向“和平学科”转变的基本先决条件。在着手对全球体系进行分析之前，首先必须对世界地缘政治空间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性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认真思考。

第五章

国家的空间形态

世界政治地图由许多形状、大小各不相同的领土单位拼凑而成。这些单位即是主权国家，它们各自在其所管辖的领土范围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另外还可能有一些低于或超越国家的其它类型的实体。国家的领土可被分割为更小的政治实体（地方政府）而国家本身也可能是那些出于特定目的而建立的国家集团中的一员。然而，只有国家才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要角色，重大的决策也由国家作出。那些超越和低于国家的实体之权力主要由国家授予，而要继续行使其权力也要取决于国家的认可。因此，由于国家内部和国家间实体的权力模糊不定，权力的政治地图就明朗化了，其主要集中于国家层面。这样，国家的外表状况变得最为重要，并且成为理解权力地缘政治过程的关键。

尽管主权国家被视为全球拼图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它们却远不像一副拼图那样拼板大小相对统一。其面积大到如俄罗斯和中国的大陆及次大陆，小到如新加坡和卡塔尔的小岛及半岛。由于习惯运用彩色制图法，世界政治地图给人以形状各异、大小不等、色彩缤纷的初步印象，与其叫它拼图，不如称之为万花筒。然而政治地图又不像万花筒那样具有易于辨认的形状或空间排列。与那些展示世界气候和土壤的自然地图不同，政治地图极少具有可以揭示被描述现象的发生和分布的基本原理和法则的直观图形。至少从表面看，被描述现象的分布似乎是混乱多于有序。

组成这一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世界的国家在现代的词汇中一般被称为“nation—states（民族国家）”，以区别于其它类型的‘states’，如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州在美国内战中就已清楚地表明不具备主权的特征。由于“nation—state”通常被简写为“nation”而非“state”，它同时也被赋予了另一方面的特性。由此，我们的世界显然是由“nations”这样的重要组织和权威机构组成。是“nations”组成了欧洲联盟、非洲国家组织、奥林匹克运动，当然，也包括联合国本身。“state”一词表示政治组织，“nation”一词则表明了一个特定民族的特征。因此，它构成了民族世界中独立国家的基础。

尽管这样的一个世界很符合民族思想倡导者们的愿望，但由于每一个这样的国家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实体，所以要在它们之上建立某种形式的全球性组织则有相当大

的困难。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试图扭转这一状况。联合国作为核心管理机构组织，其成立的目的是要在最高层次上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试图确保这些关系不再破裂，以避免再向过去那样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一组织创始者的意图在于确保和平解决未来争端，“union”的全部含义表明了国家主权的混乱及无序状况的终结以及建立一种基于权威的秩序。从 20 世纪初开始，由于世界被开发完毕事实上结束了几乎主宰了过去 400 年的似乎永无止境的欧洲扩张，使得在这个封闭而有限的世界建立秩序的迫切要求日益明显。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在二战后被联合国所取代。“League”同样主张组织中的基本单位是国家，但“League”表明的是一种比“union”松散得多的集团形式。[①]

19 世纪末期，与最高政治权威相关的最常见的词不是“nation”，而是“power”，其中有七八个“great powers”共同统治着世界。“Empire（帝国）”一词也转而通用为表示列强的领土范围以及它们在世界所攫取的地区的地理差异[②]。协约国为一战进行辩护的缘由之一就是“民族战争”，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也包含了民族独立的原则。但是，当涉及到欧洲以外的附属地区时，这又使帝

---

① “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思想是伍德罗·威尔逊 1918 年元月——在第二次当选总统的时候——在国会发表就职演说中描述的为了公正与持久和平的著名“十四点计划”之一。“联盟”一词的使用意味着联合在一起，而“民族”一词则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与欧洲帝国相比之下的美国的地位以及促进较小民族获得自由的愿望。联盟盟约（章程）被凡尔赛会议采用并写入 1919 年凡尔赛条约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国会的反对，美国始终未能加入国际联盟。

② “帝国（empire）”一词源自拉丁文“imperium”，曾在欧洲一度被广泛使用，它表示一个民族对其它民族的统治，并且依照罗马帝国使之合理化、合法化。在 19 世纪末，帝国主义用来特指欧洲列强创建的世界帝国。

国主义列强陷入极窘迫的境地。一战后，当民族群体成为可以接受的主权原则时，"nation"被赋予了过去建立在王朝及法律基础之上的合法性并逐渐取代了"power"，此时民族——以及伴随的民族主义——仍被广泛视为极具颠覆性和危险性，而且与那些"进一步"的趋向紧密相联，它使得列强尤其是它们的统治者对未来充满恐惧。然而，在更多脆弱的帝国坍塌之后，甚至那些从前抨击"nation"一词的人也接受了它，因为它比"power"或"empire"更为合适，它还得到了一些机构的称赞，如新英国广播公司在其格言中明确地宣称"民族应该与民族谈论和平"，此时，欧洲已有12个民族摆脱了过去帝国的统治而独立，而国际联盟自身已有25个成员国。1944年，在过了20年之后，联合国在旧金山建立之初时共有成员国40个，而到了1996年，这个世界机构的成员国数量已达130个。现在，人们断定，世界政治地图由"nations"组成，只有较小的一部分是从前的附属领地。[①]

如上所述，尽管"nation"和"state"被用来称呼同一个实体，但实际上却代表着两种极为不同的特性，并不一定具有共同的领土范围。"state"一词来自拉丁文"status"，原意是"被指定的"或"被安排的"，它指的是一种最高的政治组织结构，其政府在某个特定的区域拥有合法权威。而另一方面，"nation"来自拉丁文"natio"，原意为"起源"，它通常用来表示有共同起源和共同特征的

① 这类地区中最为显著的是南极洲，它包括许多国家建在那里的属地。它不仅成为了世界重要的科学实验地区之一，而且也是国际合作的一个有趣的实验。

一个群体。一般而言，它在当代则多被用来代表一个特定民族的文化特征而非政治地位，这种文化特征一般包括语言、历史、宗教以及艺术遗产等内容，“nation—state”的含义准确来讲就是具有共同文化特征，居住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并且拥有共同政府的人口群体。事实上，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而非一般的或标准的状况。在民族主义者看来，它具有和谐完美的特性，充满正义感和整体观念。这是一种借助绘图学原理利用所喜爱的颜色描绘多彩政治地图的理想，这种多彩政治地图用于强调任何特定区域内的同质观。地缘政治色码在于强调存在一种“自然区域”的观点，它具有与贯穿其中的自然特征同样的恒定性。

这表明一个民族和一片领土连系在一起，并将自然景观变成了精神景观。而被视为民族遗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丘陵和山脉、河流和森林则成为了民族精神特性的自然表现。民族神话与传说以及用以强化一个民族与一片领土之间纽带的民族祭拜，不断加深观念中实际存在的决定论成份。因此它们结合成为了一个整体。

实际上，民族与领土，“nation”与“state”之间是极少完全相吻合的，在自然和人文两方而都可能存在的明显的内在多样性足以掩盖政治地图强烈的色彩和与之相应的坚定的民族崇拜。比如，“nation”一词常常用来指法兰西、西班牙和大不列颠，但实际上这几个国家现在所形成的边界都没能体现民族性的特征。事实上，这几个国家的领土范围内明显存在次国家文化体，“nation”这一名称仍然适用；而反过来，主导民族的诸多特征也可在其疆界之

外找到。（图 5.1）近年来人们常见到的是较小的亚国家民族而不是主导民族自身具有最强烈的民族意识，所以，在苏格兰、加泰罗尼亚（西班牙东北部。——译者）和布列塔尼（法国西北部的半岛和旧省份。——译者）激起的公众情绪比它们各自所属的国家要强烈得多。爱尔兰、巴斯克国（Euskadi）以及科西嘉都发动了从其所在的民族国家中分离出来的运动，它们试图通过持久的暴力斗争来建立自己的社会。

在任何特定时期，国家所喜欢使用的统一名称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反映了愿望而不是现实。“nation”是一个比“state”更能唤起感情的词汇，因而各国更推崇使用“nation”一词，目的在于使建立在自然力量、上帝旨意、朝代意愿或全部三者的综合体基础之上的政治结构人性化。“nation”一词逐渐被国家所接受。正如罗马帝国最终接受了天主教一样。这样，“nation”这一充满魅力和激情的概念逐渐注入到了合法的行政概念“state”之中，从而产生了一种热情和忠诚的公众意识。对于政府来说，统治一块充满激情和活力的地方比仅仅统治一小块由于过去的强权政治行为而形成的领土要容易得多。出于它们自己的目的，这些国家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要在其领土范围内建立与民族原则相符的同一性。因此，戈伯莱特认为国家先于民族，民族实际上是国家的创造物，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由于政府为了国家而弱化矛盾，强调同一性，其必然结果就是强化和促进了国家间的差异。例如 A 国的特征被视为与其邻国 B 国的特征完全不同。一个国家或许甚

至会通过对其邻国大不相同的特征的分析来获得其独特感。作为领土单位的一个国家，其“自然特性”也必然包含其它国家乃至全球国家的“自然特性”。这样，多彩政治地图就像那些气候和土壤地图一样表现了一种明确的现实。因此，它就变成了一种政治工具，其空间组成部分的领土是如此神圣，以至于为保卫其边境不受侵犯不惜付出血的代价。虽然掩盖一国疆界之内的差异和始终坚持同一性常常是极为困难的事情，但是通过揭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则较容易达到这一目的。

综上所述，“nation—state”总的分类包括大小、形状、人口、自然资源、财富和实力等方面差别极大的个体，这种差异所导致的问题是，这些个体是否构成一个整体范畴。由于它们实际上是地理实体，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其发展过程中一些特定因素起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具有地理和历史的影响范围，其结果就是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一特定地理区域可能产生某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类型。尽管实际上存在着一些差异很大的国家类型，但某一特定类型的国家会成为当时的国家规范。尽管在它们的许多特性上会显示出极大的不同，但从本质上看它们都具有相同的地缘政治结构，而且同地区中的其它国家的关系也基本相同。同样，在另一地区或另一时期出现的国家之间会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而与先前出现的国家不同。要理解任一特定时期组成多彩政治格局的国家的极大差异性，关键要以变化的观点来看待政治格局。

参照意大利半岛可清楚地表明历时的地缘政治变化及

其成因。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叶，城邦是意大利最主要的地缘政治组织形式。这些城市，如南部的希腊和腓尼基（Phoenician）以及北部的伊特鲁里亚（Etruscan），是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城邦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们结成联盟和集团以加强防御和贸易，到公元初年，其中的一个城市罗马上升到统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城市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地中海城邦，但是它比它们中的一般的城邦具有更成熟的领土意识，它首先在意大利获得了统治地位[①]，并由此如其所愿征服了其它所有的城邦。在取得同迦太基的布匿战争（Punic Wars）的胜利之后，罗马控制了地中海盆地西部，并最终夺取了整个地中海地区，从而确立了罗马的统治。这里就成为了罗马的地中海（Mare Nostrum），被视为是罗马行使权力的“自然”地区。由于帝国的边界进一步拓展，北到莱茵河，东到美索不达米亚，其权力更加稳固了。

起初，这个庞大的政体采取的是罗马共和国（Respublica Romana）的形式，一个罗马统治下的高度自治城市集团，其功效是在其所统治的广大的领土上维持“泛罗马”（Pax Romana）结构。到公元一世纪，这个共和国变成了“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罗马也从地中海那些平等城市中的第一个（Primus inter Parer）变成了“主

---

① 远古时期，意大利是意大利半岛卢比孔河以南的部分。作为第一块被罗马帝国征服的领土，它保持了其在罗马帝国的心脏部位的特殊地位。它具有后来和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较高的文化和经济一体化程度。因而，罗马的将军们是禁止进军意大利的，这就是为什么尤利乌斯·凯撒皇帝的“跨越卢比孔河”对于罗马来说会是特别重要的事件，因为它意味着元老院权力的终结以及皇帝统治的开始。

宰世界的城邦”（Caput Mundi）——控制着古代世界之命运的领导城市。

公元五世纪罗马帝国衰落下去，神圣罗马则取而代之，在基督教的联合下崛起于北欧，新帝国的中心座落在莱茵河中部，而过去这里则是罗马帝国的北部疆界。随着权力越过阿尔卑斯山脉，意大利的地位随之沦落为帝国的一个附属地区，不过，这个帝国仍然视地中海为它的文明，并且以罗马城的名字命名。罗马城保留了其新帝国宗教中心的地位，成为联结帝国和罗马教皇势力轴线的南端。但是，随着莱茵河核心地区拥有的经济政治实力所无法克服的强烈的离心倾向的出现，新帝国旋即衰落了。

由于权力中心的衰落，城邦再次在意大利出现。威尼斯是第一个新型城邦，它对于地中海贸易体系的复兴至关重要，并成为了整个意大利半岛主要政治形式的原型。到15世纪，意大利已经变成一个由城邦组成的半岛，而且也是地中海经济和商业的中心。

在意大利半岛的北部边缘周围座落着一些属于意大利世界外围文化的国家，其中之一是萨伏伊公国（the Duchy of Savoy），它环抱在阿尔卑斯山脉之中，与法国共有一段很长的边界线。这个国家成为影响北方进入南方的前哨：其中法国大革命最有影响的遗产之一是民族国家的思想，萨瓦公国从其阿尔卑斯中心地区向南延伸至波河盆地，从而变成了皮埃蒙特公国（Piedmont）。正是通过皮埃蒙特公国，北欧的民族思想对意大利产生了影响，而这个公国，即后来的王国，也成为北部思想往意大利土壤上移植的渠

道。新意大利民族主义以皮特蒙特公国为其基地，并以意大利的名义吸收了那些城邦，排除了外来影响，创造了产生于1860年的意大利民族国家（见图5.2a），“皮特蒙特化（piedmontisation）”进程以一种到下个世纪时普及到整个欧洲的方式使半岛发生了转变。然而，这一时期盛行的地缘政治实体仍然是强国而不是民族，因而新生的意大利很快便渴望获得大国地位，它开始建立海外帝国，因为这是一个大国最重要的标志。意大利的经济基础要支撑一个成功的帝国计划显得极为不足，一个比帝国计划来得迟的新强国顶多只能创建一个象征性的帝国。一战后，以贝尼多·墨索里尼为领导的法西斯分子按权力主义的方式重组了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名字源自于“束棒”（Fasces），它曾经是罗马权力的象征，法西斯党意欲恢复罗马帝国的权力。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结合成一种野心，即通过创建一个统治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帝国来建立意大利的权力。而在德国和中欧，则试图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为其获取在地中海的支配地位的野心进行辩护。然而，意大利国内薄弱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支撑这个第二帝国计划。随着1943年法西斯政权的跨台，意大利不得不放弃了它的帝国主义野心，而重新依赖于这个近一个世纪前就形成的民族。

由于意大利的语言和文化特征并未受到严重质疑，民族野心似乎比较容易实现，但是它却因半岛南部和北部之间存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差异而告失败。基于法国模式而建立一个强大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野心归于失败，原因就在子无法将罗马以南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地区（Mezzo-

giorno，大致指罗马所在纬度以南地区，包括撒丁岛和西西里岛。——译者）完全纳入国家之内，并使其获得更发达的北方从统一中已经获得的显著利益。权力转移及放松对作为影响法国的遗产的意大利中央集权国家统治的尝试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见图5.2b）。1947年，在法西斯倒台后制定的宪法中赋予这些地区越来越多的权力，尽管实际上授予和履行这些权力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当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受到这样挑战的时候，对外而言，法西斯时期失败了的地中海的帝国主义让位予一种新的战后国际主义精神，人们认为，要解决国家的问题就必须加强与其欧洲邻国的联系，而不是排外的民族主义。加斯佩里（Alcide de Gasperi）总理曾谈到，既然统治地中海和殖民地的解决方案失败了，那么，“意大利就必须翻越阿尔卑斯山脉”[①]。意大利再一次从北欧寻求解决其在世界上的身份和地位问题的办法。这种新的观念称做超国家主义，它同一百多年前的民族主义一样从法国传播而来。1951年，意大利成为签订罗马条约的“创始六国”之一，他们着手尝试以琼·莫内特（Jean Monnet）“共同体”观念为基础的新的超国家主义途径。意大利因而翻越了阿尔卑斯山，成为了新西欧的一部分，并寻求集体解决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同时，意大利政府持续紧张的经济和政治局势导致了

① 加斯佩里（1881—1954）在法西斯时期坐过监牢，1945年至1953年成为意大利的总理，他是欧洲一体化的早期支持者，并且使意大利加入了北约、欧洲理事会和欧洲煤钢共同体。意大利在战后采取极其亲欧洲的政策主要应归功于他。

强烈的地区运动，其中如伦巴第（Lombard）联盟之类的一些运动主张，意大利政府应被建立在这些地区之上的新政府所取代。因此，20 世纪 90 年代再次对政府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曾在 19 世纪 80 年代出现过。强有力的新地区主义威胁从下面开始侵蚀其权力，而与此同时，欧洲联盟从上面日益渗入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权限范围。

显而易见，意大利半岛的政治实体经历过剧烈的历时变迁。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中心，在全胜的罗马帝国时期，除了使意大利成为西部核心区的主要权力中心外，还给意大利和整个地中海世界带来了相应的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和内部和平。但是 20 世纪初期法西斯分子重建罗马帝国的尝试无疑是一场灾难。加斯佩里和二战后的一批意大利政客们试图在欧洲的背景下解决 19 世纪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建立带来的诸多问题。

这一研究表明，在任何特定时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形式主要应归因于达到一个期望目标的广泛愿望，而不是对处于当时背景下的那种政治形式之期望的公正评价。因此，它不是一种实际的现象，而更像是一种理想，它在采取了这种政治形式的地区所起到的作用则因时间和地区而异。由此很容易分辨代表了不同时期的地缘政治形式，并进行分类。从这种历史的角度来看，民族国家构成了其中的一种。尽管民族国家的类型特征可以根据其远古时候就已存在的形式加以辨别，但是，只是在本世纪它才成为一种人们普遍向往的“标准”。

所以，尽管从同步的角度看，世界政治地图给人留下

的是不相联系的形状和颜色的混乱印象，但从历时的角度看，如果进行动态的研究，很明显可以发现存在各种模式，而且可以探究正在发生的进程。具有一定特征的地缘政治实体被具有其它特征的地缘政治实体所取代，而后者往往被置于先于它的形式之上，并常常与之相互影响，完成杂交。在这些选择的新形式成为人们所期望的范例的时候，早先的一些形式却仍然存留着。就此而言，在以城邦地缘政治组织形式为范例的时代和地区，先前的形式持续存留着。在帝国已占居支配地位时，尚留有城邦的痕迹。而今，当所谓的民族国家已成为整个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地缘政治形式的时候，其它类型的国家也继续与民族国家同时存在。所以说，任何时代的世界政治地图都是一份手稿，其中每一页都记载着不同的时期。只有在人们认为，它有意义时它才如此。

在任何特定时期存在非代表性的地缘政治形式的事实通常被与主导形式相关的术语的蓄意使用所遮掩了。因非代表性而很少被接受的形式因而被罩上了那一时代正确的政治术语的外衣。在远古时代，“polis”除了表示城邦之外，常常用来描述那些实际上是原帝国的实体。罗马由一个共和国变成一帝国的时候，“Respublica”一词仍被长期使用，当帝国的中心从罗马移到康斯坦丁堡——博斯普鲁斯的“第二罗马”——意大利半岛被野蛮部落分割的时候，“罗马帝国”一词仍被继续沿用了一千年。事实是，在1453年帝国正式灭亡前许多年，其所遗留下来的收缩成了一个城邦集团，并最终变成了单一的拜占庭希腊城

邦。但是其臣民仍然称自己为罗马人，依旧受皇帝所统治，而且自称为基督教（东正教）的真正中心。在西方，罗马的帝国思想延续着，而欧洲被日尔曼部落继承了，日尔曼部落创建了神圣罗马帝国，它象征性的对离心倾向越来越强的西欧行使着管辖权。这个不合时代要求的帝国是法国革命将其作为主要目标要推翻的古老政权的中心，而法国革命将欧洲推上了促使民族国家成为标准模式的进程。19世纪上半叶，“nation”广泛地与进步和仁爱相联系，而“empire”则伴随着落后与压迫。由于欧洲的海上列强力图巩固它们的世界财富，所以他们起初忌讳使用“empire”一词。与进步和活力相连的“大不列颠”就被长久地使用，而没有使用“大英帝国”一词。法国，一个实际上正着手于建立世界帝国的共和国，不久也效仿使用“伟大的法兰西”一词。事实上，英国不愿承认它实际已成为世界帝国的中心和印度莫卧尔（始于1526年的印度王朝。——译者）王朝的继承者。1876年，维多利亚“女王”的头衔代表了极大的心理转变。然而，此时帝国重新盛行，“新帝国主义”达到了顶峰。帝国是一种表明一个国家处在世界权力的前列的愿望。1871年德国统一之时，新国家命名为帝国（Reich），其国王很快便回忆起中世纪罗马帝国的辉煌。同样，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也将其国家命名为“帝国”，改称其最高统治者为国王和女王。

在欧洲和其它地区的帝国衰落之后，民族国家逐渐成为主导的地缘政治形式，它代表了人们对常常会促进和推

动地缘政治形式的所有重大变化的社会进步的向往。但是，人们也看到了民族国家最根本的弱点，即它的两个组成部分：领土和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关系存在看两种极端：绝对吻合和迥然相异。然而，实际情况却往往界于这两者之间，其接近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的建立和国家的建立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究竟是谁先出现。如果是民族，那么，而后出现的国家则代表着对其共同意识的表达以及要求从外国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愿望；如果是国家，那么民族则被纳入了与国家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相关的领土进程之中。那么，戈伯莱特所言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被国家为其自身的目的而创造并利用了，如果依照这个事实，其结果产生的应该是国家民族而不是民族国家。

实际上，整个进程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形式，其终极产品将是一种伪装成民族国家并经过粉饰的帝国。它是“帝国民族”周期现象的另一种形式，它进行扩张并在毗邻的人群中攫取了统治地位，进而又寻求将其自身的民族特性强加于他们。民族国家和国家民族的例子都可以在 19 世纪的欧洲找到。

现代希腊是民族国家现象的一个例子，它出现于 19 世纪早期，是一个对自己的文化特征有着强烈的意识，并对奥斯曼帝国几百年来企图强加于其上的异族文化强烈反对的民族共同反抗的结果。1829 年在伦敦条约基础上成立的希腊王国仅由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us）、基克拉迪群岛（Cyclades）以及紧靠着科林斯湾北部的一块狭

长的地区组成。一个世纪之后的塞夫勒条约（1920年）如一年前的凡尔塞条约一样，民族独立是一条主要的原则。奥托曼帝国从此消失于历史之中，而希腊王国则获得了几乎整个半岛以及爱琴海。

另一方面，匈牙利王国则是国家民族现象的一个范例，双重君主政体成立并于1867年签订的《协定》中，大量非匈牙利语的领土被划给了匈牙利，而且在管理帝国的过程中匈牙利人和奥地利人联合了起来。尽管匈牙利曾经是在19世纪后半叶席卷了中欧和东欧的民族主义的倡导国之一，但是到世纪末匈牙利自己在对待其广阔的疆域内的弱小民族时仍以一种类似帝国的方式进行。匈牙利为了在它所控制的整个地区确立匈牙利和匈牙利语的统治地位做出了许多努力，1918年奥匈帝国灭亡时，一个独立的匈牙利国诞生了，但在1920年的“川农（Trianon）条约”中匈牙利损失了2/3的土地，而且大量的匈牙利人留在了新国家刚刚划定的边界之外。然而，马扎尔（Magyar）帝国主义和“大匈牙利”的思想保存下来了，这种思想于二战期间在纳粹德国的保护之下曾一度复活。

因此，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的建立通常与一个特定人群的认同感以及外来统治的威胁相联系。另一方面，国家民族则以某一特定文化群体为其获得对更广大地区统治地位的基础。民族被改变了，发展了，一个适应国家及其需要的新民族产生了。对外扩张的国家的特性变成它所占领的整个这一地区的特性时，新的民族特性就得到了增强。

在很大程度上，西班牙、法兰西和大不列颠被认为是

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典型，但事实上其中每一个国家的建立都是创建国家民族进程的结果，这三个国家的诞生都是它们从各自的核心地区梅色塔（Meseta）、巴黎以及伦敦盆地向具有不同的语言、文化以及不同的历史背景的地区进行领土扩张的结果。这些国家的政策是将权力集中到其核心地区，然后，作为增强国家实力的一个步骤将被征服地区的文化吸收到核心地区中去，卡斯提尔（Castile）、法国和英格兰的核心国家建立在它们的基础之上。这就是国家民族区别于民族国家和帝国的最显著的特点，后者所统治的是相互不同的民族和地区，但又保留了一种很少而又通常是外来的权力。它们很少尝试完全吸收其所统治的民族，只要它们民族独特性的表现没有影响权力的构成或者防碍帝国发挥作用。而另一方面，国家民族则努力将被征服地区和民族完全吸收到以具有高度同一性的主导文化为基础的扩大了的“民族”中来。

复杂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本质上存在着连续与变化的对立，对变化的局势反应敏锐的新地缘政治组织形式的发展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以阻止变化和维持现状。衰落中的帝国总是在阻止解体，从前占统治地位的城市则努力维持它们的权力地位。长久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古老政体从来没有准备默认它们的灭亡，使民族国家（或国家民族）变得长久而永恒的努力也蕴含了古老政体的味道。因此，政治地图的变化极少是一种渐进的过程，而常常是突变的结果。它的发生通常是由于被支持者视为牢固而又稳定的既定地缘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的现实变化导致的压力之间结

构失衡所引发的战争。战争创造了新的政治地图，它在一定时期内极准确地反映了权力分配的现实，而新地图能维持多久则取决于它将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反映现实。

对长期的变化模式的研究同样揭示了两种相反的空间变化过程的交替，分别是离心变化过程和向心变化过程，它们对政治地图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影响，向心变化过程趋向统一，其结果是组成更大的政治实体；而离心变化过程则导致分裂，其结果是产生一些更小的政治实体。前者是某些国家领土扩张趋向的结果，而领土扩张的成功，换句话说，更大的国家在多大的范围存在以及维持了多长时间，则取决于特定时期内部和外部的地缘政治环境。内部环境主要在于核心地区的权力以及其确保并维持统治权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实力取决于与全部领土有关的大小和位置以及它所拥有的必要的物质和人力资源等因素，如果扩张了的核心地区，包括最大的文化同一地区——或者说核心民族——覆盖了整个国家的大部分领土，并且经济实力雄厚，人口众多，那么，事实证明这个国家更有可能成功地维持统治。举例来说，从塞纳河（seine）盆地延伸至卢瓦尔河（Loire）和加伦河（Garonne）广袤的法国核心地区就具有与它后来向东扩张至莱茵河及阿尔卑斯山相应的范围和实力——过去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地盘——因而有助于成功地建立和维持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法国核心地区相对于国家的整个地区来说面积大且实力强，这使它比较容易扩展到源于核心区的高层文化同一性的被征服地区。1479 年由卡斯提尔（Castile）和阿拉贡（Aragon）的

君王联盟建立的西班牙和1707年由英格兰和苏格兰君王联合建立的大不列颠也是同样类型的国家民族，但是新国家的任何一个广袤的核心地区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将其疆域内其它群体中存在的强烈的独立愿望纳入到自己国家的民族特性中来。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拥有足够的实力来维护其核心民族的统治地位，并且确保其广袤的领土是民族国家。

在其它情况下，民族特性的想象显得过于夸大而难以维持，而核心地区和核心民族的实力都不足以维持国家的统一。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南斯拉夫，南部斯拉夫人的联盟。这个联邦国家是在奥匈帝国解体之后于1918年成立的，以塞族和克族的联盟为中心，它也包括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其它一些民族。新国家的原核心民族是塞尔维亚，作为一个独立的并且自1878年以来一直独立于奥斯曼帝国之外的巴尔干国家，塞尔维亚有着悠久而又辉煌的历史。尽管有如此的实力和影响力，但它要在南斯拉夫国中维持霸权却遭到其它民族的强烈反对。无论是接受塞族的民族特性为新国家的民族特性还是创造某种新的民族特性的可能性都微乎极微。“斯拉夫人”整体的情感也还没有强烈到在这个人为的国家中替代历史中形成的民族特性。1990年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厦坍塌之后，“民族”和“国家”间实际上不再有任何一致性。单个国家自身似乎没有足够强大到或一定能够生存下去。塞尔维亚在前南斯拉夫中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卡斯提尔之子西班牙或英格兰之于大不列颠极为相似，但有所不

同的是，塞尔维亚不具备将民族国家转变为国家民族的能力。(图 5.3)

由此可以看清为什么有些国家继续存在而有的国家则与其地缘政治结构不再有任何联系，即便对于那些已经成为强国的国家也是如此。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结构联系是最重要的。因而，尽管我们发现这两者实际分别代表不同的属性，它们之间的关联通常也极为细微，但两者之间实际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它们相互促进，而且这两者结合得越紧密，就越稳固持久。核心地区对于民族和国家来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连结民族和国家的领土纽带，因而也是民族和国家兴亡的真正关键。核心区是国家中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也可能具有最强的民族特性。如果离开核心区，民族和国家的特征都会削弱。因此国家的面积越大，分裂势力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最终的结果将导致国家的分裂，尽管外在因素似乎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国家分裂的深层原因还是在于其内部结构。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国家中存在的从属部分拒绝接受核心地区或者核心民族的统治。一个国家越大，核心地区要维持和确保其对周边地区的成功统治就越难，离心势力就越强。它们一旦强大到胜过核心地区，国家就会分裂。虽然任何一个国家的分裂都可能存在大量的国际因素，但它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种状况，因此国家越大地位越重要，其影响就会越大，范围也越广泛。这不仅对某个时期的国际体系提出了挑战，也为一个新的国际体系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新体系必然是建立在有助于推翻旧体系的观念的基础之上，因此至

少在最初显得与旧体系不一样。向心趋势让位于离心趋势，而基于几个大国建立起来的新体系将包括大量的小国家。然而，新体系的内部也包含了重建旧体系的种子。这是因为某些新国家企图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并且使其对国际局势更具控制力。这使多国格局内部又出现新的大国和霸权或集体霸权。一个国家获取霸权地位的企图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新的离心和向心变化过程。

可见，只有从历史的角度对国家进行分类才具有深远的意义。领土面积的极大差异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对行为产生影响，领土面积大的国家的行为很可能具有使它们区别于小国行为的某些特征。琼·戈特曼（Jean Gottmann）将国家分为“亚历山大式”和“柏拉图式”两种特性。前一种国家以那种通过征服以及觊觎全球而获得庞大领土的国家为代表，后者往往是由一个城市加上其腹地组成的小国。前者是领土型的，对它来说，夺取和统治领土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对于后者来说，夺取领土处于次要地位，它最关注的是将自己并入一个更广阔的体系之中。可见，前者是向心变化过程的最终产物，依据它所能够控制的领地来衡量其成功；后者的成功则依据其并入更大体系中的程度来衡量。

进行同样基本区分的时候，戈伯莱特使用了“集中型”和“广阔型”两个词来对国家进行分类，不过他还做了更进一步的划分。被戈伯莱特称为“广阔型”的国家不只是面积大，而且基本上显得很幼稚，不大会处理与它们所占领的领土间的关系。它们开采并恣意挥霍人力和自然

资源。由于它们无法妥善管理它们之所得，因而急于扩张。根据戈伯莱特所言，“集中型国家进化程度最高”，并且发展了他所谓的“质量最佳的人文地理区域”。因而，它们并不需要这么多的领土，因为他们能够更好地经营它们所占有的有限的领土。同时，它们能够更有效、更节俭地使用它们的资源，它们才是进步的代表，而不是更大的国家。在这两类国家之间戈伯莱特又加上了被他称为“混和型”的一类，这类国家既拥有一个集中核心区也拥有广阔的领土。一个强大的核心区的存在为领土扩张提供了实力、目标和方向，而不至于蜕变成为了自己而进行的随意和盲目的征服。戈伯莱特的第三类也表明了扩张进程的另一个特征，即所有最成功、统治最持久的大国的产生都是小国扩张的结果，而且尽管两者行为模式各异，但仍然保持着明显的联系。最初的小国转变成后来大国中的核心地区和核心民族，它们往往保留其在大国中的权力地位，尽管由于进一步的扩张，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新占有的地区。那些成功地获取统治地位的国家显然具有区别于其它国家的特定的地缘政治结构。

尽管国家的特征迥异，而且不断地出现或消失于地图之上，但是，民族却成为了更为根深蒂固、更加持久的现实——虽然它们的起源同国家的起源密不可分，而且在特殊情况下它们的起源本身就是在蓄意地创建国家。首都城市、核心区和文化区也是一样，所有这些地缘政治现象都具有在某些新的政治形式中生存、适应和再生的强大能力。因而它们可谓是永久的地缘政治坐标，起着连结新体

系及其前身的作用。结果，新体系嵌入到一个不断运动的地缘政治连续体中，从前的城邦成为新帝国的首府，而衰落的帝国的核心地区则成为新民族国家新生的核心地区。

因此，地缘政治变化过程根本上而言是可转换的，而处于一定空间和时间中的政治形式则成为另一种政治形式的障碍，那么，给国家下一个比盛行于某一特定时期的概念更广泛的定义就变得极为重要。人们不断尝试使处于混乱和毁灭状态的人类社会确立秩序，因而相继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地缘政治形式。如果一种领土组织形式解体或者不令人满意，人们就会提出新的观念，并相应创建新的地缘政治形式。史蒂芬·琼斯（Stephen Jones）透析了这种从观念到实际的转变，并称之为“统一场论（Unified Field Theory)”。起初，新的观念、甚至由此产生的现实因受到它们自身性质的限制而具有实验的特性。在维达尔看来，最适用、最有效的地缘政治组织形式通常有多种可能，但最终成为范例的是显得最迎合时代需要的那种形式。在现代欧洲早期，城市的兴起及其逐渐转变为城邦，是对帝国权威瓦解的离心反应，也是对以新的有效结构取而代之的明显需求。伴随着按照城邦方式重建的是不断增长的稳定与财富，而文艺复兴主要是意大利和别的地方城市文化兴起的产物。同样，19世纪早期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随后在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应用，是对大国操纵的被称作古老政体的难以忍受的和呆滞的体系的一种相似的离心反应。

因而，在任何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地缘政治组织形式特

征本身就是明确要求改变的结果。新的地缘政治形式能否成功废黜旧体制并取代它成为现实秩序则取决于它是否体现时代的愿望，是否提供了实现愿望的途径。成功是成功之源，作为成功的形式出现的东西就成为了一种理想和典范的模式，所谓的民族国家就是当时主要的例子。

然而，尽管存在着以一种特定形式占据统治地位的倾向，但不能因此得出在任何特定时期只有一种可能模式的结论。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人群中可能同时出现不同的模式。胜利国和被征服国；殖民国和殖民地；统治国和被统治国；富国和穷国；大国和小国对最理想的进步途径可能都持有各自不同观念。具有相似特点的特定国家集团更有可能组成具有相同基本理想模式的结构。因而在19世纪就要落下帏幕的时候，帝国的建立成为大国最感兴趣的目标，帝国主义成为了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帝国主义模式因而成为那些渴望获得大国地位的国家的选择。正如第2章注释4中提到的那样，由于非洲是欧洲殖民主义垂涎的世界最后一片地区，实际上主要的大国都参与了“掠夺非洲”，尽管它们对所占领地区的价值往往极度怀疑。

与此同时，中东欧帝国的附属民族获得自由的渴望愈来愈强烈，而且到20世纪初期这种渴望也漫延到了全球。面对帝国主义强国，由于它们缺乏取得成功所需要的足够的物质力量和技术资源，因而民族的同一性认识就成为了它们的主要武器，民族国家成为它们所选择的模式。这样，到本世纪初期，民族国家和帝国作为两种不同的模式极其不易地同时存在着，因为它们各自的目标是彼此相斥

的。这两种模式都是基于愿望而非实际，而且往往脱离了地缘政治现实。海外帝国很少能够真正满足特定国家的实际需要，但是渴望大国地位的领导人仍然推行帝国主义。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要夺取那些对德国来说根本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海外殖民地。帝国盛极一时，而它们的皇帝需要新衣。同样，民族的观念也往往与帝国主义列强所拥有的海外领地的实际状况不相符。某些殖民地区内部总是存在着巨大的种族差异，而种族现状往往跨越了帝国主义者自身人为划分的疆界。在非洲或亚洲，民族国家的模式以及寻求使之得以实现的民族主义显得有些脱离实际。

因此，民族和帝国这两种概念被用来标榜一定的政治行为过程。它们建立在对特定组织形式的内在力量的信念之上。它们坚定地奉行领土主义，因为它们所期望的目标与对某块领土的拥有和统治紧密相关。

二战后，这两种模式之一的帝国主义模式迅速转变为一种反模式。它开始与源于全球不平等和不公正的世界结构中所确立的秩序脱离干系。殖民地民族本身和新一代的欧洲人认为，最好的情形是它与现代世界毫无瓜葛，最坏的情形是它成为欧洲统治的工具。全世界强大的力量意欲使之迅速消亡。在这两种20世纪初相互竞争的模式中，民族国家模式最终获胜。民族的观念从欧洲转换到了第三世界，而民族国家这一在欧洲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观念开始成为非洲和亚洲整个依附地区的理想模式。因而，在主导模式和挑战模式中都可找到这两种模式。由列强统治的

世界中的大国标准模式受到了成为小国世界范式的民族模式的成功挑战。

然而，当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达到顶峰的时候，第三种模式出现了，这就是共产主义模式，尽管它是从盛行于19世纪后半叶的思想发展而来，但直到1917年的革命使俄国变成苏联之后才形成了一种地缘政治形式。共产主义自称是除帝国和民族国家之外的一种特殊模式，一种比它们更高级的模式，实际上它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是这两者的综合体，因为它是由意识形态而粘合起来的民族构成，从其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它事实上并不彻底，因为它保留了从整体结构上几乎不受侵犯的帝国的领土，而在其内部则可向其组成部分作出妥协。只有一部分可以或多或少地被称为具有民族的特征，但是，基于一些极其微妙的原因，大多数成员国的地位在民族性的原则下提升为了联盟共和国[①]。尽管这个联盟以一种权力移交体制为政治理论，但实际上，它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国家，它对其疆界内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施以更加严格的控制。它最为彻底的地缘政治主张是新国家在领土方面奉行平等主义。因此，作为不平等基石的帝国的向心的“核心——外围结构”特征被财富和实力广泛分配的离心趋势所取代。这些离心结构基于两种类型的内部组织：一是政治组成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联盟共和国；一是经济区域，在特定地区

① 尽管苏联的欧洲部分冠以“民族”之名十分合适，但其亚洲地区却令人疑惑。以前被称为塔吉克斯坦的中亚民族，按照民族原则分成了五个共和国，尽管每一个疆界内都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并使用许多不同的语言。最终，当苏联分解成不同实体而新的主权国家从中诞生之后，它们就都显出了其重要性。

内有发展的任务。这样，带来整体秩序的帝国主义和顾及本地社团特定需要的民族主义都得以保留下来。

二战后，苏联外围从东欧到远东的许多国家，在苏联的完全支持之下建立了一种将民族置于帝国之上的更为松散的模式。这一令人生畏的欧亚集团存在了将近半个世纪。其目标是使第三世界首先选择帝国主义模式，进而选择民族主义模式。尽管古巴和许多亚非国家采纳了这一模式，但就像帝国主义在本世纪前半叶一样，这一模式在后半叶也失败了，分裂势力盛行。自 1990 年以来主权民族国家势不可挡地成为整个世界的主导模式。

总而言之，在构建世界地缘政治空间的组成形式中，有些显现出还保留了旧体制中某些残余的东西，而其它的则表现了地缘政治外表演变的新进程。这种地缘政治外表恰如一份未完成的手稿，可以不断添加新的陌生的形式。其中一些形式注定将成为未来主导的地缘政治现实。过去的事实、目前的现实以及未来的可能性的混杂成为世界政治地图的原材料。反过来，那些在统一的场合中转化为现实的政治思想又将决定其未来的形状和模式。接下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家关系模式究竟能够在多广的范围内加以鉴别，以及它们对地区和世界规模的影响。

第六章

微观、中观和宏观：
地缘政治分析的规模

政治地图似乎赋予了地缘政治世界某种恒久的外表，而实际上，它处于极大的变动之中。不难发现，尽管那些构成部分极不相同，但它们可以组成各种不同功能的类型：局部的、区域的（国家的）和全球的（帝国的）状态。每一种类型的范例都可以在世界政治地图上找到，但它们相应的重要性却存在差异，某一特定时期内其中的一种通常成为范例。实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时代精神”，它导致了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某种特殊的形式或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并且比任何其他类型都更能促进人类繁荣和进步。在国家类型之间和内部，一些国家处于增长势头，而另一些国家的重要性则日渐下降。重要性上升的国家通常伴随着空间或领土的获得，地位下降的国家则伴随着收缩和解体。解

体一旦发生，它通常分成以前曾经存在的部分，其中一些可能进而成为成功的国家，而另外一些则在其它部分成为新国家的核心时并入别的国家。最近典型的解体事例是苏联，苏联在1989年的解体导致政治地图上15个新国家的出现①。

正如我们所见，所有地缘政治的背后都潜藏着两种不同的运行过程。其中之一就是相同类型国家地位的浮沉。它是由这些国家内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波动以及同样发生在其他国家的变化造成的。另一种过程位于前者之后，它是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类型被另一种所取代的过程，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并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它所呈现的是确立全新地缘政治过程的范例变迁。这两种共同作用的过程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地缘政治时空模式中的两个极端。

虽然从全球范围来看这都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但从区域的观点孤立地看待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也是可能的。换句话说，一个人可以选择模式中的部分作更加细致周密的研究。区域范围的分析使我们能够进行更精细的思考从而能够判断和考察特定时间地点形势的更多特征。然而，虽然世界的整体是有限的，因而是给定的，但并不意味它因此自动分为互相联系的空间部分。在地图上唯一作为独立地理实体的明显地区是非洲和南美洲大陆，但它们并没有因此组成地缘政治实体。全球整体分裂为适度和有用的次

---

① ①这其中之一就是拥有苏联一半人口和四分之三领土面积的俄联邦，它充当了继任者的角色。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席位。本质上的区别在于冷战已经结束，俄罗斯与世界上其它大国间的关系已经正常化。

单元或地区并非取决于既定的环境，而是取决于这种区域化所要实现的目标。因此，辨别气候、地形或土壤区域甚至尝试一种综合的方式从而创造一个总的“自然”区域是可能的。但不管怎样，涉及到人类的行为，特定区域的选择并不是某些绝对标准运作的结果，而是取决于参与实践活动的人们的主观意图与认识。因此地缘政治区域化更像是一个深受时间和地区因素影响的主观事务。

如果站在欧洲的角度来看，按惯例北方处于上方，那么位于以欧洲为中心的地图的右边的地区统称为“东方”，但是由于直接与欧洲毗邻的这片土地在早期显然最为著名，而且在欧洲人看来也是最重要的，因而，这些在欧洲的地缘政治认识中始终表现得最为强烈。

从16世纪开始，特殊的“东方”由占压倒优势的奥斯曼帝国组成，这个巨大的具有威胁性的部分横跨欧亚两洲并深深延伸到欧洲的东半部[①]。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东方威胁变成了“东方问题”，它在19世纪下半叶一直困扰着欧洲的政治家们。这与诸如“海峡问题”[②]、圣地问题以及在苏伊士运河1868年开通以后确保欧洲与印度洋海上通道的安全有密切联系。因此，尽管在基普林看

① 奥斯曼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古老分界线被视为东西方的分界限。奥地利承继了其传统的角色(Ostmark)，充当了抵御东方人侵的堡垒。维也纳正东地区也就成为何为西方（欧洲）和何为东方（亚洲）的缓冲地带(cordon sanitaire)。奥地利总理梅特涅(Metternich)戏称东方始于兰激特拉斯(Landstrasse)，这里是东出维也纳的高速公路。

② 海峡问题的焦点在于黑海和地中海水域延伸地段的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外国船舰（非土耳其）的使用权上。尤其是沙俄海军的通行权，沙俄可以利用这一航道从黑海的基地到达地中海。一旦拥有这项权利，沙俄将成为地中海各强国致命的威胁。当*1867*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地中海取代好望角成为欧洲通往东方的主要航道以后，这一问题显得格外紧迫。而它对于大不列颠尤为重要，因此海峡问题与英俄对抗密切相关。

来存在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东方”，“两者毫不相干”，但是，我们无法准确地用一句话来描绘这样一片从巴尔干和地中海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的大片土地。自然，“近东”在欧洲人看来要显得重要些，而遥远的“远东”则无关紧要，直到19世纪末两者才得以正确的划分。前者连结地中海并以奥斯曼帝国为中心，而后者连结太平洋以中国为中心。鲍曼在对一战以后的世界进行研究时运用了区域方法，以便于判断和分析某些特定区域的问题。然而，他在《新世界》一书中只是论及了以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远东”，根本就没有确定“近东”。这一区域只是在下列标题下进行了分析，即“君士坦丁堡及其通道”，“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家园”“安纳托利亚：土耳其帝国的最后残余”。他从未尝试将这些分散的地区合为一体或将这些共同的问题联结起来。

将近20年以后，在另一次战争的前夕，德温特·惠特尔西在《地球与国家》一书中概括地论证了“东方”。“近东”被认为仅仅是“地中海王国”的延伸，其东部构成“连接东方的纽带”。后者被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远东”则根本未曾涉及。然而，20世纪30至4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现实事件表明，“近东”和“远东”已作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区域表现出来。石油与世界枢纽的地理位置是阐明前者的两个首要标准，而后者主要是由日益遭受日本扩张威胁的地区组成。在J.F.霍拉宾（J.F.Horrabin）的《现实事务地图集》中，有专门的部分“地中海与近东”、“日本和远东”。20世纪30年代，地中海地区本身遭到了

意大利地区扩张主义的威胁，总得来看，它不再是惠特尔西所言的“王国”，而成为了欧洲与东方联系的生命线。在欧洲大国看来，它是世界战略要地。

二战以后，在《世界政治地理》（皮尔西和费菲尔德，1948年）的第一版中，鲍曼所言的后奥斯曼帝国的海峡（康斯坦丁堡及其通道）遭到分隔，安拉托尼亚被“土耳其与海峡”所替代。此外另一实体“阿拉伯世界”首次登上世界舞台。其广阔的地区从地中海的东部和南部延伸到亚洲，它的出现加强了地中海与其以东地区的联系。与此同时，令人惊奇的是，皮尔西和费菲尔德使用“中东”这一术语仅限于指伊朗和阿富汗，它被看作是“远东与近东的过渡区域”。在七年后的第二版中，“中东”这一术语所指的区域大为扩展，它不仅包括土耳其、阿拉伯国家和伊朗，而且还包括了新独立的英联邦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大陆的另一边，“东亚”也已出现，并与“澳洲与大洋洲”连在一起。1956年，W.B. 费希尔（W.B.Fisher）使用“西南亚”这一术语来描述这一更紧密的区域。费希尔认为，他所言的“‘中东’这一术语的运用泛指西南亚及其欧洲邻界土耳其和东北非……忽略了逻辑”，因此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么，近东在哪里呢?”。次年，魏格特几乎使用了同样的概念“西南亚”来描述实际相同的地区。两人都强调石油资源和战略位置是首要的评价标准。尽管致力于更精确地描述区域的费希尔等人心存怀疑，但是，在冷战时期的区域术语中，这片地区处于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位置，“中东”成为描绘这一地区的时髦用语。除

了它在大国集团之间的战略位置及其更为重要的石油资源外，其新的世界重要性在于它成为了正在崛起的阿拉伯世界的中心。这里逐渐被视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极其重要的文化统一体，并成为东西方同时追逐的对象。在《分裂世界中的地理和政治》一书中，索尔·科恩（Saul Cohen）认为，这一地区是一条危险的“破碎地带”，它横亘于东西方力量的中心并且威胁着它们之间均势的平衡。在20年后的冷战末期写作的基根（Keegan）和惠特克罗夫特（Wheatcroft）看来，它仍然是世界主要的“冲突地带”，其核心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纷争”和海湾地区这一“恒久的燃点”。

随着中东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而另一方面，远东则沉寂为仅仅是一个便利的地理名词，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它愈加显得过时。在冷战时期，东亚并非被看作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区域而是被视为苏联与西方全球对抗的一部分。它只是欧亚大陆在西面表现极为明显的分裂在东面的翻版，由此看来，与横跨欧洲的“铁幕”相对应的是将亚洲分为共产主义世界与非共产主义世界的“竹幕”（Bamboo Curtain）。在冷战高潮时期，卡尔森（Carlson）将“东亚和东南亚大陆国家”划为共产主义集团的一部分，而“东亚沿海岛国”则令人惊异地被归类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西方”的一部分，科恩在全球地缘政治背景中作了同样的划分，他将全球划分为两大地缘战略区域，分别以苏联和美国为中心（见第七章）。前者是“欧亚大陆力量”，后者是“依靠贸易的海上世界”，这些总的地缘战略

区域又分成许多不同的地缘政治地区。亚洲东部地区不仅根本未当作地缘政治区域来考虑，而且两大地缘战略区域间的界限也将它一分为二。即包含在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区域之内的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东亚大陆，以及“亚洲和大洋洲的沿海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菲律宾——这里属于海洋世界地缘战略区域。

随着冷战的结束，整个地缘政治区域化的问题再次呈现出来。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世界中，中东局势依旧，但它的重要性由于石油与战略位置重要性的下降而遭到了削弱。另一方面，被冷战所分割和处于外围地带的传统的远东国家则日益显示出其全球的重要性。以日本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到了20世纪70年代已跻身工业化国家的前列，成为世界舞台中的主要角色，这已反映在新的区域术语中，“远东”已被“东亚”所取代，而“东亚”进而又被“亚太”所代替。后者所包括的地区比东亚更广，它通常指传统的远东与东南亚。一些并不十分严谨地看待“太平洋”地区的人甚至将这一区域延伸到了南亚。“太平洋”地区这一术语所强调的是某一区域的海洋范围，及其作为海洋世界固有的部分位置。关于这一新范围的最令人回味的术语莫过于“环太平洋圈”，其东半部包括那些迅速发展的国家，它们位于亚洲大陆东海岸从日本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的岛屿和半岛所形成的巨大的弧线上。这强调的不仅仅是东亚在“太平洋”地区的范围，还包括了这些大的群岛新的重要意义，这些群岛在冷战时期只不过是最为重要的欧亚大陆外围偏狭的岛屿。

虽然确定上述地缘政治区域的重大变化不仅与特定地区的发展有关，而且还涉及更广的全球视野，但是，另外一类区域已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因此我们可以辨别其特殊特征的持续性。这种恒久的人类地理区域的存在源于全球人类特征的长期差异。事实上，它们是明显的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自给的“世界”，并且是在各个不同环境下发展的产物。亚历山大大帝曾哀叹已经没有更多的“世界”供他征服，葡萄牙海员所言的“世界”是指他们正在发现的新大陆。那些毫无疑问存在的位于西方的地区形成了“新世界”，以区别于那些众所周知的“旧世界”——尽管只是朦胧和不完善的。费希尔重新使用“世界”一词来表达那些基于巨大的自然屏障如喜玛拉雅山脉或中亚沙漠而形成的人文地理区域。在此，它们被视为“核心区”，指的是与惠特尔西所言的世界核心区不同的区域。同时，他们还拥有沃勒斯坦所归纳的“世界经济”的许多特征，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区域可以提供他们所需物品的绝大部分（见第九章）。

可以断定，历史上曾经存在此种类型的三个巨大核心区（ecumenes）。西部核心区（欧洲——地中海地区）、南部核心区（南亚）和东部核心区（东亚）。每一个核心区都是人类发展的主要中心，其拥有本身的人口、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并在一定的空间中形成了相互联系的特殊个性。虽然十分容易断定核心区的中心，即其主要的具有明显特点的发展区域，但要精确地划定其所有范围则是一个难题。从历史上来看，每个核心区的扩大和缩小都与其

力量和影响结构的变化相一致。总体上而言，东亚核心区正如科特雷尔（Cotterell）所言覆盖东亚大陆，而南亚核心区被斯佩特（Spate）和利尔芒斯（Learmonth）划定为位于喜玛拉雅屏障以南的陆地。西方核心区的确立正如精确划定欧洲的范围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于欧洲大陆东部范围。传统的欧洲东部边界被认为是乌拉尔山脉，但近些年来，这条边界线的划定更贴近于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一线。前者是指包括了俄罗斯的大欧洲，而后者则只是界定了更小更紧凑的大陆。因此，通过划定边界线，统一的文化因素更加明确，从地缘政治上而言，俄国被认为是一个更靠近亚洲而不是欧洲的欧亚大陆国家。然而，乌拉尔边界线与另外两大核心区范围的地理界限更符合，两者都深入到中亚的腹地。

从18世纪开始，北美核心区成为这三个历史悠久的核心区之后的第四个。同时，一些核心区雏形出现在次撒哈拉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

尽管每个核心区的总体特征相互之间完全不同，但仍然可以看出某些共同的地缘政治特征。这些共同特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都市的存在、核心区域、主导文化、边缘的内侧和外侧、边界和通讯系统。它们可以运用这一术语加以比较和分析。

东亚核心区主要的历史中心区位于中国西北的渭河流域，公元前3世纪秦王朝使之最初获得政治上的统一。随着汉代的巩固，出现了高度统一的文化，众所周知，这个“汉”中国被视为是“真正的中国”或称为“18省”的基

本统一体。当汉民族国家强盛之时，围绕它的非汉的内侧边缘地带被合并进来。在汉民族国家大扩张时期，其外侧边缘地带包括西藏、新疆、蒙古和满洲也被合并进来。当其内侧边缘地带迅速汉化并愿意接受中国的统治和汉文明时，其外侧边缘地带则仍然保留着其各自的经济文化特质，尽管它们也强烈地受到中国的影响。汉中国由道路网连接在一起，而大运河的开凿将黄河核心区域与经济上极为重要的扬子江流域连接在了一起。这种浩大的国家工程将全国的政治经济联为一体，并增强了其统一的实力。尽管中国地域最广的时期覆盖了远东的绝大部分，但其力量延伸至海洋边缘（环太平洋）地区总是有限和不确定的。这种不足缘子中国政府对海洋活动的投入不够及其外交政策中强烈的大陆偏向。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日本国在海洋边缘地带崛起，它虽以中国为其发展的榜样，但它保持了独立性并加强了对群岛的控制。19世纪上半叶，当中国处子孱弱和分裂的时期，日本则迅速强大，然而，其取代中国成为东部核心区支配力量的赌注并未成功。

南亚核心区在历史上的中心区域位子横跨次大陆北部的广阔的印度平原。它们之间的分水岭包括旁遮普（意为“五河”）、恒河和加木拿河的上游，这些地区一起组成了中央邦（Madhya - desa），第一个印度国家在这一地区的中心陆地诞生。恒河—加木拿河地区从最早起就一直是这一地区的中心。正是这里形成了印度国家的核心地区，印度文化的显著特征由此凸现出来。向北环绕次大陆的山脉和向南的德干高原也是其领土大扩张时期占主导地位国家

的组成部分，虽然它达到了遥远的北方和南方，但包括斯里兰卡岛的后者并未被并入其中。从西北延伸到东南的沿河“大干道”构成了主要的交通枢纽，其主要的政治中心总是座落于此或位于附近。

运用这两个核心区的共同特征，我们可以尝试建构一个帝国标准地缘政治模式。伴随从外围核心区域来包围和吸收核心区的人力和物力的主要中心的领土扩张，形成了一个基本的中心——外围结构。如果中心地区强大到足以施加其影响和维持其权威，那么，这就会导致一个覆盖了核心地区全部或绝大部分的影响全球的国家的产生。在语言和宗教等文化特质的推动下，统一得到了巩固，以首都为中心的通讯系统使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并加强了中心地区的突出地位。如果国家足够强大，那么它就会尝试控制内侧和外侧的边缘地区，这种举动不仅可以增强其安全地位而且还提供了获取自然资源的可能性。

如果将这一模式运用于西方核心区，我们就会发现，虽说有许多特征与之相符，但同时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大约在同一时期，西方核心区与其它两个核心区一样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政治统一，然而在那以后分裂而非统一成为了经常的状态。为了实现统一，虽然作出了许多努力并取得了某些进展，但是，统一仍然只是罕有和暂时的现象，从未真正得到巩固。在大陆保持一个核心区整体结构的同时，其上层结构则处于不断变动之中。正如考鲁（Chaunu）所指出的：“顶层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其根基依然稳固。社会可塑性即便是在最恰当的时期也只是局限于

顶层部分。”实现统一的尝试通常意味着控制那些具有核心类型特征的特定地区。此类地区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莱茵地区，它虽然偶或充当了欧洲核心区的雏形，但从未真正成为一个充分发展的帝国的中心地区。此外，除了最初拥有诸如语言和宗教等共同文化的许多特征以外，这一核心区的文化统一实际上趋于减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在东西之间出现了不同的文化裂痕。正是在东部实施了建立一个影响全球的国家的最有效的尝试，但是，这些都证明无法置大陆西部于控制之下。在东部，当代均势的变化导致了早期帝国的核心地区由博斯普鲁斯转移到了梅治达里奇(Mezhdurechie)，即位于伏尔加盆地中部的俄国传统的中心地区。正是源于这里急剧的领土扩张导致了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的产生。俄国本身的面积相当于东部核心区和南部核心区的帝国之和，到 20 世纪初，其乌拉尔山脉以西欧部分囊括了半个欧洲地区。其本身就变成了一个“世界”，并具有了与一个核心区相联系的诸多地缘政治特征。其帝国向西扩展到了波罗的海——黑海地峡，其领土扩张的鼎盛时期——在苏联的外表下——其势力延展到了欧洲大陆波罗的海—亚得利亚海地峡以东的部分。然而，俄国始终未能将其影响进一步延伸到欧洲半岛。法国和德国都曾尝试在欧洲半岛内部确立控制，通过这些努力，它们分别在位于莱茵河西部和东部的中心地区建立了权力。没有谁能对这一核心区实现相对长久的控制。

由于不能像其它核心区那样建立和巩固一个具有全局影响力的国家，一些较小的区域单位就成为了西方核心区

的标准模式，因此，欧洲的政治地图看起来是多彩的而不是单色的。组成欧洲的小国的主导思想在于，保持它们独立于大国之外，防止大国力量的产生。19世纪以来，随着主权国家模式的蔓延，这些国家的平均面积变得越来越小，只有俄国仍然保持着自己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和覆盖了核心区东部绝大部分地区的初具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地位。然而，随着苏联的崩溃，俄罗斯的地位收缩了，在乌拉尔以西，取而代之的是9个民族国家，俄罗斯现在的领土面积比它自17世纪末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小。

因此，西方核心区地缘政治模式的差异在于其未能巩固早期的统一，并建立一个影响全球的国家。在解释这种状况的基本原因时，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模式中许多根本的分歧。

这些分歧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核心区东西方之间历史的分割。伴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出现了两个初具全球影响力的中心地区，一个位于博斯普鲁士附近，另一个位于较低的莱茵河地区。然而，当前者巩固成为成功的帝国中心地区时，在后者周围则未能成功建立一个国家。在东方，尽管中心地区变化了，但初具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仍能维持其权力。西部中心地区未能如愿建立的原因在于，位于欧洲内侧边缘地带的强大主权国家中心地区地位的初步巩固。在梅萨塔（卡斯提尔）、德国北部平原（普鲁士）和多瑙河中部（奥地利），能够巩固并维持其长期地区统治地位的强权国家日益壮大。

西方未能建立影响全球的国家使其有条件发展一系列

不同的地缘政治特征。反对控制、追求自由与独立成了渴望的理想，这些理想的地缘政治内涵在小国和权力的转移中表现出来。瑞士就是一例，在13世纪时，阿尔卑斯山的山民宣布其独立于神圣罗马帝国①，瑞士出现。尽管其后欧洲地缘政治形势几经变化，瑞士始终保持独立，成为小国决心维护其独立与自由的典范。这一理想在当代体现为民族国家中民族与领土的共生关系。因而，民族国家被视为一种得到拥护的理想，而帝国则不然，它通常受到抵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追求帝国主义的国家总是很快冠以民族的理想从而施展他们的抱负。无论如何，这种滥用并不会削弱使民族国家成为20世纪决定性范例的民族理想的重要性。

防止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以及倾向于较小的单位而不是更大的单位这一渐进过程的存在，源于西方核心区独特的地理结构，在这一核心区的半岛地区尤为明显，波罗的海——黑海地峡以西地区是影响中心与内侧边缘地带国家之间关系的关键区域。视为“半岛之半岛”的欧洲[illegible]特征，意思是指这块大陆分裂成了许多具有独特地理[illegible]征的部分。我们可以分析有关诸如伊比里亚（Ibrian）[illegible]大利半岛等区域部分的“自然特征”，而位于印度——恒河平原中部或黄河盆地的类似面积的区域部分并不具备这些特征。因此，一个特定区域内部统一的建立虽然

① 瑞士于1384年建国，全称是“瑞士联邦”，它源于四个“森林州”的联合。传统的联合行为是根据瑞特里（Reutli）宣言中共同认可的“兄弟之邦”的誓言。瑞士的四个州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联合起来的。行政权力仍以州为主，以伯尔尼为首都的瑞士联邦只对诸如货币和涉外事务负责。

得益于其自然环境，但是将力量由一个地区扩充至另一个地区则要显得愈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冲突而不是合作成为常态，而这既表现为那些有帝国野心的国家之间的对抗，又表现为较小的国家防止帝国野心和维护其独立的努力。

麦金德将这种复杂的冲突形势分解为总体的东西方冲突。他把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的战争视为这一冲突的起点，认为“海员对抗大陆人”是贯穿欧洲历史的最持久的主题。在东边的那些庞大的大陆国家渴求统治整个大陆的同时，西部的一系列小国则珍视自身的自由并希望保持这种自由。占统治地位的东部大陆国家出现过多种形态，包括波斯、拜占廷、阿拉伯、奥斯曼和俄罗斯帝国。麦金德断言，这些基本的地缘政治冲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总体上保持不变。

从16世纪开始，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日益变成为一个地缘政治整体，一种新的水平似乎超越了单个核心区的水平，布赖斯所言的“世界进程”已经开始，直至世界被开发完毕它才会终结。由于它是被极具活力的欧洲人所“发现”，所以，成型于16世纪的一个地缘政治世界以欧洲模式出现了。托勒密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核心区让位于惠特尔西的全球核心区，先前分离的“世界”开始受到其构成部分的世界的影响，它们逐渐集中形成一个以西方核心区为中心的单个系统并为其所控制。西方核心区成为新的全球规模运作的地缘政治雏形，曾为常态的冲突形势转化为全球范围。因此，在20世纪初期，扎根于希波战争的麦金

德的世界观成为最初的地缘政治理论的基石，它试图解释世界地缘政治空间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复杂的关系。虽然它后来被多次修正并分别产生出许多不同的世界观，但麦金德最初观点的影响仍然十分强劲，其在数十年的时间里经久不衰。它对于冷战后时期再现的世界观的创立及世界体系和世界秩序观的发展意义重大。

在20世纪，很多人尝试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解释。这些可分为三类，即二元论、多元论和一元论。尽管这些都是基于对世界本质的不同理解，但是，三者都认同的是，虽然在任何特定时期都可能出现混乱与无序，但地缘政治的规律却是的确存在的。尽管这些规律在很长时间里都难以识别，然而，通过可见的地缘政治形态的复杂性，我们可以去探寻其内在的结构。每一种世界观都可以通过分析其符合或偏离可见的世界现实的状况来检验。

第七章

激烈对峙：两极世界

两极世界观的基本主张是，尽管国家间的多边关系非常复杂或可能会变得非常复杂，但它们最终都转变成了一种单一的两极关系。这种关系呈现出的形态在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形成两个不同的力量"极"，彼此互相对峙。

最持久的两极观点集中于欧洲和亚洲这一基本的二元结构（见第六章）。起初的西——东对抗主要位于爱琴海周围的陆地和小亚细亚岛（安拉托利亚半岛），进而延伸到罗马帝国统治的地中海（Mare Nostrum）和波斯帝国统治的东方大陆（Oriens）。在中世纪西—东两分时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主角。此后，伴随文艺复兴而来的人类地理知识的大量扩充，使以往仅仅被模糊地意识到的东方"世界"的存在变得日益清晰。其轮廓开始超越封闭的伊斯兰世界，成为关注的

焦点。起初人们认为这里是指统称为“印第安”的一组大的岛屿和半岛，欧洲人的原始动机在于与它们建立联系。直至那时，从伊比利亚半岛到不列颠群岛的海上活动的中心仍在欧洲的大西洋外围，这里是人类已知世界的边缘。通往东方的新的海上航道的开辟导致了地理观念的彻底改变，这样，边缘地带就转变成了旨在使大洋连在一起的不断扩充的海上世界的中心，并开始了实际上趋于全球化的历程。这导致了新的世界观和宇宙观的形成，并对地缘政治学世界观产生了影响。因此，东方仍被看作是新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的主要危险，但现在的东方却是一个大得多的东方，对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恐惧也扩充为对其它东方国家的恐惧。最初这种新的恐惧是一种对“黄祸”的恐惧，这是对潜藏在遥远和陌生世界的危险的一种模糊感觉，但到了19世纪，这种恐惧变得更加清晰。当欧洲面临着其自身内部大国的竞争这一紧迫问题时，这个巨大的危险就被视为来自东方，正如其一贯所表现的那样。

基于这种观点的最重要的思想是以陆权和海权“激烈对峙”的基本对立为前提的。这一概念在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尤其是在英国极为盛行。自从拿破仑的失败导致英、俄势力上升，并获得全球超级大国地位后，“恐俄症”（Russo-phobia）就日益增强。到19世纪晚期，强盛的大英帝国和俄帝国成为两极。世界权力在它们周围聚合。英国依仗海洋、俄国凭借陆地逐渐将它们的触角伸向全球，令其它大国极为惊愕的是，它们成为争夺世界“不动产”的主要对手。这一点在亚洲最为明显，在亚洲，这两个强

大的帝国的势力范围呈巨大的弧形连系在一起，从地中海和“海峡”向东延伸，直到黄海和太平洋。《泰晤士报》曾强烈指出，“从匈牙利边境到缅甸、尼泊尔的心脏，俄国恶魔一直困扰着人类种族，它不知疲倦地进行恶意的欺诈……这个勤奋的太平洋帝国似乎有着无尽的忧虑。”这就是“大国角逐”的实质之所在，它在中亚的高山和荒漠中进行，采取了战略操纵和领土控制的方式，目的在于侧翼包围敌人，从而获得相对于别国的有利地位。英国对俄国的恐惧尤其集中在南亚地区，这里脆弱的印帝国北部边境是大英帝国在世界上的“至宝”，因而备受关注。①

对俄国力量的注视决不纯粹是英国的事，对矗立在东方，覆盖了全球陆地表面六分之一并以惊人的速度进行领土扩张的巨大的欧洲帝国的恐惧遍布整个欧洲半岛。根据布雷斯劳（Breslau）的预言，帕奇认为，在德国和斯拉夫欧洲的边界之间，“俄国巨人”正在进行“永不停止的扩张”，而中欧似乎尤其易受攻击。法国人拉维斯把俄国的扩张看作是一种自然力量。他写道：“俄国‘冰川’总是日渐升高，同时扩充了她的领土……攫取了力量”。这种领土扩张诱发了同海权的冲突，亦即“鲸和白熊的决斗”。德·库斯坦（De Custine）在访俄返回之后持有了这样一种

① “大国角逐”（Great Game）一词的真正发明者似乎是科隆尼上校。他是19世纪在中亚一直进行的“发现事实真象”间谍活动的积极参加者。诺迪亚·基普林则使这一术语广为人知。在他的《kim》一书中，“北部”是指蛮荒落后并且十分危险的地带，只有那些最无畏的人才有可能去征服。基普林在对此进行明确分类的同时，声称“现在我将去遥远的北方参加大国角逐（Great Game）”。所有这些构成了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帝国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并产生了《kim》一书中固有的“东方主义”。在霍普科克看来，《kim》一书使大国角逐及其在这一时期大国敌对中角色地位的全部心理具体化了。这为《Boy's Own Paper》一书中构成英国人观念中全部帝国设想的兴奋感和冒险意识奠定了基调。

观点："他们希望通过征服来统治世界。"但是，他又哀叹道："他们梦想力量的扩张……如果上帝赋予他们这种力量，那将是世界的灾难。"

第一个明确区分了海权和陆权并分析了它们在世界历史中的不同作用的人是阿尔弗莱德·T·马汉。马汉对英法的海上冲突作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之后撰写了《论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一书，成为19世纪末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见第三章），该书第一次提出了近代海权的系统理论。在马汉看来，海权是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在分析权力基础时都忽略了的"既抽象而又具体的事实"。他试图弥补这一缺憾，并以"把海上利益置于首位"为目的来考察海权的作用。他的工作使他得出结论：海权是阐释国家成功原因时最重要的因素。马汉指出，构成成功海权的要素和从这些要素中衍生出的原则"属于不变的，或无法改变的规律"，因而，它们形成了他所说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进而，他将这一思想运用于分析美国在19世纪末期的崛起。在他看来，海权是"扩张的女仆"，她的获得对于美国未来成功地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至关重要。尽管马汉意识到来自陆权的危险，但他似乎毫不怀疑海权在获得世界权力方面的终极效用。一位传记作者写道："他列举了英国海权的辉煌和在世界的统治地位"，并确信美国有利的位置"会赋予美国在权力巅峰时期超过大不列颠的机会"。他认为他对海权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是一种"使内心世界由黑暗变成光明的领悟"。他坚信海权是关键因素，因此，谁是海洋的主人谁就是时局的主人。

众所周知，麦金德同马汉一样，是以陆权与海权两分论为前提的，他是第一个提出系统的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地理学家。在他所论及的“世界观”中，他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之间的历史冲突及这两种国家间权力的转换方式上。这被视为是贯穿于世界历史的最持久的主题。在马汉之后15年进行写作的麦金德认为，庞大的俄帝国和英帝国的对抗是陆权和海权之间长期敌对的延续。一战之后，麦金德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主题，尽管在此期间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仍坚持认为他的基本主张并不过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富戏剧性的后果是长期扮演欧洲主要危险角色的俄国的衰落。尽管这并不直接影响麦金德观点的正确性，但确实有必要对一种看起来十分重要的新形势进行解释。然而，在俄国被苏联所取代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一个西方世界必须对付的继任者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建立者们来说，俄国是世界革命的跳板，它的这种存在被认为是暂时的，直到共产主义世界秩序产生并将取代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对于那些并不乐观地看待这场变革的人来说，这个新国家是西方核心区新的威胁，而且，从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观点来看，它被看作是来自东方世界的对西方世界的最新危险。由此看来，苏联似乎并不像一个新面具伪装之下的旧大国那样热衷于对社会和地理财富的重新分配。一种合理的国家意识形态被另一种所取代了：神圣的沙皇俄国被抛弃了，列宁和共产主义得到了支持，切辛所言的“来自东方的黑暗”以一种新的形式复苏

了。

苏联的行为方式很快就被证明与其领域内前任的行为极其相似，尽管它声称它是反资本主义的，但它的行为很快就揭穿了这一谎言。苏联所操纵的地缘政治结构根本上而言是俄帝国时代的地缘政治结构，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同它的前任一样，其内部地缘政治结构和相应的行为方式都与那些追求支配地位的国家别无二致。

在解释国家的行为方面，固有的地理事实比意识形态的幻想更为重要，这一观点并非地理学家的专利。在切辛看来，俄国共产主义并不是扎根于马克思所言的工业无产阶级，而是源于大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他写道，“第三国际的领导人不是欧洲人”，“他们是穿着斯拉夫服装的斯基台人”。他同时还写道：“为了把斯基台人召进瓦兰吉人（Varangians）的地盘”，他们开始了国家的“东方化”。克里斯托夫（Kristof）认为，不管哪个政权执政，俄国人统治都继承了“一种特定的由历史和地理决定的目的驱动力”。因此，他得出结论：“他们是游牧部落的非游牧部落继承者；他们在俄国的西端重建了蒙古帝国。”科万腾也强调指出，俄帝国和早期的草原帝国之间存在历史和地理的连续性，这一连续性是全球陆权——海权两分的主要观点的根本。

尽管苏联是俄帝国的地缘政治延续体，然而，事实上俄国并非必然和永久扮演全球大国的两个竞争者之一的角色。到二战开始时，苏联仍然处在政治权力的边缘，虽然它的出现无疑会影响更为重要的参与国的行动。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起源与导致一战的基本形势相同，即英法联盟同德国领导的中欧集团之间的冲突。尽管突发冲突最初是由俄国和巴尔干半岛的奥匈对立引起的，但冲突发展为世界大战则仅仅是因为德国对英国海权发起的挑战。在二战中，英法联盟复兴，而德国领导的集团则以罗马—柏林为轴心。[①]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初就是要求维持现状的英法联盟和其扩张倾向被视为对英法的统治地位构成挑战的德国两极之间在欧洲半岛的冲突。德国的战略旨在通过获得海上霸权来弥补国家相对脆弱的世界权力地位，并借助东扩的欲望获得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所追寻的生存空间（见第三章）。

1939—1941 年的欧洲战争因 1940 年法国的失败而达到顶峰，接着在 1941 年随着日本加入德意（轴心国）一方以及美国和苏联加入大不列颠（协约国）而扩大为全球冲突。协约国的“三巨头”走到一起，组成了罗斯福所说的“为了我们自己和世界的共同利益而统一行动的和谐整体”。从意识形态而言，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形成了暂时的、不稳定的共生状态。这个伟大的联盟表明，传统的陆权和海权敌手开始团结起来，试图击败同时威胁它们的这一变种。对地缘政治学家来说，这种发展比它的意识形态对手成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同样富有戏剧性。对许多赞成

---

① “轴心”所指为二战前及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联合。这一词最先被墨索里尼用来指 1936 年两国间签订的条约。更紧密的联盟条约签订于 1939 年 5 月，而正是这一《钢铁条约》使意大利站在德国人一边卷入了战争。德、意、日三国间的联盟关系在 1940 年 9 月的三方协约中进一步巩固。“轴心国”这一词在二战期间用以形容德、意、日及其巴尔干盟国。

全球两分论的人来说，这为古老冲突的结束和新的世界和谐的到来显示了非常真切的可能性。然而，在协约国获胜后的几年时间里，三大国中英美和苏联阵营之间越来越明显的敌对表明这种乐观主义是很幼稚的。伴随着军事上的胜利，苏联将其力量转人到了欧洲的中部，整个波罗的海——亚得利亚海地峡以东的大陆落入了苏联的扩充范围。俄国的力量还从来扩展到如此广阔的地区，俄帝国19世纪时最西部的边界大致上沿着波罗的海——黑海地峡划分(图6.2)。因此，装扮成苏联的俄国回到了暂时空出的位置。自称为革命国家和新的角色秩序的先驱的苏联，悄悄地、轻而易举地扮演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角色，并成为陆权的一极。然而，另一极当时却在经历着激烈的变化。曾经统治海洋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大英帝国无法继续维持其地位，1919年以后海上世界的有效权力中心转移到了大西洋的另一边。19世纪的“大国角逐”以冷战的形式重现，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取代了英帝国和俄帝国的位置。

贯穿几乎整个20世纪下半叶的极化特征极大地促进了两极理论的发展。陆权和海权的两分同时也给予与此不同的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冲突以一种地缘政治的范围。这将整个世界结构置于了一个总的看来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中，使其至少成为马汉的不变的事物秩序的一部分。两个超极大国之间不同的地缘政治根基成为解释它们之间存在不同的扩张行为和政策的重要依据。美国被视为填充旧世界大国留下的真空的新世界大国。麦克利什认为，从地理上和政治上而言，美国都是“新世界”的主宰者，居于世

界舞台的中心。它是“我们居住的地球上的自由人”的先

驱。该论断源于这样的事实，即美国首先是一个海洋大国，而海洋是“自由的伟大象征”。然而，苏联最初在西方大国看来只是一个拥有地区利益的地区大国，它的利益没有必要与美国的利益发生冲突。

苏联是一个大部分利益都局限于欧亚故土的“陆权国家”。有些地理学家认为，苏联有充分的权力来控制和保卫历史上属于俄国的范围并且现在为了其民族而仍然属于其自身发展的地区。二战后十年期间，苏联力量的扩张和影响致使这一观念愈来愈被认为“苏联集团”极具威胁性的观念所取代，“苏联集团”从东欧一直延伸到远东，其政策由克里姆林宫的“马基雅维利之手”直接操纵。“红色帝国主义”的界定意味着苏联正逐渐被置于一种使其变成一个关注领土扩张和支配地位的老式大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治地理学家们意识到了麦金德的观点与他们所处的冷战形势之间的关联。沃尔什认为，苏联所造成的威胁与来自俄国领土扩张的历史威胁情况相同。在沃尔什的前辈们看来，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实际上与拉维斯所言的俄国冰川“日渐升高”毫无二致，因而他担心这会导致他所说的“国际关系冰期”的回归。正如他曾于1945年在狱中与之会面的卡尔·豪斯霍费尔一样，沃尔什也表达了对麦金德的极度崇拜，麦金德“非凡的假设”阐明了“苏联地缘政治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模式”。魏格特也遵循了麦金德的观点，认为“为追求世界支配权而

进行拼死决斗”的陆权对抗海权的情势致使世界不断被分割。麦金德的论文在二战后的一些年里似乎比以前更符合事实，此时，全球冲突的加剧意味着实际上所有别的事件都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纳入了其中。

在1953年斯大林去逝后的几年中，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开始出现轻微的松动。持续的敌对伴随着对名为“和平共处”形势正常化的渴望。[①] 设想中的两极世界更多地是通过权力均衡而非对抗来获得长久性和稳定性。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新形势开始反映在地缘政治思想的修改上。索尔·科恩构想出一个反映冷战紧张局面缓和的全球结构，并认为紧接着战后一些年的极端形势是极为罕见的。他使用了“力量核心”的术语，认为现在是“分裂的世界”，在他看来，世界已被分割为几个“地缘政治区域”。他断言，“二战后‘自由世界’与‘铁幕世界’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已不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存在一种“大片地区从一个阵营转向另一个阵营”的“不稳定的状态”。然而，科恩的世界观基本上仍是两极观点，因为这些地缘政治地区本身被分成两个大的“地缘战略区域”。他将其称为“依靠贸易的海上世界”和“欧亚大陆世界”，它们的核心地区分别是美国的环海地区和俄国的工业三角地区。同时，科恩还把陆权和海权两分论用以构建他的空间架构。他认为，美国应致力于“向沿海发展其势力”，

① “和平共处”一词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1891—1971）有特殊联系，在斯大林统治后期东西方关系步入低谷后，他试图营造国际关系缓和的气氛。它成为冷战后期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解冻时期苏联思维的核心。

而“苏联应向内陆发展其势力，其主要方向是欧洲的心脏”。在《分裂世界中的地理和政治》一书的第二版中，尽管科恩仍然区分了与“海上王国”不同的“大陆世界”，但是，他将这两者都视为是具有“多中心特性”的松散集团。它们都拥有两个“核心区域”，他认为这种形势比两极世界更能保证“全球均衡”。

陆权和海权的两分始终是两极理论的中心部分。其中，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更多地被看作是天生形式殊异的地缘政治生命而非彼此的镜像。海权通常是领土较小、力量建立在其商业财富基础上的海上国家的产物。当大的实体从海上世界崛起，这些实体通常包括地理上接近的国家或海上帝国组成的联盟或集团。后者天生在地理上破碎，自然特征截然不同，它们不连贯的领土通过海洋联系到一起。它们具有基于其地理部分而分裂为较小单位的固有倾向。另一方面，陆权建立在领土扩张之上，是由强有力的单个核心地区的领土增长而确立的。这个过程产生了领土上连成一片的大国。对它们来说，最终的目标是获得领土，它们的权力即以此为基础。然而，对海上帝国来说，领土仅仅是建立成功贸易体系的必要基础。保罗·肯尼迪认为，这一基本区别是他所说的“商人国家和战士国家的两极”之间存在紧张气氛的根本原因。

当麦金德将陆权和海权的两分追溯到古希腊和波斯的冲突时，他发现两极的规模稳定地延伸到欧洲——地中海核心区直至包括全球在内的整体。上述情况的引申含义产生了心脏地带理论，简言之：大陆国家从他们所占领的领

土来获取力量，其力量的大小与其所占领的领土的数量成比例。因为亚洲是最大的大陆。所以它也是最大的大陆国家所在地。它们的主要力量源泉在于广阔的亚洲中心地区，这就是麦金德最初所说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他将这一枢纽界定为没有直接入海口的广阔的中亚地区。这是因为流经这里的河流都流向了内海和湖泊，因而没有通向海洋的出海口；即便有的河流流向北冰洋，但由于这里冰雪覆盖，实际上也只算得上是内海。因此，麦金德推断：控制枢纽地带的大国相对于海权而言固若金汤。从纬度上而言，穿越这一广阔的地区，就进入了一个温和的草原地带——大草原，正是在这种地理环境中，草原帝国崛起了。这些庞大的国家最初是从依靠马来进行战争和迁移的游牧部落社会所产生的。他们对于自身所面临的周期性爆发的地理问题和社会经济问题的通常反应是黩武主义，这导致它们去攻击居于亚洲边缘的富裕的海洋国家。后者的反应是利用它们的经济力量和海洋主导权击败来自大陆的侵略。亚洲心脏地带新兴大国的不断涌现使海上国家必须经常保持警惕。尽管草原国家的力量在早期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而受到限制，但到了当代这些地区的巨大潜力就被释放出来了。这意味着领土扩张的习性第一次与获得决定其前途命运的足够的资源相一致。

一战以后，麦金德进一步发展了其枢纽地带理论。他将其更名为“心脏地带”，大大扩大了它的范围。和枢纽地带一样，心脏地带基本上包括那些河流流向北冰洋或流向内陆的地区。但是，心脏地带增加了中国和印度巨大河

流的上游以及波罗的海和黑海流域（图 7.1)。麦金德断言，这些地区同样也是海权国家难以到达的，这一论点因海上大国未能对这些地区施加过多的影响而得到了证实。克里米亚战争及随后的“海峡”争端——解决“东方问题”的关键——清楚地证明了海上大国在扩展环海控制力时所遭遇到的困难。因此，心脏地带被认为包括了从日德兰半岛到爱琴海一线以东的整个欧洲部分。曾经抵制了欧洲帝国主义统治的唯一重要的国家——中国的大部分也位于心脏地带之内，尽管只有新疆和蒙古西部地区位于枢纽地区之内。从它所具有的重要性来看，心脏地带是一个比枢纽地区更宽泛的概念。心脏地带除了战略上无懈可击外，同时还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能提供能源、黑色及有色金属、原材料以及食物。所有这些都加诸一个似乎在每一方面都获得了强力支撑并且因地理保护而免受侵扰的地区。麦金德由此得出了最后的结论：心脏地带具备了成为世界权力的根本中心的潜力。而开启这一潜力的根本途径是现代化的通讯系统，这在 20 世纪早期意味着要修建铁路。在这一背景下，必须牢记在心的是，“枢纽地区”论文是在穿越西伯利亚的铁路开通之后呈现给皇家地理学会的。这一大铁路自西至东穿越心脏地带，将俄国核心地区和太平洋连结起来，使得一战前西伯利亚的现代经济开始得到切实的发展。麦金德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铁路的发展“像封闭的欧亚心脏地带”那样有效。枢纽——心脏地带的整体概念因此在一个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孕育和发展着，致使麦金德认为这里就是未来世界权力之所在。他

关于心脏地带崛起的论点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理论前途，即他所说的海权统治世界的“哥伦布时代”行将结束。由于认识到了内陆的巨大潜力，那么，现时的均衡的重心就由海权转向了陆权。

可见，心脏地带理论既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主张又是对未来海上世界的警告。由于英国仍是主要的海上大国，麦金德的警告实际是直接针对他的祖国的。他确信，当时陆权的发展对海上世界构成的巨大威胁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这是因为它的中心位于最大的大陆，其潜力通过现代科技释放出来。于是，他回忆起一个获胜的罗马将军，当他开进城时，他沉浸在令人倾倒的辉煌的“胜利”之中，然而，跟在他后面的战车上的奴隶却对他耳语道，他只不过是人而已。同样，麦金德也提出一种类似的看法，在凡尔赛和会期间，“一些快乐的小天使”不时地向与会的盟国领导人耳语：

谁统治了东欧，谁就主宰了心脏地带；

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主宰了世界岛；

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主宰了全世界。

因此，在麦金德看来，对东欧——心脏地带欧洲的占领是夺取世界权力的关键。20 世纪初，在该地区占领份额最大的国家是俄国，成为控制了大部分心脏地带的巨大帝国。俄国将“控制”扩大到世界其它地区的欲望从俄国一直挺进到远东、中亚和中国可见一斑。

1904 年至 1919 年的 15 年间，国际舞台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强大的俄帝国被严阵以待的共产主义国家所取

代，它最初宣布完全放弃帝国的非俄罗斯占领地。然而，麦金德并没有在俄国和心脏地带之间确立必要的联系。事实上，他只不过是把俄国看作心脏地带现行的“占有者”。这一看法预示着将来很有可能会出现别的“占有者”。的确，历史上的土耳其、蒙古和中华帝国都曾是这种意义上的“占有者”，麦金德认为德国和中国都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占有者”。因此，麦金德认为，尽管国家不断更迭，但心脏地带始终是“巨大的地缘政治现实”之一。“它决定了历史，因而造成了目前人口和文明的分布状况”。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它被看作是马汉所说的“不变的、或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而不是与一个特定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转瞬即逝的机遇。

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家来说，心脏地带的概念是构成完整的陆权——海权结构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豪斯霍费尔在评价 1904 年的“枢纽地区”论文时写道：“我还从未见到过任何比这几页地理学的杰作更伟大的东西”。枢纽——心脏地带的存在就成为了他自己的全球扩张结构的核心部分。他设想，心脏地带是一个巨大的穿越“从易北河到阿穆尔河”地区的巨大堡垒，他将其视为“世界征服者的神秘摇篮”。然而，从牛津或伦敦的角度看与从慕尼黑或柏林的角度看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意义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在麦金德看来，这构成了对大英帝国的最大威胁，但是，在豪斯霍费尔看来，它则是广博的自然资源的潜在源泉，它的占有将给予德国挑战大不列颠统治地位的强大力量。对于德国地缘政治学家来说，通

向世界权力的道路在东方，即通过德国与俄国“广大区域”的联合来实现。沃尔什指出，德国与俄国是“最关注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统治权的两大巨人”。

1945年以后，心脏地带再次成为诠释新的东西对抗结构的组成部分，但现在人们开始从新的视角来看待它。对于那些将苏联看作是标志性进程的人来说——1945年仍有许多人这么想——占据心脏地带被看作是其世界角色的重要附属物。天意似乎已给予了那个作为新的世界秩序先驱的国家以实现其抱负的最大的地理和地缘政治潜力。伊斯特（East）和斯佩特写道，“在战后初期，随着新的黄金时代的来临，西方统治时代的结束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乐观地分析了苏联的未来。他完全接受了麦金德关于哥伦布时代行将结束，新的陆权时代即将来临的推断，认为对于人类大部分来说，海洋统治时代与其说是一个成功的时代，不如说是一个压迫和不平等的时代。亚洲大陆国家代替西方大国将导致世界资源分配上的极大平等性。他推测，随着“殖民地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世界时代的出现”，大陆国家完全适得其所。这个大国将以位于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亚洲内陆的十字路口”为中心。随着航天时代的到来，它将成为世界空中通讯的自然“十字路口”。因此，他不像麦金德那样，而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大陆大国的崛起，认为，“一个稳定而又进步的世界秩序必须包含了大的亚洲国家的基本观念，亚洲被渗透并从边缘向中心发展的时代已告终结，一个发展位于中心或接近中心并且其发展效应

向边缘辐射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半个世纪前，拉铁摩尔的同胞马汉看到了被视为海上世界“麻烦”的亚洲所发生的变化，这是一个拉铁摩尔曾极力反对的观点。他指出，“控制的时代正在消失，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怎样控制这种发展，而在于怎样使我们适应它。”同时，魏格特也强调了“我们这个世纪的心脏地带”和它的两个主要大国——俄国和中国的重要性。他写道，“防卫着新世界正在形成的大陆的这些大国，命中注定是要做出最大牺牲的”。它们共同创造了“世界新秩序”。

然而，尽管拉铁摩尔、魏格特甚至麦金德本人也在他的最后一篇论文中欢迎“新时代”的到来，但是，别的地缘政治学家却不太乐观。沃尔什主张，面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思想，必须把地缘政治思想当作西方武库中的一部分(第四章)。沃尔什承认麦金德的三段论是一种“非凡的假设”，但他认为它的逻辑性已被“修改，只是没有因空权时代的到来而完全被摈弃”。这一修改迫使心脏地带大国必须寻求将其控制力向外扩展到“世界岛边缘的陆地中去”，并在那里建立接近主要海上大国中心的军事基地和空中基地。沃尔什指出，最适合克里姆林宫当时需要的公式是：“谁控制了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谁就能保护世界革命的心脏地带。”这意味着海上世界面临着永久的安全威胁。早期的战争之后，沃尔什在援引麦金德的警告时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如果麦金德所召唤的快乐小天使在那些聚集在凡尔赛的政客们耳边提出的警告仍在起作用的话，……那么，他应该始终揪住那些新谈判者的耳朵。”

总而言之，他应该警告的是，莫斯科比伦敦和华盛顿更接近欧亚、印度和中国的命脉。西方世界对来自东方的新威胁的反应必须是联合起来建立平衡力量。

冷战期间，作为敌对国家核心的心脏地带概念成为添加在那些已经存在的国家之上的唤起人们回忆的附加镜像。寓意着一个庞大的、敌对的“苏联集团”势不可挡地横穿欧亚两洲。这个镜像从来都不是建立在对区域所构成的真正威胁的理性评估上。正如过去地理学术语导致想象中的恐惧出现一样，“心脏地带”的概念从理性向非理性的变化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它从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区域变成了一个更多地归因于意识形态而非地理的概念。胡森（Hooson）认为，这个“迷人的地理圣地”已经开始拥有一种“几近神秘的氛围”。格雷（Gray）警告说，心脏地带理论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它已经考虑到了“对心脏地带国家力量的夸大”，所以这会增强海上世界业已存在的恐惧。沃尔特斯（Walters）指出，在人们的想象中，“心脏地带”已经变成了被“铁幕”的壁垒环绕和保护着的巨大堡垒。根据卡夫卡斯克（Kafkaesque）的形象描述，它是与神秘和恐惧相连的某种东西的地理表达。“寂静的堡垒”是克里姆林宫本身的缩影，它“强烈地隐现在内心的幽暗深处”。沃尔特斯进而还证明了冷战时期受心脏地带概念影响的地缘政治精神变态已发展到何种地步。莱格（Legg）关于心脏地带的描述因使那些置身世外的人们充满恐惧和忧虑而同样富于煽动性。诸如“布尔什维主义”和“共产主义”之类的术语只不过是对一个更古老的观点

的现时的情感加强而已。它们是“那种恐惧混杂着月光下映射着光芒和能量的巨大的心脏地带所诱发的惊喜以现时习语的重述，正如麦金德半个世纪前所设想的那样”。因此，尽管心脏地带本身是一个比凯南（Kannan）的“红色洪水”和布利特（Bullitt）大使的穿越亚洲的“红色变形虫”更为明确的领土现象，但是，它却是一个具有威胁性的象征。它成为了西方深深的历史心理恐惧的具体化，这种恐惧感觉到了危险的出现并且源自东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具有一定的形而上学特性，因为真正的或想象的恐怖之源与在中世纪的世界地图（mappa mundi）中作为地理现实出现的那些怪物极为相似。

除了与冷战的高度紧张极其相符的情感方法外，还有对心脏地带真正的地缘政治意义的新思考。福西特（Fawcett）扩展了它的范围和长远意义。尽管他承认他所说的“旧世界的内陆”的恶劣自然条件成为了发展的障碍，但同时他又认为它陡峭的地形和物质资源必定会给予那些控制它的大国以巨大的利益。在一种有利于陆权的均衡格局中，他设想控制心脏地带的大国实际将变得足够强大来突破脆弱的地中海——红海地峡。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地中海——红海地峡已成为联系欧洲、印度和远东的最重要交通枢纽。其功效在于将心脏地带从福西特称作“大陆”的“世界岛”中心扩展到穿越中东、深入到非洲地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陆权和海权的均衡将不可逆转地倾向有利于大陆（图 7.2）。梅尼格（Meinig）设想了一种相反的情势，认为心脏地带的重要性被极度夸大了。他

利用基于“自然条件、文化和交叉点位置”的所谓“文化或……功能标准”，提出了一个从里海到满洲里并包括中亚的苏维埃共和国、蒙古和中国西部在内的小得多的“心脏地带”。梅尼格设想，他的心脏地带是一个更具战略性的现象而非经济现象，这使它比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更具有“枢纽”地位。梅尼格心脏地带的“震中”位于新疆——即在后哥伦布时代大陆国家发展的背景下拉铁摩尔称之为“亚洲的枢纽”的一个省。

诸如“枢纽地区”和“心脏地带”之类的这些概念全都是泛亚洲的，它们超越了国家界限。相反，胡森特别地将心脏地带和苏联联系起来，以此来证明他所说的“新苏维埃心脏地带”的出现。鉴于苏维埃国家的核心位于俄国欧洲部分的南端。因此，他认为存在一种从伏尔加河到中亚和西伯利亚的横向东扩趋势。这个被他奇异地想象为可能是棺材形或马厩形的伏尔加河——贝加尔湖地带拥有相当多的自然资源，正在迅速都市化并被穿越西伯利亚的铁路连在一起。到了20世纪60年代，它已成为苏联经济发展具有强大诱惑力的地区，因此，苏联的重心决定性地东移了。胡森认为伏尔河——贝加尔湖地带具有“一个真正的大陆堡垒的特征”。这个新的苏维埃心脏地带在很大程度上扩展到了草原地带，并且它的发展也将苏联和草原帝国以及它中亚的祖先联系在了一起。

尽管在20世纪作为东方大陆国家中心的心脏地带思想已经被融入了鲜明的两极地缘政治思想之中，但是，另一种两极理论使人想起一种更早的东西两分论。这一理论

假定，存在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被一片广袤的人烟稀少的地区分开的两大世界文明中心。福西特将这称作位于西方世界和亚洲世界两个主要中心之间的高山和沙漠的“大分割”。费弗尔把它视为世界上极少见的真正的“自然”边界之一，它将伟大的欧洲世界和亚洲分割开来。在费弗尔看来，远东是 20 世纪初唯一成功地抵制了欧洲列强控制的“世界”。1900 年的义和团起义使西方大国表现出罕见的团结一致。棘手的中国问题，加上诸如日本崛起并获得大国地位之类的令人不安的迹象，促使欧洲团结起来面对类似“黄祸”和“升起的太阳”之类的东方“幽灵”的思想的复苏。这一思想在德国尤其盛行，它恰好迎合了德国的霸权主义野心。①

麦金德在 1904 年提出枢纽地区理论时，“鲸和白熊”的英俄分享全球霸权的格局就已成为历史。当其它的大国——尤其是美国、德国和日本——正磨拳擦掌觊觎世界舞台的中心地位时，大国角逐本身日益显得无关紧要。此后不到一年，世界就被 1904——1905 年日俄战争中俄国的彻底失败震惊了，这很快便导致了对俄帝国在欧洲事务中

① “黄祸”一词是德皇威廉二世所偏好的用语，它是提醒欧洲人警觉位于东方的危险的观念的一部分。无须赘言，德皇认为德国在新的欧洲意识中居于领导地位。欧洲诸强面对中国义和团运动而结成的暂时联合，表明来自外部的共同危险的意识至少具有把欧洲人聚合到一起的功效。

力量的彻底重新评估。[①] 尽管“白熊”的日益衰弱已显而易见，但“鲸”的衰弱则尚需时日才能同样明显。一战伊始，英帝国似乎显得比以前更辉煌更强大，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如此。

一战后，分别获得了非洲原德国殖民地和占据了中东的奥斯曼帝国、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的规模比以前更大了。[②] 然而，对精明的观察家来说，整个欧洲的世界地位显然恶化了，英帝国的世界大国地位摇摇欲坠。这种新的形势使麦金德更加确信他的基本理论是正确的。心脏地带在他看来除了当时的混乱之外，仍然像以前一样具有威胁性。只是威胁所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然而，别的政治地理学家却已觉察出截然相反的迹象。德芒戎在分析了世界形势的变化之后发现，与欧洲的衰落相对应的是东方的崛起。德芒戎认为，由于它是由日本组织起来并利用了中国巨大的人口和资源，因而这一地区正在逐步成为未来世界权力的主要中心之一。豪斯霍费尔始终迷恋日本，认为日本的经历是导致英国统治地位终结的一种典型模式。日本

---

①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日俄战争是陆权和海权之间的对抗。它是一个陆权国家（俄国）将它的权力推向海洋和一个崛起的海权国家（日本）将它的权力延展到毗邻大陆的尝试。俄国舰队从芬兰湾的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海军基地向东方进发，由于当时其全球霸权的主要对手和日本的主要盟友英国拒绝它经由苏伊士运河，它被迫绕道好望角长途航行。在经历8个月近12000英里的航程后，疲惫的俄国舰队与位于日韩之间的对马（Tsushima）海峡以逸待劳的日本舰队遭遇。在对马战役中，俄舰全军覆没。这是海战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失败之一，促使俄国在远东以牺牲中国为代价而扩充它的势力。日本也从此次战役开始而崛起为一个世界主要强国。1908年，朝鲜被吞并，日本渗入亚洲大陆的进程开始。

② 1919年，英帝国的领土和人口较以前进一步增加。它拥有13，700，000平方英里的土地面积和275，000，000人口，是已经存在的最大的帝国。仅仅过了10年之后，《威斯敏斯特公约》（Statute of Westminster，1931年）首次将英帝国转变为英联邦。由于这一公约承认自治领地是“自治的实体……地位平等”，实际上开始了帝国瓦解的进程。

的扩张主义使他得出结论：未来整个亚洲地区将围绕日本的力量构筑。

二战正酣之时，麦金德写了最后一篇关于地缘政治思想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勾划了战后世界的基本框架。他把两极地缘政治思想中“东方”的两个主要概念——“心脏地带”和“东方国家”联系在一起。麦金德1943年所论及的心脏地带无论是面积还是意义都有较大修改。尽管在西方它包括了枢纽地区在1919年的增加部分，但它实际只向东延伸到了叶尼塞河。因此，这个被截短了的心脏地带表明，早期的两次界定向西作了较大的移位（图7.1）。麦金德不再把它看成是与海上世界对抗，而是在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区域与之联系在一起，这个新区域包括北大西洋——“海洋中部”和北美洲。这构成了一个扩大了的与以中国和印度为中心的“东方”并列的“西方”，二者被沙漠和高山构成的巨大分水岭所分割。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麦金德最后的框架基本上持此前的两次未曾有过的乐观态度。这是因为，他认为在两个巨大的世界区域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均势，这将确保它们当中任何一方都不能获得世界支配地位。麦金德在两个较早的框架中表露了对海上世界未来的极度忧虑，在他看来，海上世界极易受到来自心脏地带的攻击。而在最后的框架中，两个对手的对抗转变成了两个极为相似的地缘政治实体之间的均衡。沃尔特斯认为，事实上麦金德1943年已抛弃心脏地带理论。的确，他抛弃了心脏地带理论中固有的陆权与海权对立，而代之以截然不同的东西对立。他还假定

"均势"有可能使冲突被合作所取代。

另一种对陆权行为的解释是，它的基本目标并非是增强其陆基力量，从而营造一种地缘政治条件，使之能够获取海上世界的力量。换言之，陆权国家所采取的政策的动机在于突破大陆堡垒，并至少获取海权国家所拥有的某些优势。对陆权国家动机的这一解释表明，对于那些居于其内向外看和居于其外向内看的人们来说，对心脏地带的认识是截然不同的。一方面，心脏地带面积辽阔、自然资源广博和战略地位重要；而另一面，它又显得荒凉、偏僻、环境恶劣和容易在广阔的陆地边缘上受到攻击。因此，它从一方面看像一个堡垒，面从另一方面看却可能像一座牢狱。这与马汉和拉策尔的观点一致，即海权是那些渴望世界权力的人们的根本需求。利斯特（List）指出，"没有分享海洋的人，是上帝的继子"。他的同胞拉策尔认为，确保机动自由，就能够提供一种可能性："只有海洋才能产生真正的世界大国"。而陆权国家则被视为很难获得全球势力范围，德国便是其中一例。它们的力量和影响总是受到它们地理位置的限制。豪斯霍费尔将这称为"空间障碍"（Raumgebundende），它与力量来自全球势力范围的海上大国形成鲜明的对比。豪斯霍费尔写道："海权国家通过从一个点轻快地跳跃到另一个点面征服了广阔的空间，正是这构成了空间桥梁（Raum? berwindende）。他还指出，"全部世界政治倾向中最具决定性的是一个国家向海洋的推进，必须向东航行。"萨沃特总结道："陆权国家的影响在其边境终结，但是海权国家的影响却可能遍及全球。"

这并不意味着他或豪斯霍费尔反对保留陆权国家。缘于德国的地理位置，一般认为两者之中陆权国家必须占据优势，但是这一理想在两者国内同样具有诱惑力。

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在他对全球政治中海权的分析中也得出结论，海权是通向世界权力的钥匙。他写道："这一分析的基本假设是，海权国家（或更确切地说，海洋大国）是全球政治行动不可或缺的，因为它是操纵全球——也就是说洲之间——范围的必要条件。因此，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葡萄牙是第一个世界大国吗?"而答案是确定无疑的。葡萄牙，意即"世界之尽头"(fim do mundo)，在海洋开始被看作一种通讯手段而非不可穿越的障碍时成为了第一个世界大国。商业活动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同时海上战略力量的部署也使之成为可能。由此可知，是海上国家而非大陆国家扮演了全球角色。

陆权国家扩张的基本目标在于将自己转变成海权国家的观点也是一种对俄国扩张行为的地缘政治解释。它无法接近海洋，"除了毫无用处的冰冻的北方之外……因此，这个国家两个世纪以来的对外政策一直以获得通向广阔海洋的通道为努力目标"。同样，沃尔什也援引克鲁切夫斯基（Kluchevsky）的观点指出，"通向海洋的渴望和不断开拓新领地的进程……是俄国历史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根据这一解释，俄国从它的莫斯科核心地区向乌拉尔山脉和波罗的海——黑海地峡之间的包括整个欧洲在内的地区扩张，是一个荒凉的、被陆地封锁的国家为获得出海口而进行的长期斗争（见图 6.2)。由于扩张尤为直接

地指向了能够提供暖水港的海域，所以，扩张也具有一种很强的南下倾向。然而，向西朝欧洲方向推进在近代表现得最为强劲，这正是 18 世纪彼得大帝为指引这个国家所重新确立的方向。核心地区被蓄意地从大陆封锁地区移了到芬兰湾——“通往西方的窗户”。俄帝国的苏维埃后裔将首都迁回到古老的核心地区，但是对海洋的渴望依旧。沃尔什断言，随后控制边缘地带的动机不仅仅是由保护“世界革命的心脏地带”的渴望激起的，而且也是为了有利于“苏维埃国家海上力量尤其是潜艇的增长”。这增加了麦金德的三段论中“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主宰了全世界”这一最后论断的份量。

两极思想无需道明存在着“针锋相对”的殊死对抗的两大力量“极”。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一种情况是，寻求统治地位的一个大国遭到了反对未来统治者野心的小国组成的临时联盟抵制。实际上，这就是指麦金德用以作为他的心脏地带理论论证起点的希腊——波斯格局。在随后的欧洲历史中，经常出现类似的联盟以对抗想象中的来自一个强大的、可怕的东方大国的威胁。除了地理面积的明显不同外，未来统治者的结构要素与那些小国的结构要素大相径庭，特殊的结构要素可以从那些在西方核心区成功获得主导地位的国家中找到。斯皮克曼将他所言的“某一时期的霸权力量”的增长视为是其领土不断膨胀的结果，因此，它逐渐变得极为强大，以致于其他更小的国家无法再与之匹敌。然而，在西方核心区中，尽管未来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表现出了强烈的扩张欲望，但小国的联盟仍然

成功地阻止了大国占据全部支配权，它成为单个国家和一批小国的双边冲突。这种局势因未来占支配地位的大国的内外压力所导致的最终分裂以及一种更为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模式的回归而自行瓦解了。由于西方核心区已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中枢，因此存在着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复制这一地区地缘政治关系模式的强烈倾向。

正如两极思想与两个大的力量中心联系在一起一样，它也与敌对冲突联系在一起。但是，也不必把这些看作它的必要部分。即便是马汉这个海权和扩张的大力倡导者，也没有断定冲突不可避免，他指出“它是一个错误，一个可悲的错误，当认识到利益冲突的情形时……只是看到了其中对抗和敌意的根本”。尽管马汉强调“扩张”和“利益冲突”，但他同时也表达了均衡状态远胜于冲突状态的观点。当他断言这最好通过“自然选择”来实现时，他使用了当时流行的生物学术语。不过，他很快就进行了限定，即，尽管“自然选择”一词暗示着“冲突和痛苦”，但同时这又能够“通过理智地估计使用中的力量，并通过磋商和达成协议的人为方法来实现接近自然的调整”从而予以避免。从这种意义上说，“通过自由的自我意志表达，允许每一方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就有可能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他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方法“似乎更适合目前的状况”。

同样，当时的另一帝国主义者寇松也倡导在20世纪领土有限的世界里通过和平方法解决争端，否则就会导致激烈的冲突。他写道，“由于适合居住的世界正在缩小”，“一个国家的利益或野心会与另一个国家的利益或野心发

生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对寇松来说，和平解决的关键位于边境线上。它们“对于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至关重要”，但是其范围的确定却掌握在“少数默默……从事探索地球未知地区的人”手中。寇松最关注的是英俄在中亚的对抗，尤其是在印帝国易于遭受入侵的北方。他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途径在于倡导确定一个将大国势力范围隔开的“缓冲地带”，以此预防“不可调和的冲突”的发生。寇松将这些缓冲地带视为被“20世纪的军事贵族”统治着的“帝国的外围”。尽管有他的倡导，但实际上英帝国和俄帝国之间未曾存在过这样的地带，即使有这么一些地方，如喜马拉雅山脉中的小国阿富汗和设法在两个主角的势力范围之间维持脆弱的独立的西藏。[①] 然而，它们却滋生了很多的疑惑，当大国角逐确实结束时，它是因为整个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不是因为确立了某些共同承认的禁区。二战以后寇松进一步发展了“缓冲地带”的思想，当时，他作为大不列颠的外相，参与了和平条约的起草。他坚信，为了分开德国和俄国的势力范围，这样的地带是必要的，并且镶嵌在两国之间的小国意欲成为这类缓冲地带。斯特劳斯——休普写道，“欧洲的形状正如它最终从凡尔赛、川农和圣杰门的议院中出现的那样”，“无疑打上了寇松思想流派的印记”。寇松相信，“科学知识胜于无知”，这就使边境“能够被转变为和平的工具和标记”。

① 西藏是中国合法的一部分，但在19世纪末它是自治的。英帝国试图逐步将之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其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却要维持其在大国角逐中中立的不确定地位。

缓冲地带的概念也可以在费尔格雷夫的著作中找到，但对于他来说，它只是“一个被挤压的小国地带”，虽说陆权和海权分离了，但它本身的地位却极不稳定。在斯特劳斯——休普看来，缓冲地带的概念从来都不是解决边境问题的真正令人满意的答案，与他同时代的地缘政治学家也倾向于赞同这一判断。寇松式的缓冲地带尽管伪装成和平地区，而实际上仍是一个对抗地带。斯特劳斯——休普认为，它所分开的国家利益和野心并没有因为它的存在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与其说“是边界使国家之间的交往更为便利”，不如说是“边界使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更加完善”。他引用莱德（Lyde）的观点指出，理想的边境应“具有有益于和平交往的地理特征”而不是阻止或妨碍交往。这些就是德芒戎、费弗尔和昂赛尔（1938）关于边境在特殊的欧洲背景中的作用的具体观点。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也认为和平解决是可能的，但并非马汉的“理智过程”或寇松的“科学知识”，他认为，建立足够的平衡力量是阻止侵略的最好方法。这就是他所说的“敌人的扩张和攻击性世界战略需要一个同样扩张的、攻击性毫不逊色的相应战略”。他反对理想政治而主张现实政治，认为只有当国家意识到它们不再具有推行它们意志的力量时，它们才变得理智和准备进行和平对话。

当使用诸如“黄祸”、“升起的太阳”和“心脏地带”这些让人回味的术语时，东西两极论就陷人了一种冲突模式。然而，到了 1943 年，麦金德已不再用这种方式看问题。他曾经将陆权和海权的对立一直视为根本的对抗。但

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对立对他来说似乎有可能结束所有这些对抗。他设想在两大世界之间确立一种均势，那么“均衡的态势也就毫无阻碍了”。这样的观点也出现在福西特、寇松、费弗尔以及其他人的观点中。当“缓冲地带”和“挤压地带”因其固有的不稳定而被否定时，分割两个世界的大片高山和荒漠地带仍被视为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是“自然”的边境。

索尔·科恩持类似的关于世界两大地缘政治区域之间均衡的观点，但他又认为，为了使其发挥作用，必须建立一个机构，以利于对其进行内外的调整。他继而设想了一个其中将会导致确立“地缘政治均衡”状态的“均衡均势”结构。科恩的术语仿效了马汉，马汉在近一个世纪之前就在寻求“均衡”，但是他这样做时使用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术语。尽管马汉使用了生物学术语“自然选择”，但科恩的“均衡均势”却来源于地质学术语。每个人都使用了反映他们那个时代流行思想的术语来强调必须“接近自然的调整”。

最后，显而易见，两极主义这些年来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形式。在陆权和海权的对立中，它们之间的不同源于它们起源和发展的地缘政治条件的根本差异。尽管世界地缘政治外表的复杂状态已通过他们的对立定期得到了“解决”，但是仍存在着另一种建立在世界的“两半”之间不同的传统观点基础上的两极观。这种两极观是一种被证明更适合使用非对抗方法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思想。这两者间的联系可能会导致另一种形式的两极主义，但它们也可能导致一种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世界观。

第八章

大区域：多极世界

与两极世界的“激烈对峙”不同的是，多极观点依赖于这样一种构想：地缘政治世界的复杂性使之分解成两个以上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自麦金德所言的“哥伦布时代”趋于终结以来，这种对世界持多元主义的看法在地缘政治上就一直存在着。在此期间，世界被欧洲人认为绝对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其它大陆则被贬为基普林笔下的“黑暗的埃及之夜”①。到20世纪初期，新的世界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和日本，同时其它潜在的力量中心也现出端倪。到那时，人们最终不得不承认的确存在

① 当然，对于这种“黑暗的埃及之夜”而言，美国是一个例外。这一短语出自基普林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写的一首名叫《白种人的职责》的诗歌。在诗中，美国被激励去“承担白种人的职责”，这是基普林用极为理想的术语所幻想的。尽管美国没有按照他的设想选择承担这一责任，但它的确已跻身于世界大国的行列并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以致于仅用了半个世纪便取代了作为世界主要强国的大不列颠。

其它文明，它们在过去曾是重要的力量中心。

多元主义特殊结构的提出，是对马汉和麦金德两极观点最重要的挑战，它认为世界地缘政治表面分为三个“大区域”。在古代和中世纪，世界地图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三分为欧洲、亚洲和非洲三个大陆，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它仍旧是欧洲世界观的主要特征。然而，随着后来欧洲支配地位的逐步增长，使得世界其它大部分地区的地位变得无关紧要。正如我们所见，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成了一个由强国统治的地缘政治破碎区。这些强国维持着一种基于脆弱均势的暂时协议，反映这种均衡变化的地缘政治情景变化是周期性地通过战争完成的。随着政治利益的变化，这些强国筹划着结盟与再结盟。

直到19世纪下半叶，欧洲强国之间的实际联盟才开始固定为更坚实的集团。这些集团分别以欧洲大陆西部、中部和东部的国家为中心，这种三重划分成为1914年和1939—1941年间彼此作战的联盟基础。当随后的冷战稳固地发生在两个“世界”之间时，存在第三个这种“世界”的想法从开始就被提了出来。由于在20世纪60年代两极对抗的激烈程度开始下降，于是欧洲开始作为第三个潜在角色出现。

众所周知，在20世纪早期，根本的地缘政治思想只是一种强烈的预感。契伦曾受困于他自己的看法，认为脆弱的均势正在被打破，各国正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对抗普遍存在，最基本的对抗存在于俄国和英国之间，它们分别是陆地强国和海上强国。虽然在海洋国家看来，这种对

抗在全球范围内延展，贯穿历史的威胁主要来自亚洲帝国，但从大陆欧洲的角度看，它则构成了一种极为不同的威胁：拉维斯所言的鲸和白熊之间挤压的威胁。海洋国家尤其是英国认为，从欧洲中心向东通过巴尔干半岛一直延伸到中东的陆地是一个巨大破碎地带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一破碎地带位于海上势力和大陆强国之间，然后扩展到亚洲。这就是寇松所提到的“帝国外围”的缓冲地带。亦即费尔格雷夫的挤压地带，它由从东欧一直延伸到南亚的“许多政治独立不够稳定、经济上更具依赖性的缓冲国”组成。费尔格雷夫进一步指出：“这一地带在位置上……随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它在任何时期都包括芬兰、瑞典、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波兰、巴尔干诸国、波斯、阿富汗、暹罗（泰国）和朝鲜。”最为重要的是，他断言“德国甚至中国也属于这一地带。无组织且被分为小的和敌对的共同体的中欧，根本上而言属于挤压地带，但如果是有组织的和强大的，则处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地位”。隐含在德国地缘政治思想背后的基本意图就是使中欧“有组织和强大”。随着 1871 年“小德国”（Kleindeutschland）统一到德意志帝国，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以德意志和奥匈帝国为中心的“大德国”（Grossdeutschland）成为各地之间更紧密的联系纽带。其内在的观点是，缘于其自身地缘政治情势的脆弱性，德国只有作为中欧国家集团的一部分，才能确保安全。这是中欧学说的基石，也就是说，一个强大而有凝聚力的大陆心脏地带地缘政治区域能够抵御海上和大陆强国

的控制。一战前夕，许多地缘政治思想家都支持这一观点，其中著名的有约瑟夫·帕奇和弗里德里希·瑙曼（见第2章）。帕奇曾设想过这样一种可怕的可能性，即“庞大的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处于一种“征服或绝对吞并中欧小国”的位置。由于中欧过去一直是“所有国家的战场”，所以他得出结论指出，“世界历史的进程就是警告中欧国家要更融洽地团结在一起，使各自的政治利益分歧居于次要地位，而致力于确保它们完全独立和更远大的目标。”预想中的中欧的实际疆界急剧地变化着，在帕奇的定义中，它从孚日山脉向东一直延伸至波罗的海——黑海地峡（图8.1）。因而它实际包含了法国东部边界和俄罗斯西部边界间的所有陆地。它拥有1.3亿人口和各种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使它成为一个最可怕的潜在力量。德国被视为是其天然的中心和能够提供必要组织来统一它的唯一国家。

中欧最初被想象为新德意志帝国所面临的威胁的反抗力量，这种威胁源自以险恶方式包围着它的其它欧洲强国，但是，其作用使其势力扩张成为必需，这包括获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而生存空间是像德国这样人口稠密的国家注定要得到的。这在20世纪早期显得极为明显，当时，人口过剩被认为是欧洲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拉策尔及其追随者来说，国家的发展和拥有足够的空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在欧洲，领土扩张被认为是获取生存空间的唯一途径。英国和其它海上强国通过海外殖民实现了这一点，但对于德国而言，要获得必要的生存空间以及资源和

市场，德国人最急切和最必须的就是向东看。这就成了“东进”政策，它使德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向东穿过巴尔干半岛到达了达达尼尔海峡甚至更远的地方。创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瑙曼把帕奇的中欧边界扩展到了斯堪的那维亚和土耳其。他认为这个“更大的”中欧是将来重要的世界力量之一。他写道：“中欧是战争的结果”，“我们作为中欧人将从战争中出现”，他设想，未来的中欧将是巨大的世界经济集团之一。

瑙曼的梦想没有实现，在经历了德国痛苦的失败之后，作为拉采尔思想，尤其是中欧学说继承者的德国地缘政治思想出现了（见第三章）。至于问题何在，豪斯霍费尔的回答是，单纯的中欧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所料想的那样，德国遭遇的冲突不是来自陆权或海权，而是这两者间未曾预料的联盟。豪斯霍费尔称之为“海上和草原上的强盗”暂时合作的动机必须进行分析，“因为我们必须知道这种联盟中谁是可以争取的”。因此，豪斯霍费尔认为，德国要达到真正安全和成功的目的，应该把触角伸向全球，而不仅仅只涉足欧洲，为此，就必须取得对海上和大陆两者的控制。这是既非海上强国，亦非大陆强国所能完成的。他断言，“这种成为海上强国或大陆强国的短视”，“是世界历史中战争地理学的主题（leitmotif）”。“大草原和海上的强盗”只是在它们自己特殊的环境中取得了统治。由于德国存在陆地和海上双重疆界，所以它拥有了获得双重优势、并同时利用大陆和海洋资源的潜力，这样，德国所处的中心位置的劣势也就转变成了国家的优势。大

陆和海洋，心脏地带和远洋海域，彼此开放渗透，这可能是地缘堡垒（Raumüberwindende）的基石，它将会给德国带来它十分渴望的真正的世界权力。

因而，地缘政治学家认为由德国组织起来的中欧应该既是一个陆权国家，也是一个海权国家。德国总体空间的确切边界尚有争议，但普遍认可的是，"东进"是其注定的方向，必须向东夺取生存空间。豪斯霍费尔进一步发展了泛区域理论（Panideen），认为每个全球性的泛区域都被未来的强权之一所控制。随着在北半球大陆支配地位的获得，这些强国接着就会把他们的势力范围扩张到热带地区。起初，豪斯霍费尔设想了三大泛区域：日本控制下的远东、美国控制下的西半球和德国控制下的欧洲和非洲。通过世界新的地缘堡垒国家对世界陆地和海洋的控制，使扩张变得可能，豪斯霍费尔将这种可能视为庞大的陆地集团统一的基础。于是，那些在陆地和海洋国家之间被摒弃的"破碎地带"或"缓冲地带"，将被改变成新的巨大强国的中心。进而，一个全新的世界权力结构将取代由海上强国统治的结构。虽然最初这是一个三极结构，但豪斯霍费尔并没有局限于只有三大世界力量中心的想法，在后来的阐释中，苏联也被赋予了泛区域的地位。

二战期间，盟国尤其是参战后的美国对世界地缘政治舞台进行了重新评估，这是对德国地缘政治学含义进行的宽泛应答。斯皮克曼着手了一项关于"地理学意义上国家领土关系"的研究。他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全球和平计划必须建立在世界地理的基础上"以及"对单一地区的

分析必须广泛涉及地表所有区域"。虽然他把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和麦金德的思想联系了起来，但他得出的结论却与他们不同。斯皮克曼指出，他所说的"世界权力中心"既不在海上世界也不在大陆世界，而是界于这两者之间的陆地，他称之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Rimland)，其中心位于他所说的"欧洲沿海地区"、印度次大陆和远东(图 8.2)。它一直是海上与陆地强国寻求控制边缘地带并增强它们在那里实力的历史目标。虽然对于个别的边缘地带部分而言，它屡获成功，但最常见的情况之一是冲突。然而，斯皮克曼断言，将来一个大国控制整个边缘地带是可能的，"由各海岸线组成的环状带"形成了一条从波罗的海到鄂霍次克海的"海上高速公路"，这使得这一边缘地带内和周围的通讯变得既廉价又便利。这样，一个联合的"欧亚边缘地带"将成为一支可怕的力量，它能够颠覆现存的均衡从而统治世界。斯皮克曼认为，美国和英国是构成海上世界必须的部分，与主要的陆地强国苏联一起，它们在阻止"旧世界力量中心的统一"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这里所指便是边缘地带。这是斯皮克曼对两次世界大战所显示出的陆权和海权联盟特征的地缘政治解释。然而，与德国地缘政治学家不同的是，斯派克曼认为某个力量对它进行控制也有明显的益处。"两栖的边缘地带"国家在历史上由于受到来自陆地和海上的交替压力。他指出，在一战中最终削弱敌国的是，它要在"两线和海陆两方面同时作战"。

因此，在斯皮克曼的世界观点中，有三个主要的世界

力量中心：海上世界、陆地世界（以心脏地带为中心），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边缘地带。斯皮克曼坚持认为，正是后者——而不是心脏地带——拥有统治世界的最大潜力，而这只有其它两个力量中心的联合才能阻止。

二战后，在分析心脏地带对抗边缘地带的整个问题时，梅尼格（1956）倾向于支持后者。他缩小了心脏地带的范围和重要性，同时强调边缘地带的重要性。他把边缘地带分为两部分，分别称之为“外岛”（extrainsular）和“内岛”（intrainsular）。前者向外面临着海上世界，而后者向内朝着大陆世界，两者之间具体的分界线随着特定时期内海上和陆地强国间力量的相应变化而波动。与斯皮克曼一样，梅尼格相信真正的力量中心在边缘地带，而不在心脏地带，并且这就是海上和陆地强国通过获取和维持对边缘地带的控制以增强其实力的缘由。

边缘地带作为世界力量的主要中心的全部内涵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世界岛是人类命运的中心和心脏，美国是麦金德所说的外新月或内新月的一部分。斯皮克曼认为，美国的政策建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并力求限制边缘地带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因此，就必须在边缘地带内建立一种均势，这是美国外交政策所面临的任务。然而，另一个三极观念把美国提升到了世界力量结构中一个更中心的位置，基于此，地缘政治思想可追溯到1898年的美西战争，那时美国第一次显示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自身的力量。虽然拉维斯把英俄冲突当作世界政治的基本事实，但25年后，瑙曼认识到了三个“世界大国”的强盛。这些

他称之为——运用当时流行的生物学术语——“三大相对完整的有机体：英国、美国和俄国”。这三个“超民族大国”的面积和资源赋予了它们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与后来的豪斯霍费尔一样，瑙曼并不把这种三极统治当作一种永久的特征。他预见到了中欧也有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可能性，并因此而加入它们的行列。结果，一战以后，其中的两个——美国和俄国，适应一代人中绝大多数的要求，很大程度上不再积极参与世界事务。孤立主义者持“美国堡垒”的看法，与此相对应的是，俄国的共产主义者也把他们的新苏联看作是一个被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世界所包围的受围困的堡垒。瑙曼所言的世界大国中的第三个——英国成为欧洲中心世界秩序中的最后幸存者，它与法国结成了不稳定的联盟，以行使一种暂时的并日益脆弱的世界共同管辖权。当英法共同管辖权受到来自豪斯霍费尔的新世界秩序中两个大国的挑战时，这种情形骤然终结了。在欧洲大陆要塞内的俄国堡垒和“海洋防御外缘”后的美国堡垒随之都明确地登上了世界舞台。获得胜利的“大三角”联盟由瑙曼在战争初期所指的世界大国组成，他所言的中欧的第二次挑战再度失败。因此，斯皮克曼断言，当前的世界和平建立在存在“三个大国力量均衡”的基础上。吉尔基虽然也赞同这种三极论断，但他又认为美国处在“欧亚两洲之间的一块大陆性岛屿”的位置上，更易受到攻击。

乔治·克雷西（George Cressey）在对美国力量的估计上更为乐观，在承认一个新的世界权力中心在亚洲出现的

同时，他对心脏地带的作用提出了质疑。他写道："如果在什么地方真有那么一个世界堡垒或心脏地带，与其说在亚洲，不如说在北美"。他预言："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任何世界战争都不会取得胜利。"在对战后的苏联力量，尤其是心脏地带进行分析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他指出了苏联所处位置的地缘政治弱点。另一方面，他把他所说的"这个新世界大陆"看作是所有大的世界力量中心中最具潜力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它自身就是一个"心脏地带"。

因此，1940年的"大三角"虽使人想起了瑙曼所说的"大国"，但是，这种说法同样也预示着1947年希腊危机后数年的情形，那时世界正逐渐变成两极。尽管斯皮克曼本人使用了"三个超级大国"的用语，但是极为明显的是，英国不再像其它两个超级大国那样在同一联盟内，事实上，它只是19世纪世界秩序的幸存者，而不会在20世纪下半叶扮演重要的角色。源于这种认识的观点把英国视为是在两个真正的超级大国"激烈对峙"间的"第三股力量"。这是二战后的若干年里英国外交政策的地缘政治基石。它建议英法应集中它们的资源，作为新的"第三股力量"的基础。这样，由于法国的加人，大三角至少在名义上变成了"大四角"，于是，英国外交大臣 E. 贝文 (Ernest Bevin) 建议在和解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并与它们的亚非属国一起缔造一个富于潜力的强大国家集团。这里，他所指的是"三大门罗区域"，包括美国、苏联和英

法联盟[1]。美国在新世界的霸权和苏联在欧亚的霸权将被英法对亚非的共同统治权所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19世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将能适应——并成为其中一部分——新的世界体系。尽管英法“第三股力量”的思想在两国都提升到了最高的水平，但它“终究没有变成现实”[2]。它在全球范围内的作用依赖于两国海外属地的强大，很显然，这些都建立在极不牢固的基础上。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作为具有潜力的“第三股力量”出现的，是斯皮克曼所言的边缘地带力量中三个主要中心之一的“欧洲沿海地区”，而不是英法的联合势力。由于各帝国的衰落，在它们废墟上建立一个联合欧洲的想法产生了——犹如长生鸟重生一样，它采取了欧洲共同体的形式。

新的地缘政治实体建立于早在一战时期就已产生的思想基础上。德芒戎的《欧洲的衰落》比瑙曼的《中欧》晚了几年，但紧随麦金德改变并将中欧枢纽地区扩大到心脏地带之后。瑙曼提倡增强中欧国家之间的联系，而麦金德

---

① 以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命名的“门罗主义”出笼于1823年的白宫。它指出，任何欧洲国家侵入美洲大陆——北美洲或南美洲——都将被视为威胁到了美国的和平与安全，从而将被视为不友好的行为。“门罗主义”是美国在西半球霸权的早期声明。近来，它所指的是一个在特定地区内拥有霸权地位的主要国家。

② 1904年英法两国间的相互和解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的第一阶段。虽然根本上而言它是一个殖民地协议，但它为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英法联盟提供了一个框架。1940年，仅仅在法国沦陷前几周，被围困的法国政府建议两国完全联合起来。这是恳切呼吁丘吉尔首相的一种主张，但当时的情况清楚地表明，即使英国政府准备接受它，那也是不切实际的。二战后，“敦刻尔克条约”（1947）中呼吁两国间更紧密地合作。它意味着英国对法国重返大国行列的承认，而这是英国战斗得来的。在英国的压力下，“大三角”变成了“大四角”，接着由于中国的加入成了“大五角”。这五国随之成为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51年法国政府提议建立欧洲国家“共同体”，并且最初它设想英法在这一组织内联合行使领导权。但是，英国更倾向于在全球背景下而不是在欧洲背景下与法国进行合作。法国坚持推行这一计划的结果是，两国间关系降温了。

则主张加强海上国家之间的联系，并预见到了贝文在20世纪50年代所说的“门罗区域”。然而，德芒戎的观点与其他两人有着本质的不同，他关注的是欧洲衰落的含意，使用了诸如“团体”、“联合体”、“共同体”和“集团”等术语，他建议用统一来解决问题。由于发展了源于维达尔的思想，德芒戎成为倡导欧洲联合并采用地缘政治的术语予以描述的最早的地理学家之一。欧洲的衰落意味着欧洲中心世界的衰落，他认为美国和日本是显露端倪的未来大国。因此，他坚持认为，如果“原有的大陆（le vieux continent）”想要继续发挥世界性的作用，欧洲的联合是必要的。可见，德芒戎的世界观同样也是一种三极观，并且与后来被豪斯霍费尔所发展的观点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法国地理学家和德国地理学家的设想之间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德芒戎的建议是创建一个欧洲联邦国家，它将确保没有统治的联合。20世纪20年代，欧洲联合的设想得到了广泛地讨论，并且成为给欧洲带来更大安全的战略中的核心要素。当时法国政界领导人，如乔治·亨瑞特（George Herriot）和阿里士泰德·白里安采纳了这一设想，并由于1932年白里安建议创立一个“欧洲合众国”而达到了顶峰。[①] 极为重要的是，当德芒戎的设想与国际主义和国际联盟紧密联系时，豪斯霍费尔的观点却与希特勒及第三帝

① 20世纪20年代是对国际主义高度期望的时期。这些集中反映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之中，在那里，欧洲的主要政治家定期聚会，讨论更为密切地合作的事宜。其中重要的是德国和法国的外交部长斯特雷斯曼和白里安。他们两人为了两国间的永久和解而不知疲倦地一起工作，从而双双获得192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德法两国的密切关系因1929年斯特雷斯曼的去世而遭到损害，并随着1933年纳粹的上台而终结。

国联系了起来。帝国的理想虽然在1945年的一片废墟中化为了泡影，但联盟的设想却重新成了战后欧洲共同体的基石。这个共同体演化成了一种地缘政治实体概念，它与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现在是欧洲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和北约（NATO）为代表的更为有限的经济和防务实体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这个羽翼未丰的欧洲地缘政治实体成为了欧洲在两极世界中作为“第三股力量”设想的基础。

至此，另一种与冷战两极世界相对的设想正得到加强。这就是“第三世界”的设想，它拥有与“第一”和“第二”世界极为不同的特征并包含了一种不同的世界秩序的意象。如欧洲共同体，它因欧洲各帝国的灰飞烟灭而产生，但它源于其被统治的民众而不是前帝国本身。1955年，来自亚非大陆的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召开了，它所表现的是这样一种意象，即，既要团结一致反对前帝国主义国家的继续统治，又必须进行全球选择以对抗“北方内战”①。尽管第三世界运动最初以东南亚为中心，尤其是在殖民帝国瓦解后出现的第一批新兴国家之一的印尼，但是，随后印度就成了领导力量。隐含其中的设想被K. 梅隆（Krishna Menon）和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加以改良和发展了，他们认为最大和最强的新兴国家印度是其成

---

① 1955年的万隆会议由印尼总统苏加诺主持，旨在促进亚非国家在世界事务政策上的密切合作。总共有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国家的代表出席，非洲国民议会的代表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冷战中的不结盟问题，但是，随着不结盟运动的发展，它已不局限于亚非国家。随后的会议在贝尔格莱德（1961）和开罗召开（1964）。

功的关键。

索尔·科恩则以极为不同的观点来认识印度在世界的地位。他极少把它作为相对弱小国家集团的领导者来看待，而是将次大陆提升为介于其它两者之间的第三大潜在的地缘战略地区。他写道："印度是南亚的枢纽"，"在维护亚洲权力的有效均衡上，具有巨大的地缘政治意义"。梅隆和尼赫鲁可能认同了它的力量，但却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设想它的用途。他们认为印度始终是其中一部分的第三世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第三个力量中心，而是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世界意象，这一意象看起来是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梅隆极力反对大国的全球统治，但并不是坚决反对"第三个集团"的主张。他使用了诸如"不结盟"和"和平区域"等术语，认为甘地的思想更适合那些并不拥有以任何其它方式反对已建立的世界秩序的物质力量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由于更多新兴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第三世界的地理区域扩展到覆盖热带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图8.3）。它主要由大量不同种类的新国家结合而成，但它把亚非世界凝结成了一个地缘政治实体。它主要集中在印度洋周围，最初仅仅是因为相对的不发达和反对北半球大国对它们的经济、政治统治而连系在一起。从地缘政治意义上而言，印度洋过去是一个"王国"，而现在它以这种新的形式再现了[①]。

① 印度洋的地缘政治统一由葡萄牙人所完成，他们在16世纪早期从阿拉伯人那里夺取过来，随后它成为了英国世界权力的商业、战略乃至政治中心。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印度洋地区的这一角色在很大程度上逐渐由印度担当。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冷战变得日益乏味和无效，一些激进的地理学家开始追求把第三世界作为可能性之一的设想。如果说两极对抗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视为是发生在北半球的一种“冷内战”（Cold Civil War）的话，那么，世界其它地方日益增长的问题就被忽视了。这些问题集中在发展和世界资源正被少数几个国家为了致富而过度使用的方式上。显然，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其中的国家在冲突时被当作棋子，它们的真正利益完全被忽略了。为此，沃尔特斯道明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并指出，“始终存在着一条总体的地理线，它更是一条南北分界线”。这样，“南方”第一次以非方向概念出现了。对全球东西两分的认识开始受到新的南北两分的挑战。从那时起直至苏联瓦解，世界即便还不是三极，却始终呈现出三极化的趋势。而且，南方问题逐渐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①

三极观念代表了多元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它依赖于存在一个“第三”实体的设想——无论把它想像为“第三股力量”、“第三世界”、第三地带”还是“第三门罗区域”——它都是界于两个“激烈对峙”的世界之间。这是由主角力量可选择性的存在所引起的，它代表了替代它们其中之一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如果世界上存在第四、第五或第六大实体，那么，在现存体系内存在一个可选择

① 勃兰特报告（1980）是西方思想在有关第三世界事务上的一个里程碑。由一个著名的国际集团提出和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倡导的这一报告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它试图证明，西方乃至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的最终利益都有赖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的对象便不成问题，而对世界体系本身性质的不同推测则是必要的。

费尔格雷夫确认了他所说的“旧世界平行四边形”中的三个“古代不变的文明”，并且将美国增加到新世界中来。它们每个都构成了不同的人类区域和历史权力中心，但只有当时的美国依靠自身成为了一个世界大国。费尔格雷夫认为中国“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世界……它过于强大和具有同一性因而不易被压碎”，它是理想的类型，但是，其它国家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同样的基本地缘政治特征。在费尔格雷夫的世界观中，这四个国家被“一条连续的线路”连结起来，他称之为“定居和发达的北部地带”，它就像一条缠绕地球的锁链把它们连在一起（图 8.4）。

二战期间，惠特尔西指出了他所说的“地球上最大的政治实体”。它们是俄国、中国、印度和美国，其巨大疆域和人力、物力资源的联合使它们成为世界权力中一个特殊的种类。此外，惠特尔西还加进了巴西、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认为它们也拥有成为未来世界权力中心的巨大潜力。他强调，即使仅仅从潜力看，国家的疆域大小和权力并不同义。根本上而言，他所说的国家“地理上的成熟”才决定资源转化为有效权力的程度。他认为，二战爆发时，这些大国中只有其中之一已经获得了必要的地理上的成熟，那就是美国。因此，在潜力和收益之间存在不可弥合的裂缝，世界权力的真实分配必须通过其它因素来加以解释。与费尔格雷夫一样，惠特尔西因而也承认，巨大的文明中心没有必要——或者甚至可能——是国家本身，他

们两人都注重把欧洲内部的划分作为对此的证明。

斯皮克曼指出，在地缘政治的多元化和帝国主义体系的崩溃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他仿效麦金德对哥伦布时代终结的评论，断言，“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时期已经结束了”，因此，“世界权力中心只剩下了西欧；或者根本不再有任何世界权力中心。”其间，出现了“权力的分散和不同的力量中心所支配的势力范围的形成”。这些他所指的是美洲、远东、“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东大西洋和印度洋。其中每一个在当时都被单一的大国所统治，它们分别是美国、日本、俄国、俄苏、德国和英国。当大的文明中心在缓慢地变迁时，世界权力却在更迅速地浮沉，这导致斯皮克曼对一种“文明”和一个“力量”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尽管他把每个“大的势力范围”被一个单一的大国所统治和管理视作标准的情形，但是，从全球范围看，他又认为它们之间应存在一种必要的权力均衡，以防止统治地位被任何一国获得而损害其它国家的地位。

豪斯霍费尔和斯皮克曼都曾设想一个国家统治一种文明，从而形成一个基本由每个都具有自身区域权力根基的大国所构成的世界。然而，维达尔则设想了一种联合进程的替代模式，它不是由单个国家的统治所产生的，而是各政治组成单位联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更大的单位。这就是集团化过程，导致了国家共同体的形成，正如我们所见，它成了德芒戎建议欧洲统一的基础。虽然德芒戎的新架构中第一位的是三极，但三极并不是其必要条件。德芒戎设想英帝国以某种或其它的形式继续存在，和他之前的维达尔

一样，他把印度视为英国的世界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石。

紧随二战后的若干年里，在复杂和多变的世界中，联合的过程主要是使用权力和协议。在每个超级大国都有它自己的“巨大范围”时，较小的国家则开始采取集团的形式。这一过程由前欧洲大国所领导，它们试图通过创建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实体，共同重新获得它们各自已失去的一些权力和世界影响，以此寻求弥补其降低了的世界地位。虽然诸如 OEEC、NATO 和欧洲理事会等组织成为了世界上其它地方类似组织发展的榜样，但正是欧洲联盟发展了最强大的动力机制，它建立在一种新的跨国地缘政治结构出现的基础上。

这种新的组织结构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出现，与日趋强调地缘政治的多极化解释相一致。德·伯利吉（De Blij）声称，“集团的时代……已经来到”，尽管存在诸多问题和挫折，但这一趋势似乎是恒久的。因此，“一幅新的政治地理地图正在被重新绘制”。克戎（G.R.Crone）把新的集团视为战后世界最重要的特征，并进而断定“至少存在十个大的政治性国家集团”。虽然各集团内联合的实际程度各异，但克戎认为它们都是“自身具有历史合理性和文化根基的地区”。它们在地理上能联合成由相邻国家组成的集团，或者也能由疆域不接壤的海上国家组成。其中有他所确认的“四个拥有世界地位的集团”，它们是共产主义集团、印度、非洲和西方。廷克（Hugh Tinker）在评价 20 世纪 60 年代印度提高了在世界中的地位时，认为他所说的“大陆国家大家庭”由中国、巴

西、苏联和印度组成。

20世纪70年代,伊斯特和普雷斯科特则显得富于诗意,用麦尔(Walter de la Mare)的"一切都在不断地改变,不是停止不动而是不停地变化"来描述他们所指的"那些作用于动态世界的国际舞台上的持续力量"。他们描绘了一幅与以前"显著不同的国际景象",其主要特征是支离破碎。但是,当伊斯特和普雷斯科特所谈论的主题是"一个破碎的世界"时——恰如一块破碎的玻璃所表现的那样令人回味——他们所看到的最重要的发展是国际集团。他们指出,"毋庸质疑的是,通向更广泛的政治联合的显著趋势,自1945年起就已经显露出来,这表达了……进步观念的新创举"。哈特向所提及的"更高层次的政治组织"被伊斯特和普雷斯科特简称为"国际集团"。这些,他们视之为"趋于淡化国家主权的概念,正如有些人认为它已过时一样。事实上,这里所表达的是一个支撑庞大的 秩序良好的 多民族社会的革命性观点。"其中,欧洲共同体是一个有着更广泛地缘政治意义的组织,"它给世界提供了一个区域合作的模式。"拉西特(Russett)则通过发展这一区域合作模式而更进一步。他分析了那些必须包含其中的要素,以便于在一个多样性的和"斑驳"的世界中,国家区域集团能够稳固和成功。在此,他阐明了社会文化的同质和政治经济独立的必要性。虽然迄今为止"世界区域次系统远未像国家系统疆界那样得到很好的描述",但他仍然预测,在地区水平上将会有进一步的联合。

由此而形成的思想反映了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既然

选择对象与过去一样是冲突的，那么区域合作必定是件好事。[①] 然而，很少有意向致力于这些区域集团间相互关系的问题。鉴于东西两大区域集团的对立，因而，从表面上看，很难假定类似的敌意不是其它地区集团的特征。伊斯特和普雷斯科特认为，欧洲共同体的极大成功，有助于“欧洲差异的存留”。拉西特指出，既然地区间和国家间一样，冲突易于发生，那么地区联合的全部影响就不必是和平的。因此，在全球合作的背景下，致力于正在出现的区域集团间相互关系的整个问题是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将有可能“决定区域集团是会给人类建造一座稳固的政治大厦，抑或仅仅是一座不安全的庙宇，能够轻易被摧毁”。

20世纪60年代，科恩看到了“一个分裂的世界”，但这种世界观形成于冷战的冲突持续支配着世界舞台以及两大集团似乎仍就相对隔绝的时期。科恩指出，在核时代，获得优势和支配的观念已变得极不合时宜。同样，遏制和靠外围支撑的设想也已经过时。大陆心脏地带——边缘地带的思想已使美国承担了太多的责任。科恩断言，“自由世界已成了一个神话的受害者，这个神话是，如果统一的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部分联合起来，那么，世界岛就形成了内在的统一。它附含的意义是，除非海上国家能

---

① 依照联邦模式进行区域合作的一个例子是北罗得西亚、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组成的“中非联邦”(1953—1963)。它是在独立过程中由英国政府推行的，被认为是促进更广泛地区利益的最好方式。然而，事实证明，联邦内成员国显露的“民族”特性意识过于强烈，因此，最终并不成功。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在1964年宣布独立，分别定名为赞比亚和马拉维，但是由于少数白人拒绝承认多数政府，南罗得西亚的独立被大大延迟。直到1980年，它才最终获得独立并定名为津巴布韦。

够维持对全部欧亚沿海地区的控制，否则它们无法确保其地位。这个神话源于麦金德早期的论述和斯皮克曼的批判”。不过，他在对此问题的最后论述中，重新回到了麦金德的观点中。他说：“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麦金德1943年暗示海上世界最终将分成三个部分时，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科恩自己的反驳是，整个心脏地带——边缘地带的论题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多米诺骨牌理论”都应该被摈弃，而代之以一个更为紧密的区域建构。他在承认一个全球两极框架的前提下，设想了集团的部分解体和区域集团的出现。这些是比由国家提供的“更大的地域框架”。“这些区域化进程在世界地缘政治更为成熟的部分里最为强劲，而民族化进程则在不发达地区最为强大”。新的地区主义被视为比僵化的两极体系更有益于必要的变化。从自然状态来看，世界体系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而他的目标就在于“提出一个预示我们这个时代地理动力学的框架”。因此，他把多极体系与两极体系联系起来，认为他们是彼此补充的，而不是代表相互排外的世界体系。有时，冷战的持续似乎增强了一些人的观点，他们相信两极体系事实上是恒久的，科恩指出，在两大“地缘战略”区域组成的全球框架内，新的“地缘政治”区域正在显现。它们是北美、西欧、苏联和中国，其显著的特征是“位置相邻和资源互补”。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两极框架内的“多重权力叉点”正 在显露。随着这一主题的进一步发展，科恩在1973年指出：“（这一）情势的主要前提在于，显示国家和更大区域之间关系特征的动态均衡，是全球政

治系统生态学固有的”。他坚持“全球权力的多中心特性”和四大“权力叉点”的重要性。因而，科恩所设想的世界体系的主要特征是多中心的且有等级之分，同时它的组成部分产生于“一种平衡均势”，并以动态的“地缘政治均衡”状态存在。平衡力将导致“动态的宏观区域主义”的形成。能够变化是“地缘政治生活的一个本质特征”。然而，僵化会使建立在过时观点基础上的不满体系永存，这必然导致不稳定和寻求用暴力解决问题。因此，多中心世界比两极世界更能保证全球和平。

多中心世界观可概括为一点，即多重权力中心的存在是其标准的形态。三极世界是在两极冲突中插入第三个实体的特定变形。它既不同于意味着某个完整事物瓦解的“破碎”世界，也不同于表明偏离了希望统一的“分裂”世界，多中心规范是一种“均衡”的世界，其中多重不同的中心相互制衡。正如科恩所言，“势力范围对于维护国家和地区的意志表达而言至关重要……作出的选择在于，要么是一个单一的世界体系，要么是绝对混乱”。犹如惠特尔西所设想的那样，这是一种缺乏全球和谐的状况，它只不过是一种权力控制状况。当均衡有效运作时，它阻止任何组成单位变得过于强大，从而获得一种统治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近现代欧洲国际舞台本质特征的“均势”被运用到了全球水平。均衡必须是动态的，它允许权力现实变化的发生。这种多中心观把两极世界贬低为一种异乎寻常的、暂时的现象，具有特定环境的特征。由此看来，它也可被视为是对第三种主要世界观中固有优势的一种防备。

第九章

驳倒盲目的地理学家？
中心——外围世界

我要驳倒那些盲目的地理学家们
他们把世界三分区域，
我把大马士革作为起点
从那里描绘帝国的蓝图。

克里斯托夫·马洛维《帖木尔大帝》第一部分第四卷之四

中心原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探讨的那些地缘政治世界观中最常见的特征。它基于这样一种观点：无论国际关系的结构变得多么复杂，它总存一个拥有特别重要地位的“中心位置”。这种特殊的重要性并不单单指政治的：它是政治、商贸、技术、文化、人口和军事各种因素的结合体。具有此种特征的位置可以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用地缘政治学术语可以把它

分别描述为核心区域、地区、地带、重心或心脏地带[①]。尽管被视为能扮演这种角色的实际位置在不断地改变，但在某一特殊国家、地域或全球整体范围内存在着一个“中心”的基本观点却依旧未变[②]。在中世纪的世界地图（mappa mundi）中，世界的中心是耶路撒冷，到了近代，则出现了众多的“点”，经由它们来绘制“帝国的蓝图”[③]。

一个世界中心的存在必定意味着一个完全与其相反的世界外围的存在，即边缘。如果说中心是各种力量以不同形式的聚合点，那么，边缘就可以界定为权力空白地区，同时，在两端之间又存在一个从绝对中心到绝对边缘的过渡区域。而正是在这片位于中心和边缘之间的灰色区域内，上演了地缘政治世界中的敌意和复杂关系，那些垂涎未来权力的国家也是从这里蓄势待发。

事实是，中心论观包含于其它观点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至少是源于居于其中的人们对任何特定地区一贯所赋予的言过其实的重要性。由于他们与其密切的地域关系，使之变成了首要的地理现实及他们环境经历的最重要的中

---

① “心脏”或“心脏地带”是用来描述一个特定国家或民族的地理和文化中心的术语。比如印度的所谓“印度心脏地带”及美国和俄国的相应的“心脏地带”。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而言，它可能是指英国或欧洲的“心脏”。麦金德在一种极为特定的意义上使用了“心脏地带”术语，指的是最大大陆的内陆中心（见第五章）。

② 中心位置学说建立在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基本理论基础之上。它设定了具有不同重要性的城市之间的等级，这一尝试在纳粹时期得以实施，运用于东欧被占领区。除此之外，它对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影响并不明显。

③ 马绪维的“垂直线”意思是指经度的本初子午线，16世纪的绘图者们标在了各种不同的位置。它意味着中心和权力，此处帖木尔所言的“开始”垂直线，意思是指由此建立其庞大的帝国。它似乎与子午线用于作为14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托第西莱斯条约中划分世界的分界线有关。在西顿（Seaton）看来，马绪维所用世界地图是1570年沃特留斯出版于安特卫普的世界地图。“他（马绪维）利用国王和征服者作为棋子在进行一场特殊的棋局，世界区域即是棋盘：一场战争角逐（kriegspiel）”。

心。因此，就必然存在一种对故土根深蒂固的偏爱，它导致一种拓扑变换，即，对其重要地位的判断远甚于通过对其重要性的任何客观评价所可能得出的结论。那些负责提出最具影响力的世界观的地理学家们在他们关于世界权力的理论中始终冠以他们的国家一种特殊的重要性。在麦金德的“枢纽理论”提出30年前的1868年，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反复考证了英语世界的重心变化——他命名为“大不列颠”——并将之与关于中心事务的世界地图的主观性联系起来。他统一命名的这些在特尔斐（Delphi）所确定的中心（omphalos）之后，这里古希腊人视之为全球可居住地的中心。迪尔克指出：“希罗多德坚持认为希腊是世界的最中心。根据这一观点，为了使希腊能在正午沐浴在阳光之下，不幸的东方人不得不忍受寒冷，而更为倒霉的印度人则要每天在酷暑中煎熬。”“两千年来伦敦为之是‘地球陆地的中心’而引以为自豪。”迪尔克认为这种“中心主义‘（omphalism）世界观不可避免的带有主观性并因而歪曲现实。他评论道，那么，现在位于堪萨斯州的瑞莱堡（Fort Riley）就接替了密苏里州的独立而成为“世界的中心……各大陆则从海德公园一角来丈量它们的距离”。

布劳戴尔谈到，仅仅从“某一有利点”来观察世界“一开始就是对解释的片面形式的偏好。最初，被人们用来辨别国家权力及其重要性的世界地图都是在对地理现实主观臆断的基础上绘制的。就像埃拉托色尼（Eratothenes）把希腊视为位于人类居住区中心的枢纽位置并与三大洲的

交汇点极为接近一样，麦金德也认为不列颠群岛是陆地半球的中心。两人都运用各自所知的地理“事实”来论证自己国家的“自然”优势地位。在20世纪初期，英国的地理学教科书同时运用制图学和几何学来论证英国的中心和全球权力地位。遍及欧洲的新版彩色政治地图册虽然强调了不同的帝国所有和显示了帝国斑斓的色彩，但其根本上而言仍赞同统一的世界观。它们完全以欧洲为中心，并描述了同样基本的中心——外围世界镜像色彩的拓扑变换[①]。

其中最激发人们情感的是英帝国的地图所显示的不列颠世界的镜像，它运用墨卡托（Mercator）投影方法并着以鲜明的粉红色，从而衬托出它在这个黯淡的灰色世界中不同的出类拔萃的巨大成功。将大不列颠视为“最强国”的认识被广为接受，甚至包括那些不必附和这一看法的人们，这种看法用赛拉（Sellar）和伊特曼（Yeatman）的不朽名句来表达就是“幸事”（A Good Thing）。从地缘政治的世界观来看，“是”完全不同于“应该是”。虽然英国对其盟友来说是世界仁慈的女主人，但对于其敌国而言则意味着套上了枷锁。在豪斯霍费尔看来，不列颠就好比一条利用其触角来控制世界的硕大章鱼（图9.3）。正是英国特殊的权力地位而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念遭到了德

① 十分有趣的是，迪尔克早在25年前就持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谓之为“另一种西方理论——未来的强国必定是‘大陆国家’。除了英国以外，德国或俄国将吞并整个亚洲和欧洲。”他称之为“来自中心的统治”，根据他的理论，其发生的必要前提是，位于所有支流源头的民族都将找到它们自己所控制的出口。即便铁路真的胜于河流，它仍旧需要借助港口通向海洋，对其控制的必要仍然取决于大陆中心国家创造者们的感受。上游国家必须处处控制下游国家，咸水暴政不复存在。

国“全球政策”的挑战。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家们只不过要用德国章鱼取代不列颠章鱼而已。同样，虽然19世纪初期的门罗主义旨在标榜美国在新世界中保护者的职责地位，但到了19世纪末，“新世界”一词就如迪尔克所言具有了“更多道德而较少物质的含义”。和“旧世界”不同的是，新世界已经不再只是某一半球的事务。这一镜像开始在描述美国中心地位的新地图中通过制图的方法表达出来，而且亨里克逊（Henrikson）所提到的美国“幸运岛”被描述成了由一条海洋带所包围。斯皮克曼认为，世界岛是破碎的，因而美国应该完全保留迪尔克的“世界中心理论”。在斯皮克曼的地图中，环绕幸运岛的世界岛大陆同样充满制图学意义上的危险，正如后来的冷战时期的心脏地带所具有的一样。

从中心主义角度来看，在以欧洲和美洲为中心的北部世界中，费尔格雷夫又加上了欧亚大陆的巨大权力和历史文明。因此他拓展了整个地缘政治的范围，从而把它整体视为构成了“定居和发达的北部地带”（图8.4）。历史上的文明和权力主要集中在北半球的温带地区，所有强国及主要附属国都位于其中。占据了20世纪绝大部分时期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所反映的事实是，尽管费尔格雷夫认为“发展”使之构成了一个整体，但从政治上而言，北部地带仍严重分裂。这种分裂发端于多极对抗，在其顶峰时则发展为两极对峙。

20世纪70年代，存在了1/4世纪的两极世界格局趋于瓦解，相关的地缘政治理论受到挑战。直至当时仍被冷

战所冻结的其它世界观念开始重现，其中最具影响的是中心——外围学说。而世界系统分析理论则是对中心学说最重要的理论突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理论在莫德尔斯基和沃勒斯坦的著作中反映得尤为突出。他们把世界看成为一个基本的中心——外围结构“体系”，设想了一种与冷战完全不同的全球结构。这一新的中心主义是最好被描述为“行星地球”思想的一部分，它源自于一种日渐明显的现实，即最为重要的现实问题是人类面临共同的难题，它对任何一国而言都过于繁重，对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而言都过于复杂，不可能成功应对。这些难题在很多方面与全体人类世界休戚相关，这样，在20世纪初期一度盛行的“自然的”和“有机的”概念悄然回归了。目前最有价值的研究是有关全球有限资源的快速消耗以及在可预见的将来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源有可能完全枯竭的问题。这进而涉及的问题在于，发达国家对资源的无节制利用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在欧洲帝国被亚非独立国家取代之后全球贫富两极分化的长久延续。

事实证明，这一时期的全球经济不平等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并形成了布劳戴尔所言的“地理不平等”。随着全球的相互融合，“最发达的国家依赖于最落后的国家，反之亦然：发展是滞后的对立面。”因此，全球的绝大部分，包括其人口的大多数都被贬为了一个体系的外围，而这一体系的目的就在于把全球财富的绝大部分汇集于中心。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一结构明显地被巩固为发展与滞后两极模式，全球人类被分为富有和贫穷。这种不平

衡的现实成为了地缘政治规范发生变化的缘由之一，即从意识形态对抗的世界分裂观转变成了财富差异的分裂观。彼得·泰勒认为沃勒斯坦理论方法的作用就在于把南北对抗置于“世界舞台的中心”从而取代了以前的东西对抗。

由于各国清醒地意识到了全球不平等是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因此，冷战对抗不仅被视为毫无必要，而且还因其推动军备竞赛而被看成是对有价值资源的恣意挥霍。科学研究进一步表明，矿物燃料等原材料的开发利用是破坏生态环境的重要原因。这就使得人们进而关注诸如“全球变暖”这一引人注目的难题，它涉及资源浪费和正在发生的无法弥补的环境破坏双重难题。

对冷战所固有的设想的怀疑又伴随着对其所形成的地缘政治世界特征的设想的质疑。而这些又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上，即互相对峙的持不同意识形态的两大权力中心间存在恒久的和不可改变的裂痕。二者在各方面的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要引用“世异”一词来对它们进行描述。“世异”这一术语过去主要是指那些远离西方核心区的地理区域，面现在则转面指主要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被视为拥有与世界表面的自然特征相一致的某种恒定性质的实际地理现象。即使科恩等人认识到了其危险性并对之产生了厌倦，也无法逃避这一点。虽然对更加动荡的国际局势产生了新的认识，但是，两个世界的幽灵依旧隐现于“地缘战略区域”和“集团”等概念中。

为了有效地应对一系列的新问题，冷战及冷战后思维就必须摆脱“两个世界”意识形态的束缚，这源于包含在

“行星地球”思想中关于有限的空间中相互依存的观点，以及摈弃关于分裂的行星“严重对峙”的冷战神话。而事实则显得越来越迥然不同。阿格纽（Agnew）指出，美国与苏联永不均等，美国是“二战后地缘政治世界秩序中唯一真正的超级大国”，而且，从科技方面来看，苏联的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两大集团间的总体实力和资源同样不均等。苏联集团的脆弱性被其庞大的军费开支和过度开发其所有资源以发展其军事工业复合体所掩盖。随着恐怖均衡的减弱，西方的优势愈加明显，这就日益标明只是存在一个单一的世界中心，而不是“激烈对峙”。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采取世界系统分析的方法。

系统可以定义为一系列相关的要素因某一目标而组合成的结构。系统分析方法包括对自然和社会系统的分析，旨在从宏观的角度探究复合能动结构的运动过程。戴维·哈威（David Harvey）在《地理学释论》一书中把系统分析方法断定为“研究地理问题的实用微积分”。到了20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系统分析方法运用到了国际政治领域。其最重要的先行者是哈罗德和玛格丽特·斯普劳特夫妇，他们分析了国际政治中他们称之为“环境”的重要性，主张把经济、政治、国际和地理等诸因素结合起来，从而在国际关系中采取一种更全面的分析方法。这一方法集中表现为“生态三维”方法，它建立在源于“机遇”（可能性）和“意志”（能力）的人——境关系基础上。基于体系相互依赖的原则，这一点立足于生态学观

点，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构成了统一的有机整体。

既然系统分析方法广泛运用于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领域，那么，本章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评价其在目前的中心——外围学说发展中的重要性。世界系统分析法的基本观点是，把世界系统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系统从16世纪欧洲人开发新大陆开始形成，随之出现了经济和政治的大扩张。而扩张又导致了欧洲“全球经济”的产生，并从此统治了所有其它“世界经济”，逐步将它们或其中一部分纳入其延展的范围之中。新格局最根本的空间特征就在于其基于一种中心——外围结构。布劳戴尔论证了16世纪时欧洲各国之间的冲突是如何扩大的，以及北大西洋是如何成为全球霸权争夺中心的。他断言，“大西洋”已成为“全球引力的中心”。由此，这一特殊区域的权力确立为全球霸权，逐步发展为世界商业、工业、帝国权力的核心，并最终成为全球化进程本身的核心。

莫德尔斯基和沃勒斯坦都热衷于世界系统分析方法，布劳戴尔世界观点的历史透视也是基于系统方法，但是它们各自所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

莫德尔斯基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进行整体的研究，并因此“找到了混乱无序的国际政治中有规律的东西”。在他看来，存在一个独立于其它系统之外的全球政治体系。它不断变化，并显示出其本身是“一种不断循环的模式”。自16世纪全球系统建立以来，它就呈现出连续的“长期循环”（long cycles）的形式，这就使得人们能够谈论世界权力而不仅仅只是早期从地理学上而言的有限权力。这种

循环主要通过作为“全球系统中最重要的实体”的一系列国家表现出来，它们充当了整个系统内部发生变化的动力，莫德尔斯基把这些实体称作“世界力量”中心，并且他认为建立世界秩序的冲动源于对权力的内在欲望，由于全球联系的形成源于海洋的开发和海权的滋生，因此主要的世界力量都是海上强国。同时，他还区分了全球力量和真正的世界力量之间的差别，前者在欧洲之外具有广泛的海上联系，而后者则在特定的时期内获得了体系内部的统治地位（图 9：1）。在莫德尔斯基看来，这类力量有四个：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西班牙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力量；法国由于受到英国的阻止而一直未能发展为一个世界角色，最终只能在北非和西非地区确立有限的区域优势地位①。事实在于，尽管法国拥有丰富的资源，但它却无法攫取全球优势，这部分在于其区域和全球优势的不稳定性，因此，法国只是被视为一个“颤巍巍行进”的全球力量。世界力量的兴衰取决于体系内部贸易、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结构的变化。莫德尔斯基论证指出，鉴于“每个已知系统的秩序在不断丧失”，因而，结构必然会失去功效并必须进行重建，而这种重建呈现循环变化的形式。他坚持认为，“全球力量的精髓……就在于有机网络控制”。当某一特定周期的世界秩序被中断后，必然会随之出现一段

① 世界力量和全球力量之间的差别基础显而易见。作为一支世界力量，它必须至少拥有全部战舰的 50%，通向海洋的能力或同等的海军开支。一支全球力量则只需拥有这些能力 5%的最低限度。

时期的无序和冲突，并最终确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力量。"长期循环"是与一个特定力量的统治地位相联系的时期，通常，每次循环持续约一个世纪，之后，统治地位逐渐丧失，一个新的循环开始。为了证明这种联系阶段，莫德尔斯基推断，"一个世纪大约是三代人的时间，如果我们在每次循环中寻找《巴登布鲁克斯》(Buddenbrooks，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恩的名作。——译者)中所描绘的共性特征，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一代人建立，下一代人巩固，第三代人则失去"。

当莫德尔斯基强调政治因素尤其是国家是世界系统内部的根本驱动力时，沃勒斯坦则转而强调经济因素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作用，国家被视为一种结果而不是起因，只有"世界经济"才是世界秩序的本质特征，它适用于任何时期的循环变化。这里所定义的"世界经济"是指能够满足自身绝大部分需求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自治区域。它由每个具有自身独特经济的不同区域构成，成为超越政治界限的实体。它同样是一个核心——外围结构，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控制全局。核心—外围分析方法旨在解释其内部的不均衡因素和"多极形成的吸引力"。沃勒斯坦把欧洲世界经济看作是帝国主义的母体。他在使用"霸权"这一术语来描述在任何特定时期都居于中心地位的力量时，认为这种地位主要基于经济优势。"霸权的渴望"与接连不断的经济浪潮密切相关。在沃勒斯坦看来，第一世界力量应是荷兰而不是葡萄牙，真正的世界经济直到20世纪才形成。他认为荷兰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

"霸权循环"与"世界经济三次有规律的浪潮"联系在一起。他的"世界系统模式"是对马克思世界观的变异，他并不认为帝国主义是有序过程的一个阶段，并断言，"秩序并不是系统的最终结果"，同马克思一样，他认为必须摆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其用以实现的方法却与马克思的设想截然不同。

在沃勒斯坦观点的基础上，泰勒断言，"在世界系统分析方法中，地缘政治学是关于帝国主义（现实的北方压倒南方）在核心地区争夺边缘地带统治权的对抗的理论（直至最近的东方对抗西方）"。他把"世界系统模式"设想为"趋于一种后马克思主义激进进步世界观的'巨大传统'之中的我们当代世界的一段历史。这是对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麦金德思想的全面挑战。"同时，这也是对存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却又无法解决不平等问题和历史倒退的"进步神话"——或"进步组织神话"的挑战。在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缺陷时，他尤其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力量这一观点提出了怀疑。最终，他又认为这是一种远离麦金德持续影响的一种方式。"几乎所有地缘政治学论述的起点都是源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这一理论或许仍旧是全球最为著名的地理学模式。"正是由于心脏地带理论的全球视野而使之"经久不衰"，因此，泰勒声称，"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理论则给政治地理学者们提供了回归分析论证全球视点的机会而无需顾忌麦金德理论的权威性"。麦金德强调了东西方矛盾冲突，而沃勒斯坦则认为"南北对抗是世界舞台的中心"。泰勒强调，

“空间环境的改变是社会理论得以运用的直接结果：沃勒斯坦的观点深深扎根于全球形势的经济基础，而麦金德式的理论仅仅考虑政治上层建筑的运作方式。”所以，世界经济理论更易于解释后麦金德地缘政治世界观所持有的后马克思主义激进进步世界观。不难看出，地缘政治理论与世界经济理论密切相联，世界秩序可被看成是“标明世界政治不同时期的相对稳定的结构”。

布劳戴尔在其巨著《文明与帝国主义》中对沃勒斯坦过于强调经济因素提出了异议，他在看待沃勒斯坦的观点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时，援引了罗斯陶（Rostow）的疑问：“社会中的人与经济完全统一吗?”，并运用了罗斯陶的回答“当然不是”。布劳戴尔认为，沃勒斯坦在其解释结构方面过于僵化，并批评“其观察现实世界的模式只侧重于经济秩序”。布劳戴尔转而对循环理论产生了新的兴趣，他称之为“Kondratieff 循环”，他认为众多不同的循环总是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发生[①]。其中最长久、最重要的是“现实趋势”，他命名为“长期过程”，这是一个持续阶段，它包括繁荣阶段、危机阶段和衰落阶段（图 9：4）。在每一“长期过程”阶段都会出现一个在世界经济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自 13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这一主导角色分别由威尼斯、荷兰、英国和美国扮演。其间许多其它的国家也在不同时期充当了主要角色。这种

① “Kondratieff 循环”是俄国经济学家在 20 世纪对长期贸易波动的研究作出重大贡献以后而命名的。随后，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布劳戴尔认为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运动影响着社会，而这些运动的结合或联合又为变化的本质提供了更为真实的阐释。

长期循环所发生的阶段在经济领域，布劳戴尔认为这是"最可能的变化表象……正是由于世界经济才构成了恒定的动脉网，从而将血液输送到各个组成器官，它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结构。"在布劳戴尔看来，"资本主义轴心"的欧洲经济在于"占据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并由中心向外"伸出触角"。北大西洋区域已经"征服了世界经济"，并自16世纪以来就成为了世界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因素的复合交汇处，这就使该地区能够维持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

虽然世界经济理论源自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世界系统分析方法，但这一理论及其所涉及的所有地缘政治思想更像是冷战前后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在心脏地带论文中得到最充分论述的战后初期政治地理学家们头脑中的大陆镜像遭到了强有力的质疑，心脏地带被赋予的巨大潜力并未出现，而对苏联权力的恐惧也日渐化为乌有。1990年苏联的崩溃证实了这一点，同时也证明了大陆思想的谬误。认为海洋世界是围绕其强大的力量基于心脏地带巨大潜力的苏维埃中心的一个脆弱而又分散的边缘地带的冷战意象，让位于认为西方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并以美国为其现实霸权的意象。整个世界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心——外围学说比两极和多极世界观更适于描述和解释"新的世界秩序"。

世界经济力量的倡导者们提出了极为不同的模式来对其功能进行描述，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却具有很多相同的特征。其中之一就在于认为存在一个具有内在统一并

能够合理分析和解释的世界系统。它呈现出明显的空间结构，由核心、中间部分和边缘构成。核心部分无法从某一方面的特征例如政治或军事特征来加以阐释，它具有共同构成多面性和复杂性整体的众多属性。在这一整体结构中，“世界文明与世界经济……相辅相成”。北大西洋是世界体系及其所控制地区的重心。在每一次生长、占据支配地位和衰落的循环过程中都产生了一系列强权国家。与循环变化相联的冲突就是迪尔克所言的“争夺中心地位的角逐”。

那么，世界经济理论果真驳倒了过去“盲目的”政治地理学家们？问题在于，世界系统分析方法是否能滋生一种比其它任何世界观都更与长期结构中地缘政治现实相符的世界观。在20世纪90年代，这作为长期试图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解释人类世界本质的最后阶段而显得极为突出。然而，其在冷战后的盛行或许与政治改革的看法及其似乎对苏联的解体提出了最具说服力的解释这一事实有关。正如奥维尔（Orwell）“动物农场”里的情形一样，众多的腿显得“令人满意”，但是，是否也意味着“南北对立令人满意，而东西对抗极为糟糕呢?”无论如何，要证明这一点似乎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任何人都要当心臆断太多，并以这种臆断作为世界观的基础，它往往被设计得和解释一样合乎情理。

第十章

与现实一致
——作为过程的地缘政治学

罗伯特·沃尔特斯（Robert Walters）认为："地缘政治学能够提供一张与现实更相符的世界地图"。这样的"现实"与由于政治、战略和意识形态偏好介入对世界的理解而形成的被曲解的地图相比截然不同。这种对比的结果是一个充满了不安、恐惧和忧虑的类似卡夫卡头脑中的图景。它的全部效果就是以神话代替现实，然后将二者混淆。他认为中心地带是最有影响的此类地缘政治神活之一。在这个"极其险恶的"世界图景中，"位于心脏地带的以克里姆林宫为缩影的沉默的城堡强烈地隐现在幽暗的心灵深处。无疑，卡夫卡的作品似乎反映了冷战的景象。"同时，乔治·鲍尔（George Ball）表达的观点认为，美国是通过"一张类似于中世纪绘图者绘制的图形"来导航的。而亨利克逊则注意到美国领导人

在绘制他们头脑中的世界地图时也有“在波希米亚海岸草绘”的倾向。可见，沃尔特斯、亨利克逊和鲍尔所言的当时的地缘政治世界观更多地是由神话而非现实构成，在这一方面，它们比中世纪的世界地图（Mappa Mundi）好不了多少。二者的根本目的都是通过给他们提供一定的地理范围从而使信仰系统合法化并因此提供一幅能够以信仰导航的航图。这一分析是由布劳特作出的，他建议绘制“另一本自 1492 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地图集”。他声称，这一有待发展的理论“阐述了一种不同的地理学”，并且也“重新绘制了我们的世界地图”。基于此种观点所提出的“皮特斯计划”正合布劳特的心意。

使用地图来维持和倡导各种各样的信仰有如此悠久的历史以致于可以合理地设想是否有可能从绘图学意义上表达某种抽象的“现实”。一个人怎样才能确保任何特殊的地缘政治学都不具有亨利克逊所言的某种形式的扭曲呢？尽管沃尔特斯标明有可能绘制一幅“更符合现实”的地图，因为“任何涉及地缘政治学的系统思想都不能独立于社会之外而存在…但是，他继而又对此产生了怀疑，终究它是属于信仰的范畴”。因此，他进一步指出，他对于就其自身而言“符合现实”的地缘政治学并无兴趣，更倾向于它是现实目标的有效工具。他所倡导的“新投影”就是“趋于形成政策的工具”。可见，它根本就不是沃尔特斯头脑中的一幅更真实的世界地图，而只不过是另一幅中世纪的世界地图，其作为新信仰的指南更为有效而已。这一目标与根据现实观察事物迥然不同。

地缘政治学的历史零乱地堆砌着一些阻碍其按本来面目看待事物的东西。一个主要的障碍是很多从事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人本身也是他们那个时代政治架构的积极参与者。现代地缘政治世界观的创立者马汉和麦金德也并未生活在某种政治真空之中。马汉是积极从事促进美国海权的海军上将，而麦金德是一名议员和关注英帝国安全的外交家。他们所关心的是他们各自国家的最高利益。

对任何观点或理论可信度的唯一有效的检验就是它符合已观察到的现实的程度。主要世界观中的每一个都要在整个地缘政治框架中受到审查，以事实为根据得出关于其合符逻辑的结论。因此，两极世界观的拥护者们将两极冲突看成是不断重复的地缘政治主题。舞台、道具和演员可能会变更，但最终结果都是两个强大对手的激烈对峙。正如所见，希腊——罗马世界和波斯帝国的长期冲突在 20 世纪下半叶以各种变形予以重现，它表现为超级大国间的冲突。冷战期间其倡导者们进而认为这表明了其全球形式的“根本”转变。同样，那些主张多极世界观的人最终看到了 19 世纪的“均势”在基本的现实中延展为全球规模。其中无论哪一个被视为代表“现实”，都伴随有地缘政治形式上从简单向复杂转变的变化趋势。当所有国家的整体合理结构崩溃以后，它们便被更小国家的增生所代替。这样，伴随着基督教世界整个结构的终结，欧洲成为几个重要的力量极最终自我解体后形成的更小国家的集合体。其中一个大国（法国）试图获得支配地位最终导致了它们之间不稳定的均势的崩溃。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明显地表现

为两极世界结构，但是到 19 世纪末，它再次被在一个不稳定权力均衡中存在的大国的增多和每个大国都积极建立自身的帝国势力范围所取代。可见，对基本上是同一组数据的研究及解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论。观察的地点和时间似乎是作出结论和对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进行解释的主要因素。

关于世界观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运作的范围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样发生在任何特殊地区的事态不必与发生在全球规模的事态相联系。在最近一段时期，这个问题已通过系统分析方法被提了出来。这一分析认为世界体系源于西方核心区[①]（西方核心区，指的是欧洲和地中海地区；东方核心区主要指中国和远东；南方核心区则指南亚。——译者）。世界系统方法的支持者断言，16 世纪起源于北大西洋地区的世界经济扩展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范围的世界经济。它最终导致世界中心地位的巩固，并因面组织和控制了世界的其余部分。因此，它将其他世界经济削弱至边缘地位并第一次产生了沿着中心——外围线形成的世界。

起源于特定地点和时间背景下的世界观可能具有一系列使它区别于其他世界观的特征。沃尔特斯称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全球展望……从根本上而言它不同于其它观点”。这就是“世界地图 Mappa Mundi 地缘政治学”，它有

① 20 世纪 80 年代，由汉堡的阿诺·皮特斯首创的皮特斯投影被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联合国赈济署及其它世界组织接受为其偏好的制图意象和世界观。无疑，它是继默卡托投影之后在一般制图意象中最重要的进步。它聚焦于热带世界——“南方”——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受到帝国力量尤其是英帝国偏爱的聚焦于“北方”的默卡托投影一样。

两个截然不同的特征：试图简化复杂的现实，以及根据一系列特殊的观点来理解被简化了的现实的本质。因此，基于基本上相同的地缘政治标准产生了根本上不同的世界观。尽管地缘政治分析本质上而言具有不连续性，但它主要是依据特定时期的实际态势来作出受欢迎的地缘政治结论。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必然会相应地出现新的宏观地缘政治观，其被视为与新的现实更相符（例如见图10.1）。根据这些全球观点，人们尝试将区域的的发展融人较大的图景，并没有事物规律运行的最终情势，而只是存在一系列场景转换，每个场景都有它自己特殊的逻辑，都需要并已得到一个解释性的反应。这些反应采取了地缘政治范例转变的形式，力求解释和理解新的现实。实现更符合现实地看待事物这一目标任务，他们总是使之复杂化而非简单化。

最近的场景转换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因此，旧的公认的两极观被新的公认的系统分析方法所取代。尽管二者都声称作了超越地缘政治现实的解释，但它们的实际作用在于对已发生的事情作出解释，并为产生的各种变化提供理论依据。现在，社会科学家们已提出了一种世界系统理论，并赋予了该理论一个空间内涵和地缘政治的标示。因此，它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新的世界地图。

除了因简化和进行解释引发的问题外，还存在着由于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一些特殊观点的介人所引起的另一种问题。因而，斯特劳斯—休普试图将“实际上”和“可能是”的矛盾对立与合符可行的目标协调起来。沃勒

斯坦在“科学家——学者”和“辩护者——支持者”之间作了类似的区分。而正是在两者之间进行区分的问题已经形成了旨在证明并进而倡导的地缘政治学。正是基于世界地图的本质，它更多地是为了维持信仰而不是寻求客观真理。也正是后者而非前者在应该作出牺牲时做到了这一点。这激发了麦金德绘制一幅巨大图画的冲动，他认为有必要借此向他的国内同胞就他们当前所处的危险境地传达一个摄人心魄的警告。显然，他希望这能使他们从其对19世纪英国力量的洋洋自得中醒悟过来。著名的三段论的最后一行——“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主宰了全世界”——能同时被看作是一个决定性的预言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避免的最糟境况的全部描述。25年以后，豪斯霍费尔继承了麦金德的世界观，他以心脏地带理论为基础，构筑了一幅德国所控制的世界蓝图。豪斯霍费尔这位地缘政治魔术师幻想构建一个并不存在的全球框架，而麦金德则描绘了一个他认为极为真实却又要不惜一切代价设法避免的世界景象。

构成世界观的主张，不管它们被想像成计划、秩序、生物组织、结构还是体系，每一个都曾表现为关于地缘政治世界本质的某种基本真理。因此，尽管两极主张承认其它情形的存在，但是，最终的地缘政治解决方案却被归于“激烈对峙”。同样，三极主张的支持者们则认为世界最终被分成了“大区域”。

尽管必须承认每一个主要的世界观都包含它自身的一套真理，但总的看来，其真理性在特定的时期内比在某它

情形下表现得更为明显。就好像世界观不是被讲出来的而是自己走下书架的，按尺寸、形状和款式要求对号入座。因此，有时世界看起来似乎的确被分割成两部分，而其余的时候因场景的转换使事情看起来截然不同。在冷战高潮时期，史蒂芬·琼斯认为，主要的全球观中无一是完善的，所以，“我们需要一套过滤器，一组混合物或一个折衷的全球观”。

琼斯所倡导的超越这些表面的不和谐而实现某些折衷的主张，旨在将每一种现念构想成处在一个展现的地缘政治过程的可能阶段，而不是对其自身的绝对解释。这一方法是探求现象变化的发展观中固有的，其中某种混合物可能进而导致建立一个更全面的世界观。此类综合发展的方法问题就是它们其中之一——如果存在的话——将要形成其终极产品。而承认这个终极产品就会冒一定的风险，即必须进一步将之纳入是对地缘政治现象的最终解释这一范畴。既然此类主张都自成一体，那么，它们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在平等基础上进行调和。然而，这并非就承认，世界观相互排斥以致于它们必然总是处于不可调和状态。困难在于，如何将它们粘合在一起组合成为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探求现象变化的混合体，使它所包含的内容胜于各部分相加之和。那么，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是否可能存在呢？

目前的知识氛围中，全球问题已凸现出来，在致力于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全球范围被视为根本，这就使得建构一门地缘政治学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它与特殊国家的利益并不是密不可分，而是直接将全球利益看成是一个整

体。因此，全球地缘政治学就基于全球范围而融入更宽泛的思维之中了，源于这一点，产生某种广泛而包罗万象的的地缘政治学就是可能的，而过去的地缘政治学则显得有限和排他，即便是在谈论全球问题时也是如此。然而，设想因时空导致的偏见能够完全被消除就如同过去设想这样的偏见并不存在或它们甚至只存在于对手头脑中一样荒唐。

源于争论的世界观自身的一般理论所作出的选择是一个基于对地缘政治世界本质进行重新评估的理论。所使用的方法论也应寻求将“可能是”修改为“是”，从而抵消过去那种对概念和理论的形成有如此强烈歪曲作用的时代精神。总体目标在于构建一个“更符合”（沃尔特斯）或“更适应”（科恩）现实的地缘政治学，而不必冠以必须适用于“政策形成”的限制条件。对这一现实领悟的任何实际应用都存在于政策领域而非学术领域。

可见，共同构成世界地缘政治外表的政治单元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规模呈现出来。它们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极大到极小，从岛屿到内陆，从同质到异化，从离心到向心。而它们真正共有的一个特征就是其领土。它们都存在于——或已经存在于空间中，其共同的缘由在于它们表现出对世界表而某种秩序形式的渴望。为了实现这一渴望，它们常常临时聚合在一起，以期在特定的区域内确立有限的秩序形式。它们构成了世界的建筑群，任何规模高于它们自身的秩序形式的出现都必须得到它们集体的认同。

国家行为似乎像国家本身一样丰富多彩，但是根据行为模式的不同可将它们分成两大类：冲突的和联合的。这的确是一个精彩的划分，它将国家进行了分类，并最终确定了作为整体的地缘政治世界的特征。根本上而言，它是将国家分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这比任何既以存在的其它分类都更重要。国家要么通过相互间的武力冲突来解决它们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中彼此存在的固有问题，要么通过合作手段来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尽管国家都已卷人了这两种行为，但对于特定的国家而言，仍然存在某种恒定的行为习性，有的热衷于冲突，其它的则倾向于合作。

行为的冲突模式是试图通过控制（霸权，支配）来解决问题的结果，这些行为所采取的形式是企图进行领土扩张或建立势力范围。另一方面，联合的行为模式是以不必付诸冲突而解决问题的渴望为基础的。因此，尽管一次冲突的最终解决是胜利者和失败者的零和游戏，但是，最终的联合行为却认同受益更为广泛的解决方法。两者都可在总体关系模式中找到，并且可能同时发生。由于它们彼此完全不同，只好将其作为平行的过程来进行地缘政治的解释。然而，就其影响来说，这两个过程则大相径庭。正是冲突过程对地缘政治世界的特征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世界政治地图很大程度上是冲突过程的产物。冲突是国家间关系的常态，合作则是结束冲突的尝试。因此，这里所言的两者是指标准地缘政治过程和替代地缘政治过程。

标准地缘政治过程的结局是一个国家统治其它的国家，它最终所滋生的国家类型被戈特曼喻为“亚历山大式

的国家”，被戈伯莱特说成是“广袤无垠的国家”，而豪斯霍费尔看作是“地缘壁垒（Raumüberwindende)”。这在拉策尔、森普尔、豪斯霍费尔、麦金德及其他人的思想中是恒久的主题，他们全都将其看作是这一过程的必不可少的修饰语。其反义词被视为地缘政治的贬低，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轻藐地称之为垃圾小国（Kleinstaatengerümpel)。论点在于，一个刚健的、充满活力的民族需要更多的空间，因此必须通过领土扩张来得到它，通过对它们所获得的资源空间的占有从而释放出它们的潜力。

在任何核心区内，标准过程的最终结局都是一国获得绝对的支配地位，于是这成了共同的状态。核心区内部对此种状态的反抗可能在外围地区最为强烈。这种反抗在海洋外围最有可能获得成功，因为支配国家在这一环境中力量相对薄弱而不能完全控制它。这种反抗在限制支配国家的范围和力量以及阻止它完全转变为一个影响全球的大国方面证明是成功的。因此，海洋外围将逐渐确立自己的力量结构，这些将包括海洋外围内部一个支配国家的出现，而最初这可能是一个联盟或小国家集团的中心，但也有可能是在它们当中获得显赫地位的单个国家。如若海洋外围国家能够获得的自然资源有限，那么，它想要挑战一个早先在核心区内部已具有全体影响力的国家力量，就将被迫转而向核心区外部寻找它所需要的资源。这招致了地缘政治价值观的彻底转变，其作用在于将外围转变为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实体的中心。于是，强大的海洋国家作为依赖其

自身实力而存在的这一地缘政治实体的中心而显出新的重要性。海洋外围展示了一种“空中桥梁”的能力，并且依靠它所获取的新的力量，逐步占据了更为广阔的优势地位。在力量最为强盛的条件下，海洋外围有能力在核心区外部形成国家，这里所拥有的资源，如果说不是多于，至少也是和已具有全体影响力的国家内部可获取的资源同样多。尽管其起源和政治特征殊异，但这样一个海洋帝国也能够产生与那些最早具有全体影响力的国家自身极其相似的地缘政治特性。两者的行为模式也可能在许多方面类似。除了核心区的领土外，海洋国家有可能寻求在其它区域内部建立自己的领地。因此，其自身核心区的关系远比最早获得全体影响力的国家间关系公正。除此之外，其领土的破碎性可能会促成它过早地瓦解或至少是内部的脆弱。那么，与最早具有全体影响力的国家相联系的向心结构可能会让位于离心结构，从而在其内部进行更广泛的权力分配。

因此，海洋外围的统治力量不可能像大陆力量那样获得绝对的支配地位。大片的地区可能会处在其领土控制范围之外。在这些属地之内，其权力所依赖的是建立一种势力范围而非领土控制。在这种情况下，霸权是一个比控制更合适的描述其地位的术语。最后，海上世界被证明在创造财富方面最富有成效，并且，霸权国家最终会由此拥有比支配国家更强大的力量。在处理与核心区本身的关系时，这个优势可能会同时被离心倾向和海上国家的相对脆弱性所抵消。想要阻止核心区内部权力地位的确立并非易

事，而这种权力一旦建立，就可能会对海洋国家自身的统治地位构成挑战；另一方面，核心区内大陆支配国家更有可能维持它的权力；它强有力的向心结构延缓了它最终的瓦解。

因此，总的地缘政治过程的第一阶段所表现出的主要特点是，一个大国企图取得在核心区的支配地位，第二阶段则表现为两个大国或大国集团之间的相互敌对（见图10.2)。其中一个国家从大陆内部获取力量而另一个大国主要从大陆外部获取力量。这就是两个具有优势地位的国家的态势，一个从古代到冷战时期就已阶段性地存在的态势。在第三阶段，处于支配地位的或霸权大国走向衰落，其中之一或它们全都趋于瓦解。此后，产生了众多的小国，它们所追求的是在它们之间确立一种均势，直至新的霸权企图的出现。这一企图可能是缘于一个前任大国的变形，如俄帝国变成苏联，根本上而言，苏联所追逐的目标与它的前任如出一辙。另外，这种企图也可能是由一个全新国家的出场所引起的，如普鲁士转变为德意志帝国，为了获得支配地位，它对现存的大国发起了挑战。

综上所述，构成标准地缘政治过程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存在一个以一定方式时常显现的过程。它周期性出现并呈现出诸多不同的形式。当达到最后阶段时，这一过程趋于终结。只有当具有全体影响力的国家崩溃时，它才会彻底重新开始。整个过程所持续的时间依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环境而不同。它必然包含布劳戴尔所说的衰落之后生长和成功的“巴登布鲁克斯”综合症。处于支配地位的大国

和霸权大国意欲阻止它们的衰亡和没落的企图成为该过程最后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巴登布鲁克斯地缘政治学"是源于芭芭拉·塔奇曼所言的"矮胖人的愚笨(humpty dumpty folly)"。她断言，这样就像还原一个打碎的蛋一样徒劳无功。该过程完成从一个循环到下一个循环所需的时间，从类似于布劳戴尔所使用的"长期过程"的含义这一角度来思考最恰当不过。该过程从一个单一的核心区规模开始，继而进行空间的扩展。尽管这一过程不会从其它核心区中消失，但它在西方核心区中表现得最为显著，正如我们所见，它具有一系列不同于其它核心区的地缘政治特性。它所涉足的"新世界"使领土扩张和过程延伸能够同时发生。而时空序列内部涵盖了对被描述和理解的现实完全不同见解的可能性。在拉策尔和森普尔看来对民族成就构成新的威胁的领土扩张，同样也会促进解决那些以往导致了追逐这种成就的问题的新思想的产生。

当大国本身最强盛时标准地缘政治过程最显而易见。当它越来越弱小时，标准地缘政治过程本身的运作也遭到了削弱。正是在这时，替代地缘政治过程才可能最为强劲。这与小国既要维护它们的独立同时又要建立一个整体秩序的企图密切相关。由于它们的领土面积和力量十分有限，对彼此都有益的整体合理秩序就最有可能通过联合而产生。这种合作结构的发展在国际社会的相互漠视时期最为显著。正是在这一时期，僵化最终为灵活所替代，并且，存在着可供选择的实施控制和统治的极大可能性。

替代地缘政治过程在近代西方核心区中最重要的例子

就是近代欧洲早期城邦国家间的联合。它们在中世纪帝国衰落和民族国家崛起的间隙产生。其中最突出的是以北海和波罗的海为中心的北欧城邦国家的汉萨同盟[①]。它在神圣罗马帝国衰落和强大的主权国家出现时期走向繁荣，特别是瑞典、波兰和普鲁士。和欧洲其它地区的类似联合一样，它在一个更广阔的区域内简化贸易和在其内部建立秩序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近代大国取代之前，类似的城邦国家结构一直是欧洲中心本身的特征。这一城邦国家体系以莱茵河地区为中心，它活跃的时期正值莱茵河已成为其周围居民的航道而非屏障的时代。主权国家的兴起与一个被证明成就显著的体系的衰落联系在一起。城邦国家的主要脆弱性在于它们不能防御新的主权国家的进攻，而主权国家能够将它们合并到其疆域之内，并利用其财富去实现自己更宏伟的目标。这些目标通常包括进一步的领土扩张，因此，这些城邦的财富实际上转而增强了那些取代它们的国家的力量。可见，它们本身也呈现出替代过程的某些特征，并将这些为已所用。

自1950年以来，西欧国家间关系更多地呈现出替代地缘政治过程的特征而不是标准地缘政治过程的特征。后者的运作因二战期间欧洲大陆强国的衰落而终。直到那时，它们的目标依旧是既要在西方核心区又要在全世界维持其统治和霸主地位。联合的原则已经扎根于欧洲共同体

---

① "汉萨"是古高地德语，意思是联盟。建立于14世纪的城邦汉萨主要由位于北海和波罗的海周围的商城组成，其名义上的总部是吕贝克（Lübeck），在这里，其议事机构举行会议。虽然它根本上只是个贸易组织，但也拥有自己的防卫力量。尽管"汉萨同盟"在英语中广为使用，但严格来讲，它是一个重复用语。

内部，这一点实际是对20世纪初涉及集体化和联合思想的主要继承。同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汉萨同盟和其它小国联合的继承。它的根本目标是要将权力从主权国家转移到一个超国家的实体中去。正如琼·莫内（Jean Monnet）所论证的那样，潜藏在这一点背后的基本论题是：如果国家按过去已经实施的方式去行动，那么，从这一点而言，其能力即使不是被彻底消除了也已被削弱了。基本的观点是，将权力从现存的中心剥离出来，既向上转移到超国家的层面又向下转移到次国家的层面。因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所附属的基本主张本质上而言是对“替代过程”的一种显示。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些更强大的主权国家，尤其是那些欧洲及世界上的早期强国，明显地对一体化进程持保留态度。换言之，对允许“替代地缘政治过程”发展下去持保留态度。很多集团甚至已经明确表明了要使总体过程以某种新的形式恢复活力的态度。在超级大国的世界中，欧洲超级大国的观点必然与此类思想相一致。超级大国的领土扩张与“共同体”观点的扩展是完全不同的，共同体的观点更多地是存在于其创始人的头脑中。这或许就是兼并和联合之间不同点的现代看法。

因此，以维护权力为基础的标准地缘政治过程总体上而言要胜过替代地缘政治过程。后者只是在前者遭到削弱时才兴盛起来。它只有在大国影响暂时收缩时才获得了机会，否则它只能幸存于那些已被证明大国势力相对难以触及的大山和海洋边缘地区。直到复兴的主权国家恢复力量

吞并的实力时，这一过程才能够延续下去。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始终维持对大核心的控制，因为从战略位置而言，这里与通讯网络密切相连，因而，必须具备必要的经济实力来确立控制。如果以昂赛尔提到的被征服的普鲁士为典型，那么，从地缘政治方面来看，西班牙的菲利浦二世和法兰西的路易十四夺取莱茵地区的初衷恰恰具有相同的目标。

每个时代的大国的目标都是旨在使标准过程优于替代过程。为此，它们本身为了便于达到其目标也常常利用替代地缘政治过程的基本原理。于是帝国被称为国家，领土扩张被说成是国家防御；强加的控制成为了高度文明的传播。显然，乔装成替代过程的标准过程成了当代大国维护和增强其实力地位企图的经常特征。

此处所勾勒的过程标明了秩序问题被提出的不同方式。或者是通过一个中心实施控制的方式，或者是借助多国达成妥协的方式。实现前者牵涉冲突而实现后者则需要合作。尽管标准过程总体上具有优越性，但它有时却并非如此。正是在这时才更有可能认清替代过程的存在；也才更有可能用非冲突的方法解决问题。

跋

纯理论与实际应用
——地缘政治学的未来

契伦去逝20年之后，埃德瓦多·舍麦埃留斯（Edvard Thermaenius）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契伦“已经创造了某种全新的和最原始的东西”，这就是“国家作为一个空间单位的真正科学”。皮特·梅达沃爵士（Sir Peter Medawar）将科学界定为可解释的艺术，他则把解决问题视为其主要功能。然而，在纯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数据的客观分析和分析结果的相应运用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正是那些试图利用地缘政治学，甚至还经常包括政治地理学来支持一项特殊议程的人们，常常混淆了这种根本差别。卡尔·豪斯霍费尔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写的《向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致歉》中，澄清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并承认他自己时常逾越它们之间的界限（见第3章）。在很大程度上，豪斯霍费尔被迫为在

别的地方也广为存在的事情承担了责任。关于这一点，沃尔什认为，并不是地缘政治学“运用”的普遍事实令人反感，而只不过是德国地缘政治学家们利用它服务于特殊目的如此而已。

如果争论认为地缘政治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地缘政治科学就必须是有关一个存在并受制于分析和解释的客观现实的研究，这与气象或行星运转之类的科学研究的客体在很大程度上一样。同时，正如瓦劳克斯所指出的那样，既然“并没有特殊的科学存在”，那么，就有可能对不断重复的模式进行概括和识别。

当然，这也就表明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地缘政治学的主观对象并不是一个自然存在的东西，而只不过是一个人类的创造物而已。作为地缘政治学的原材料和具有自身结构并组合创新的空间客体，实际上更像人类世界的其他结构，而与其得以建构的那些自然结构相距甚远。所以，主观对象处在人类和自然界的交汇处。法国的或然论者们论述了结构和体系中人类自由意志的问题，他们断言人类有能力从现存的各种选择中作出抉择。这一点与决定论者的观点完全相界，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唯一的方式，人类受制于遵循未来行为的特殊进程而创造自我的结构和体系。两种理论争论焦点在于，或许的确存在各种选择，但只有一种是成功的，这正如，迷宫中有很多通道，但只有一条路径能使自己摆脱困境。如果这一点能够得到承认的话，那么接着的问题是，在这些条件下究竟是什么确实取得了“成功”？什么是一个人视之为取得成功的特定结果？

十分明显，就一个人当今的理解而言，19 世纪初从事地缘政治研究的人们所设想的那种成功还远未实现。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地缘政治学复苏之后，度量成功的标尺已大为不同了。鉴于 20 世纪即将终结的时候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难题，研究的方法已经变成了直接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单独涉及某个国家的一种整体方法。当行星的范围显得愈加广泛后，国家则被视为越来越无关紧要。邦奇写道：行星“对于战争而言太小”，但是“对于和平而言则足够大了”，他谓之为“天堂般的行星”伸手可及，可是，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使我们的行星保持人性”。邦奇所言的“人类空间”——而不是国家空间——当今越来越被看成了行动的根本区域。因此，未来的地缘政治学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成功地从国家的范围转变成全球的范围。当人们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讨论地理学与国际关系之间的联系时，这一点正是热门的话题。

显而易见，地缘政治学有史以来在不同的人而言包含了诸多不同的含义。20 世纪 90 年代，批评的地缘政治学在对这一事实的认识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批评的地缘政治学所研究的主要内容不得不面对何为地缘政治学的现实，并同时揭示这一方法所固有的各种可能性。奥特瓦赛尔（O’ Tuathail）认为地缘政治学“没有一个单一的，包容一切的含义或特征”，它“并不是一个具有内在含义的术语，而只是一个极为爱昧和不确定的概念”。他对地缘政治学在冷战时期被美国人用来为其自身的地位进行辩护

的方式进行了批评。在福卡尔特之后，我们可以读到作为一种纵览全景的形式、一种制度化战略视点的地缘政治学的知识产品，以此从中心视角来审视、规范和评判一个国家。由此看来，奥特瓦赛尔认为，地缘政治学实际就是“对王子的忠告”，就好比麦金德所例举的在凡尔赛政客们耳边低语的快乐的天使。他断言，这是一个错误地存在于缺少谋士和王子而崇尚学术和学科时代的陈旧的中世纪的概念。

关于地缘政治世界的这一观点实际上就是一个有关“标准地缘政治学过程”运作的观点。而另一方面，“替代地缘政治学过程”确立的前提则是它不必依此方式（第10章）。“总体过程”就其本身而言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事实是批评的地缘政治学固有的一个价值评价。正是与一种“现实政治”（Realpolitik）相对的理想政治（Idealpolitik）具有它所缺乏的那些特征。然而，正如我们所见，“替代过程”并不是这类“理想政治”的一种形式，因为它实际上伴随着“标准过程”而存在，在特定的时期这一点尤为明显。所以，“替代过程”不是一个争论为可能或将要存在的理想，而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现实，但是，它又具有与“大国角逐”和“战争角逐”截然不同的内涵。当麦金德自己在对各种选择进行考证时，他强调了重视“现实”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他还倡导要从已经成为世界决定力量的地缘政治现实中“解放”出来。

批评的地缘政治学也内含这样的认识，即当具有多重意义时，就存在一种共同的看法。或许，“全球政治中的

地缘政治学被理解为是长期地理学研究的结果”，但是，还是存在一种对它们全都适用的方法，而不只是适合于宏观战略家和角逐参与者。批评的地缘政治学“开启了而不是关闭了”地缘政治学的反思和重建工作。

当批评的地缘政治学分析和拆解地缘政治学的特定含义之一时，替代的地缘政治学则追求对存在和已经存在的各种选择进行考证。这种替代地缘政治设想本来就存在于戈伯莱特将地缘政治学从炼金术转变为实验的思想中，他心目中的建构这种实验地缘政治的可能性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家联盟”的氛围中显得极有前途，但是，当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的“徽光”日益浓烈时，这些又被标准地缘政治学的回归所遮掩。随着冷战的终结，替代地缘政治学的可能性再次显现出来，至少暂时如此。

正如奥特瓦赛尔所言，地缘政治学的不同含义并不意味着本体论的差异。其创造者所界定的原始含义，既符合学科的科学性，也与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设想相一致。就此而言，现代地缘政治学已复归为最初的准则。契伦确认了分析国家行为时领土的极端重要性。希达威（Sidaway）则认为现实具有“过于机动”和反映（特别）快速的特征——这一点正在降低——或很大程度上至少是在重新定位——领土的重要性。领土重要性的重新定位在千年临近之时或许是目前地缘政治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在信息空间和全球化的时代，森普尔所言的“稳固的地球”在为人类提供必要的涉及点方面仍然具有核心作用。

译后记

本书的翻译是译者与原作者杰弗里·帕克博士1999年的合作约定，后成为双方2000——2001年度“中欧高教合作项目”的相关部分。这也是译者第二次专门从事英文著作的翻译工作。

在着手翻译之前，不少朋友或同事都极力劝阻，认为翻译工作在当今学界吃力不讨好，捞不到实惠，特别是在有关学术职能部门视译著为零的管理框架下。然而，我自有价值标准，不为世俗偏见所束缚，一如既往地追随自己的学术爱好。一方面，作为长期从事地缘政治学研究的学者，必须认真研读用英语写作的国外同行的权威之作；另一方面，在国内读者涉猎外文文献有限的情况下，我以为有义务向国际政治学/地理学/军事战略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和青年学生介绍新近的研究成果。

正是在这些因素的驱动下，我投入了该书的

翻译工作。其间虽因繁忙的学术活动而几经中断，但最终于2001年底完成了。该书虽称不上巨著，却也可谓地缘政治学领域的里程之作。翻译虽已完成，其中的酸甜苦辣仍余味无穷。

首先，翻译是一项十分严谨的学术工作，它是任何一个以中文工作的研究者不可回避的极其重要的方面，仅仅有良好的语言功底其实根本不够，它与一个学者自己的创作又有很大的差别。如若创作，你是将你自己的全部知识积淀释放和展示出来，但翻译往往不是你本身的思维模式所能操纵的，你必须深入到原作者的创作氛围中去，揣摩他的思维构架。尽管要作到这一点证明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我仍然尝试了一些方法。一是逐章多次研读该书，在未弄懂之前，决不着手翻译，这是基本功；二是借助与作者良好的私人关系和便利的现代通讯手段，就其中的某些疑问进行探讨，这对本书的完成至关重要；再就是与我的朋友们共同商谈。

其次，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完成该书的翻译工作的，它需要很多人的帮助。由于书中还涉及法语、德语、希腊语、拉丁语、葡萄牙语、瑞典语等语种，除了求请作者解答外，陈梅帮助查阅了部分法文和德文的词义解释。同时我在为研究生开设《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课程时，还和本专业的研究生们共同研讨了有关问题，并让他们尝试了有关章节的翻译，他们是：王婷、郭忆薇、郭燕、陈梅、高农、李江红。无论如何，我要感谢他们给我的启发和推动。译者于2001年4月——2002年4月在以

色列巴伊兰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利用闲暇之余完成了全书的最后翻译工作，那里优良的馆藏设备使我得以对上述语种进行重新核对，并能够集中精力在完成研究的同时，致力于翻译工作，因此，在以色列的半年时间里，我几乎未曾享受闲暇之娱。在此，我要感谢沐涛博士、李洪亮博士和张爱东博士在计算机和软件技术方面所提供的具体帮助。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完成最后的相关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的很多观点只是一家之言，他必然和历史上的地缘政治学者们一样，既怀有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又具有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某些偏见，地缘政治学者固有的困境无法摆脱。因此，作为中国的研究者和读者，我们完全应有自己的批评角度。

另外，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文定有许多不妥和误解之处，读者如要引用其中的观点，务请参照原著原文。

我还要特别感谢新华出版社的王国荣先生在本译著的版权、出版发行等方面所提供的帮助和大量细致的工作。

最后，我要将该书献给我的父母、岳父母、妻子朱静和女儿刘津剑，他们为我的学术研究做出了许多牺牲和奉献，并给了我工作的良好心境和巨大动力。

刘从德
于巴伊兰大学
2002年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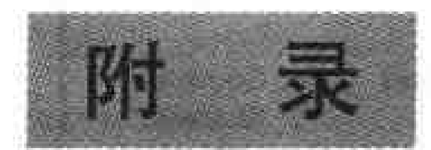


表 3.1:The industrial strength of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in 1900 and 1914

	Great Britain		France		Germany	
	1900	1914	1900	1914	1900	1914
Population (millions)	37.4	40.8	38.5	39.1	56.4	64.9
Coal	228.8	270	33.4	27.5	109.3	161.4
Iron ore	14.2	15.1	5.4	11.3	12.8	20.9
Pig iron	9.1	9.1	2.7	2.7	7.5	12.4
Steel	5.0	8.0	1.6	2.8	6.5	13.8

Source: B.R. Mitchell, 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75.

Note: All production figures in millions of ton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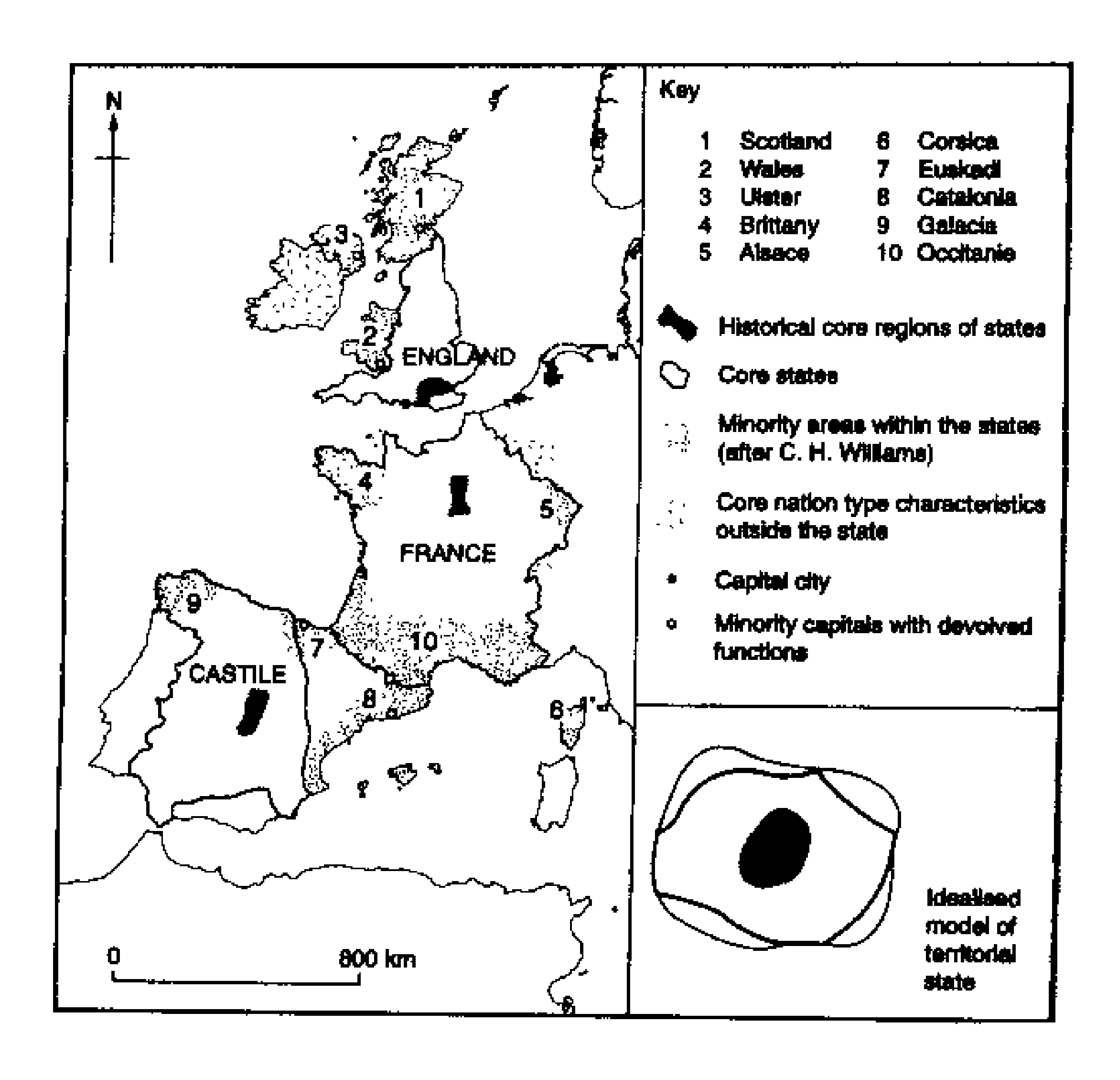


图 5.1　nations, states and nation – states: France, Spai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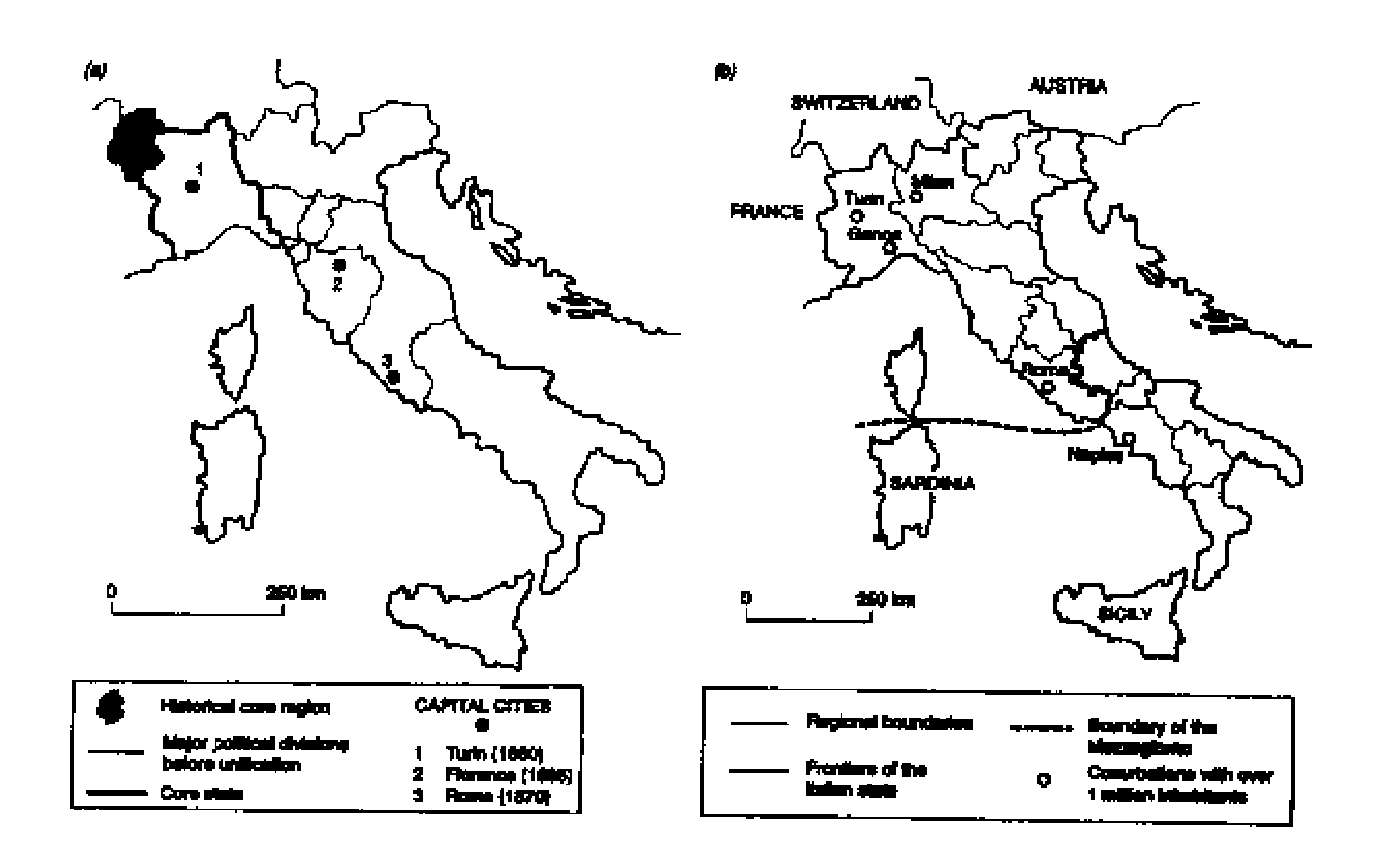


图 5.2 (a)The unification of Italy (b)Elements in the geopolitical structure of Italy



图 5.3 Serbia, Yugoslavia and the Balkans

Source: Kolarz, W. (1946) Myths and Realities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Lindsay Drummo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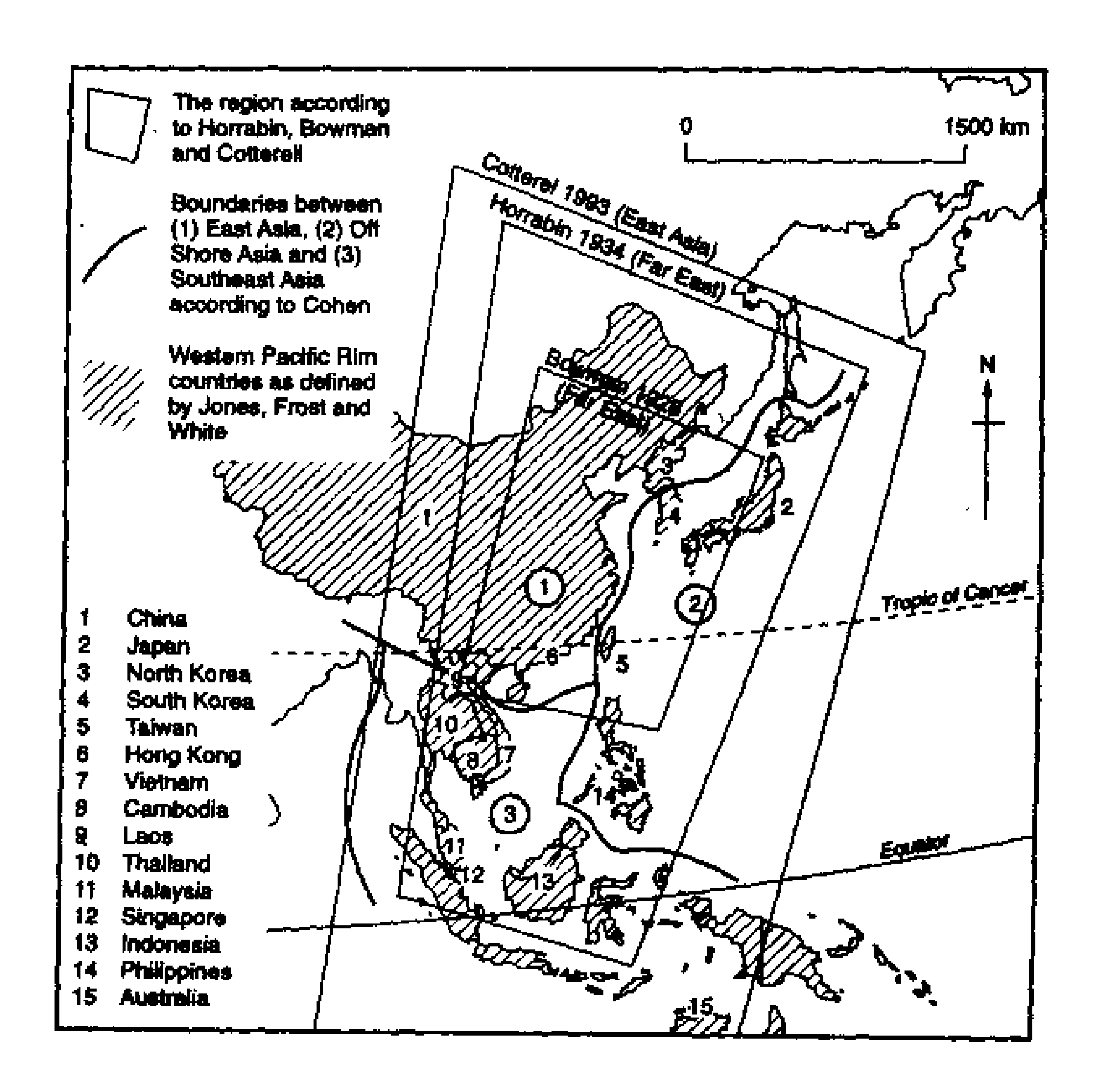


图 6.1 East Asia as a world region (map projection based on satellite data). The three regions which appeared as regular quadrilaterals in the originals appear as irregular quadrilaterals when transposed to this proj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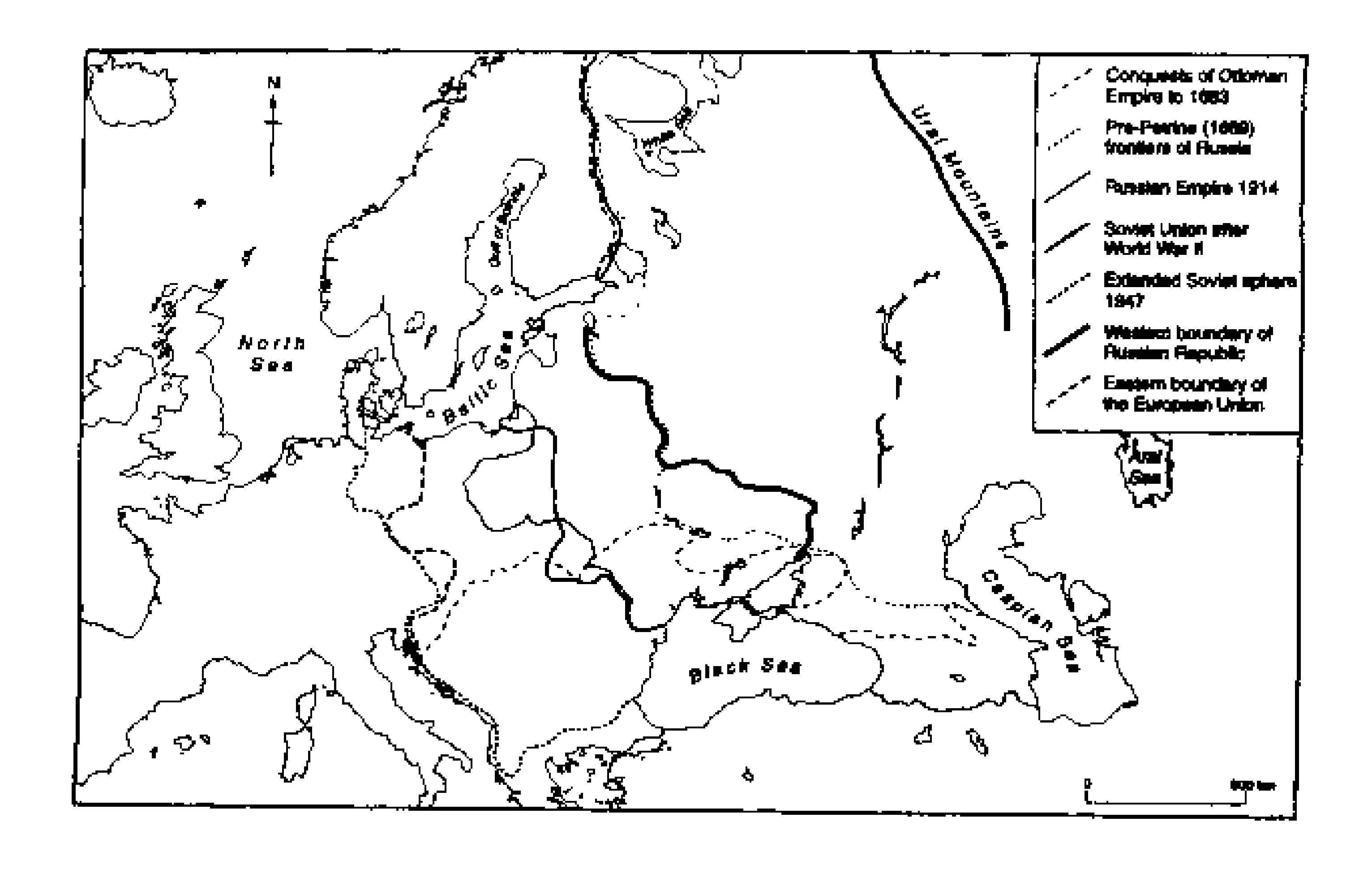


图 6.2 The eastern boundaries of Euro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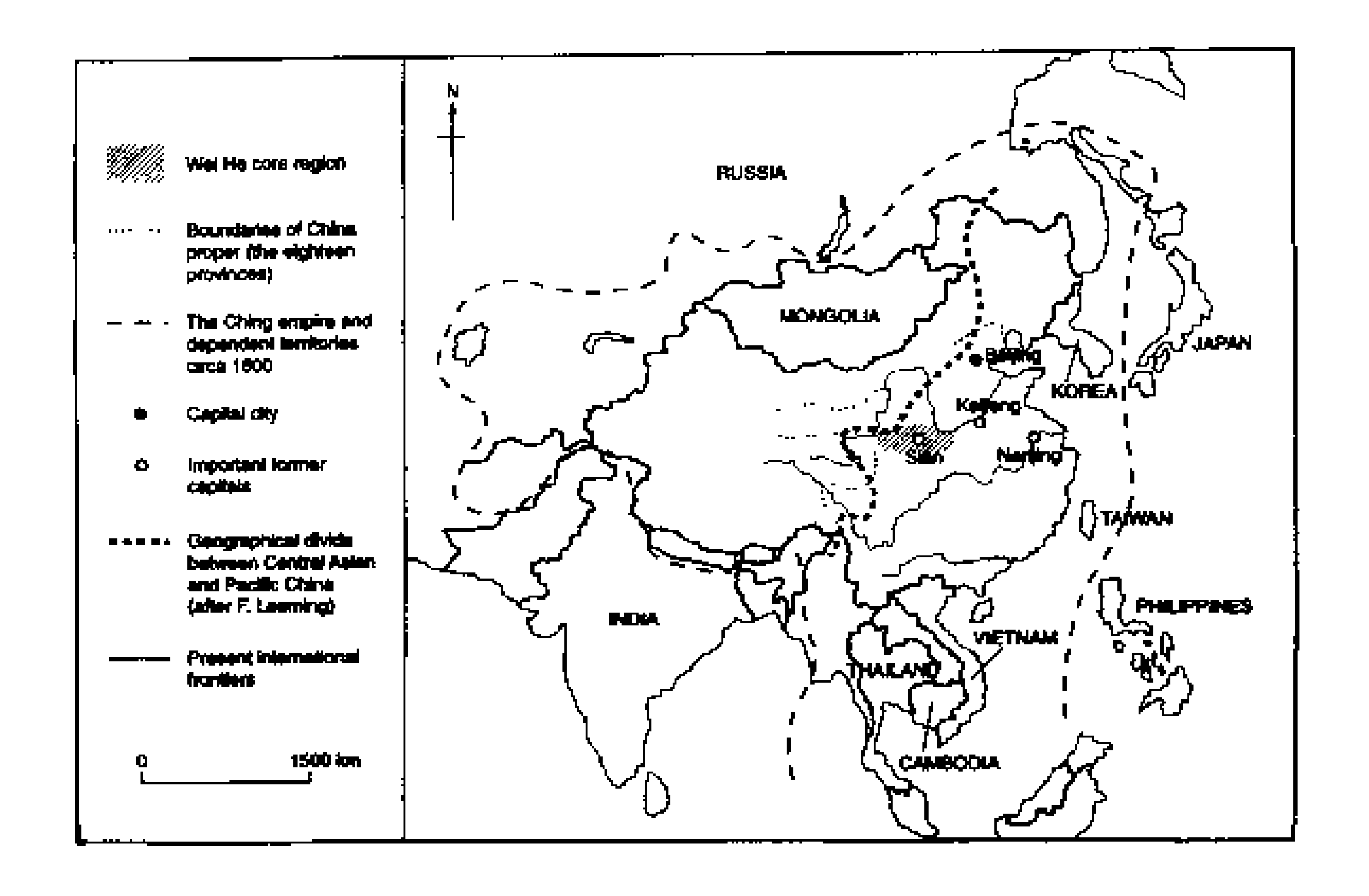


图 6.3　China and the Eastern ecume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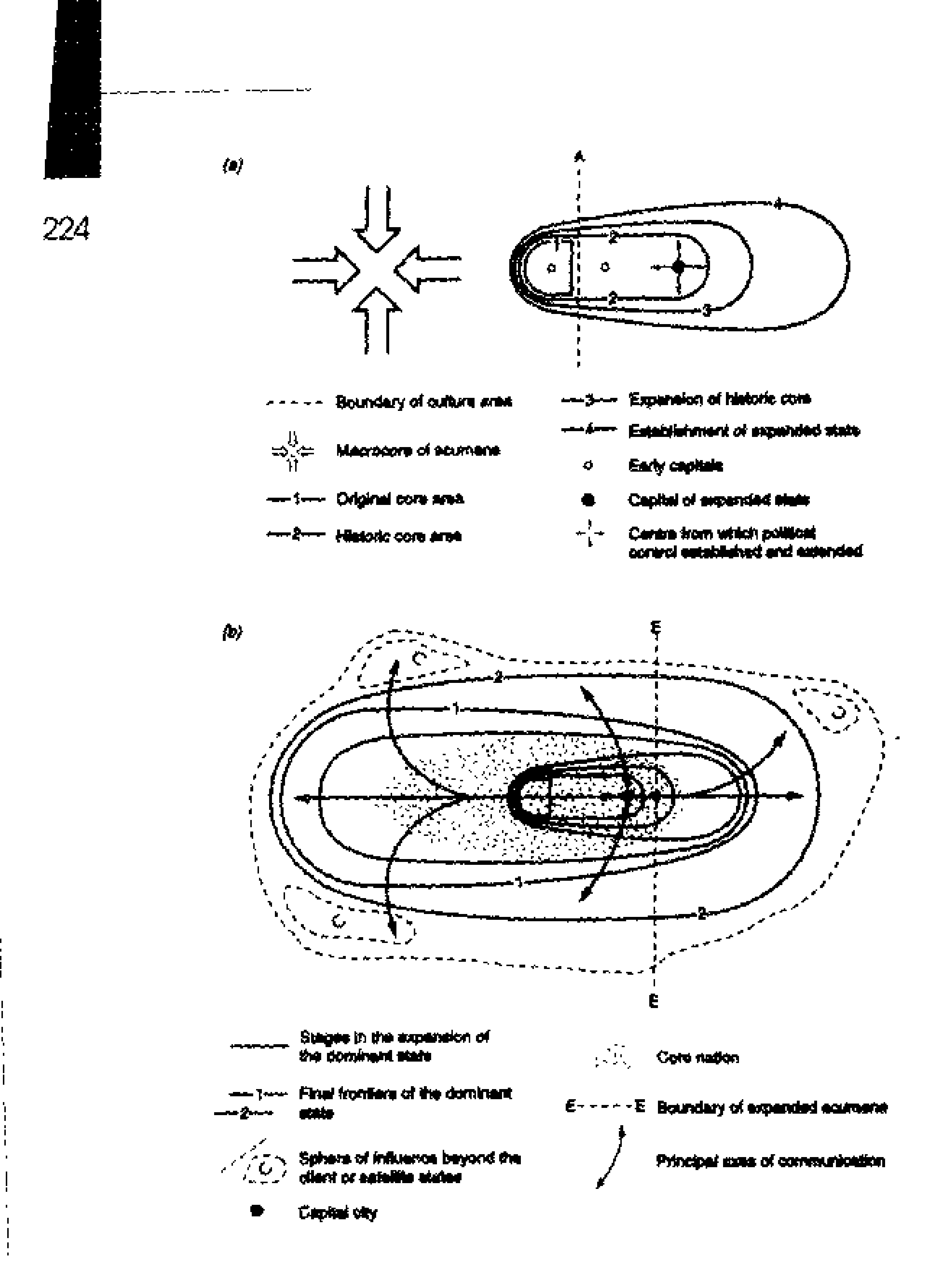


图 6.4 Geopolitical model of the universal state: (a) Early stages of territorial expansion (b) Completion of expansion
Adapted from Parker, G. (1988) The Geopolitics of Domination. London: Routled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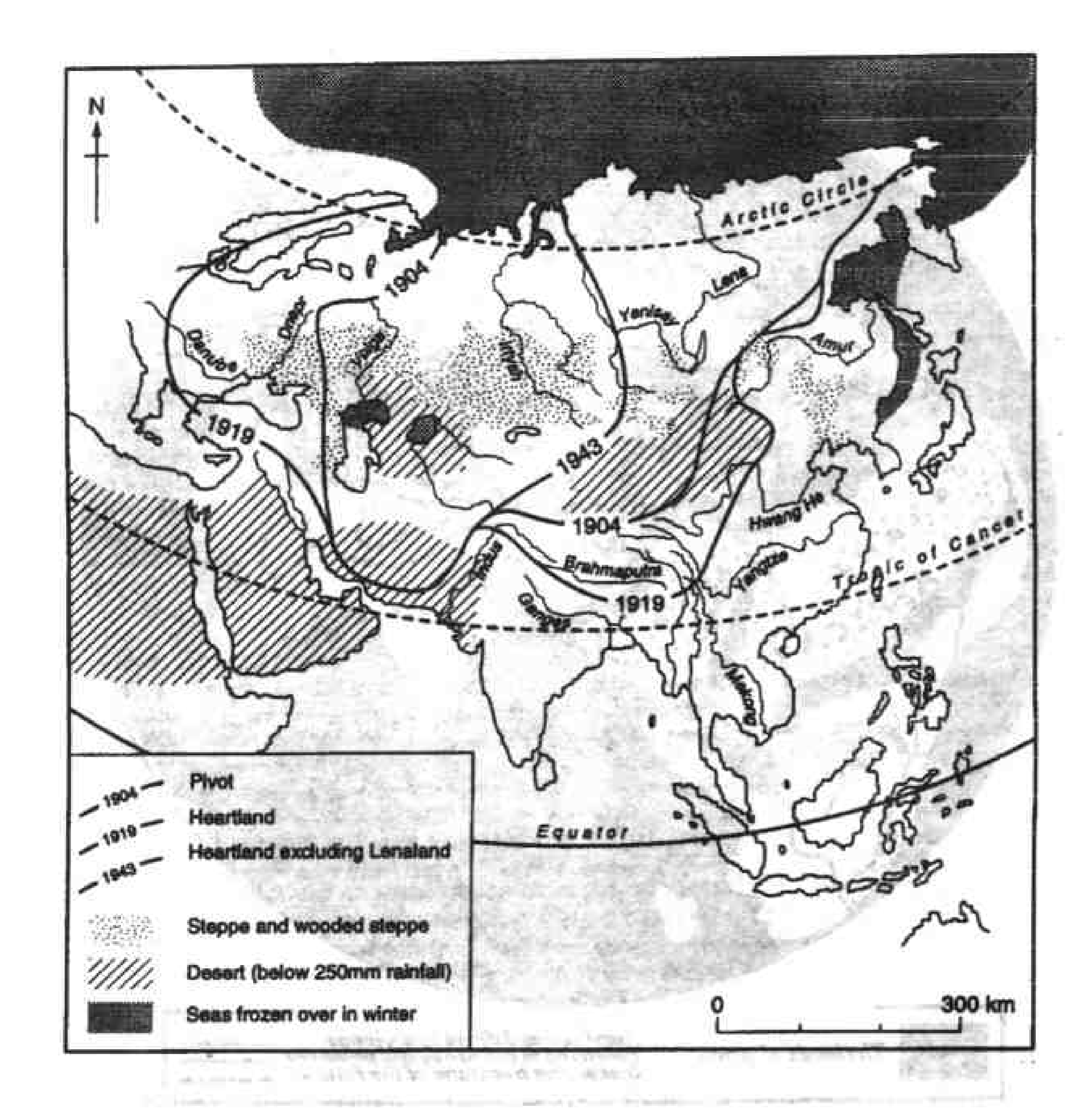


图 7.1　Pivot and Heartland



图 7.2　Heartland extended

Source: Fawcett, C.B. (1947) Herbertson Memorial Lecture. London: Geographical Associ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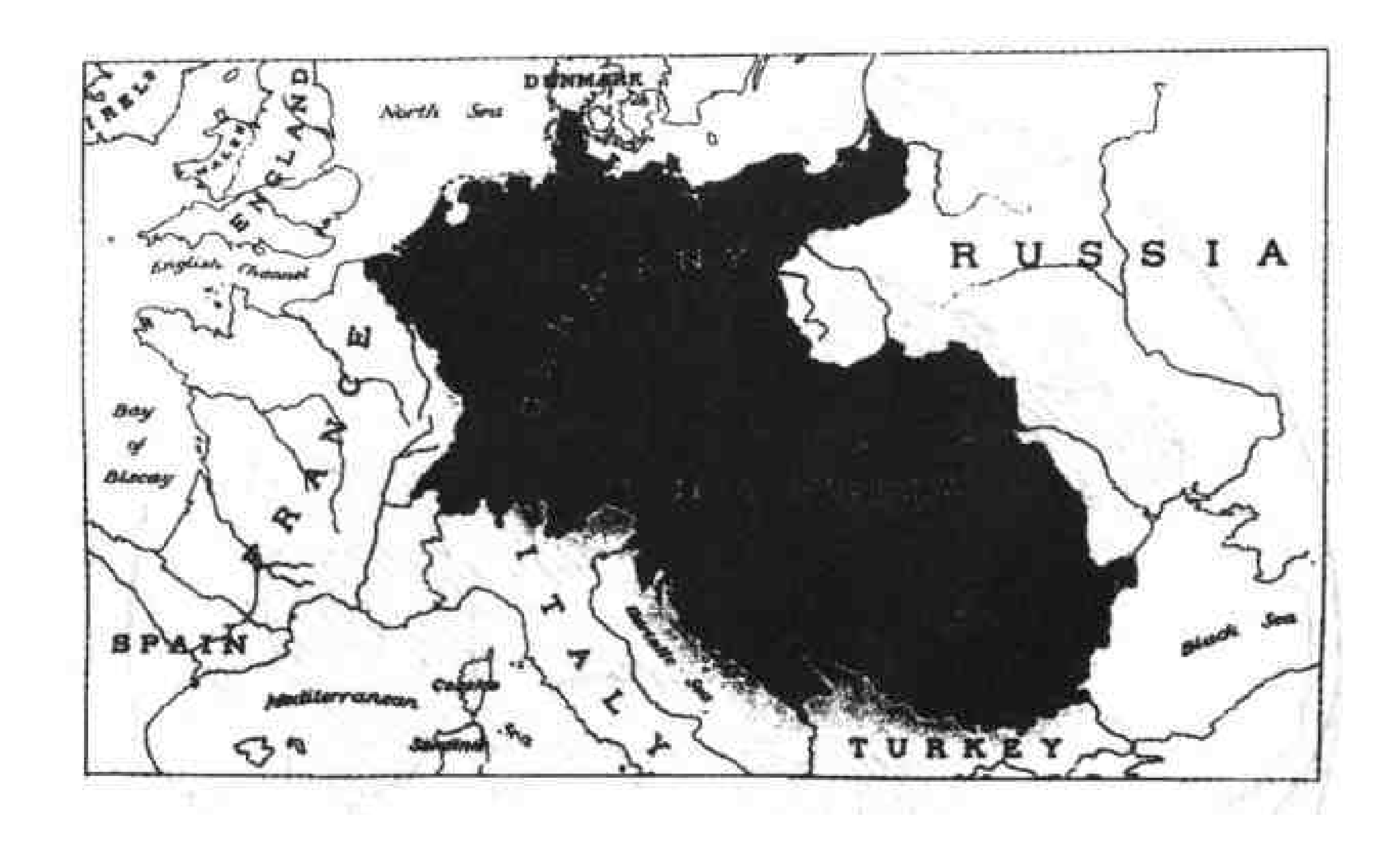


图 8.1　Central Europe according to Partsch

Source: Partsch, J.(1904) Central Europe. London: Heineman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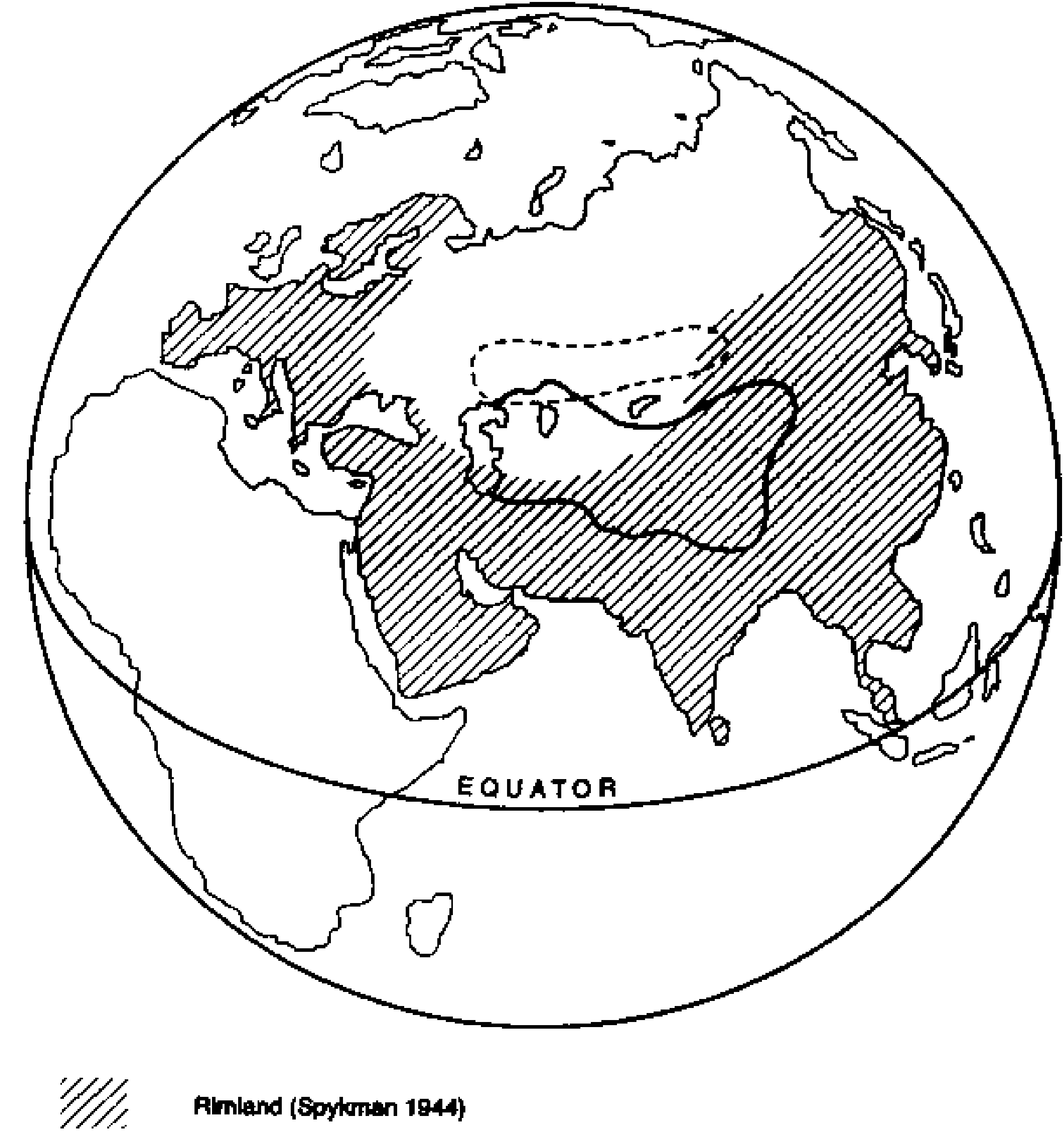


图 8.2　From Heartland to Rimland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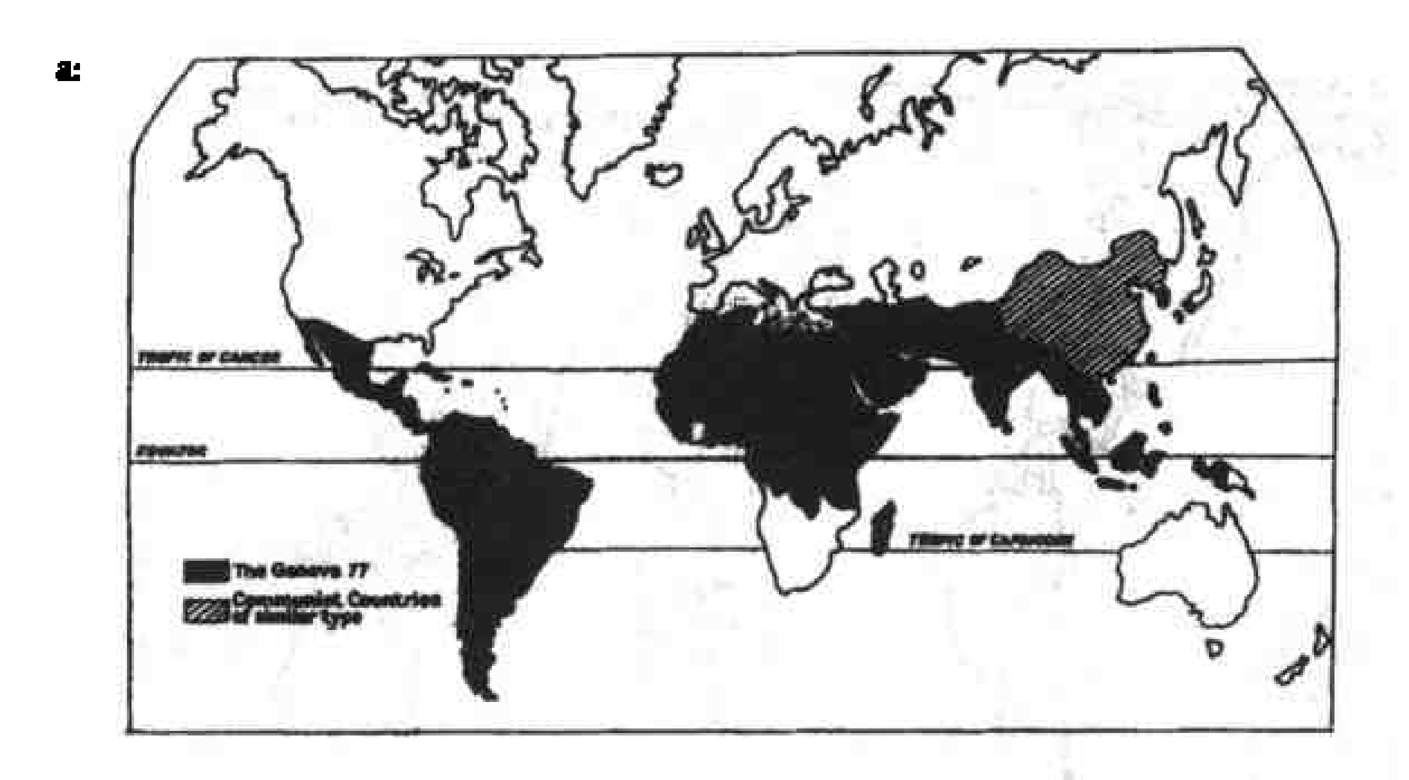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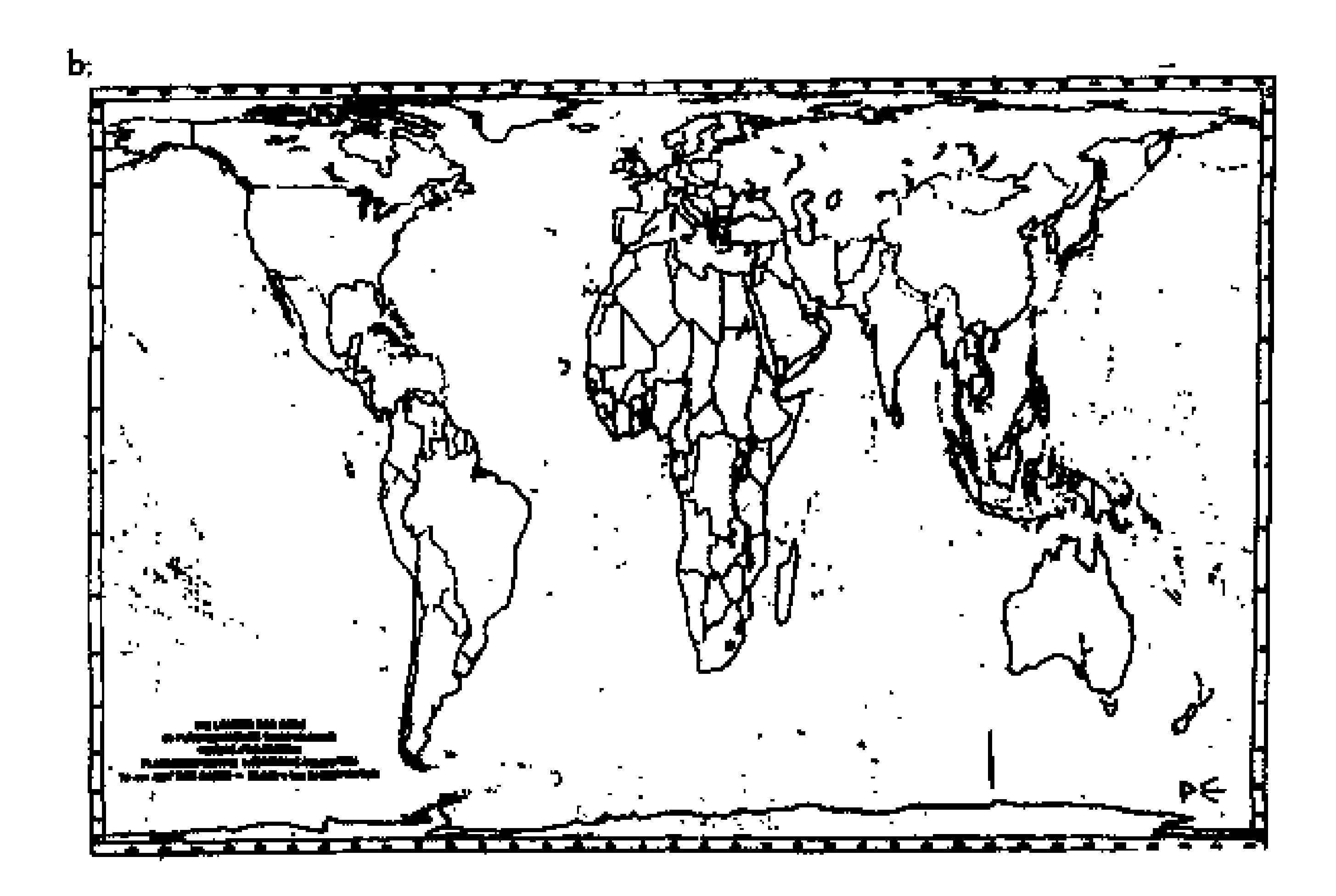


图 8.3 (a) The Third World in the 1960s. The 'Geneva 77' consisted of those countries which attended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held in Geneva in 1964. This gives a good indication of those countries which could then be considered to be members of the Third World.

b:



(b)The Peters projection. Arno Peters's decimal grid divides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into 100 longitudinal fields of equal width and 100 latitudinal fields of equal height. The map is then built up from the equator, so showing the world as viewed from a 'Southern' perspective.

Source of (b): Dr Arno Peters



图 8.4　The northern belt of settlement and movement

Source: Fairgrieve, J. (1932) 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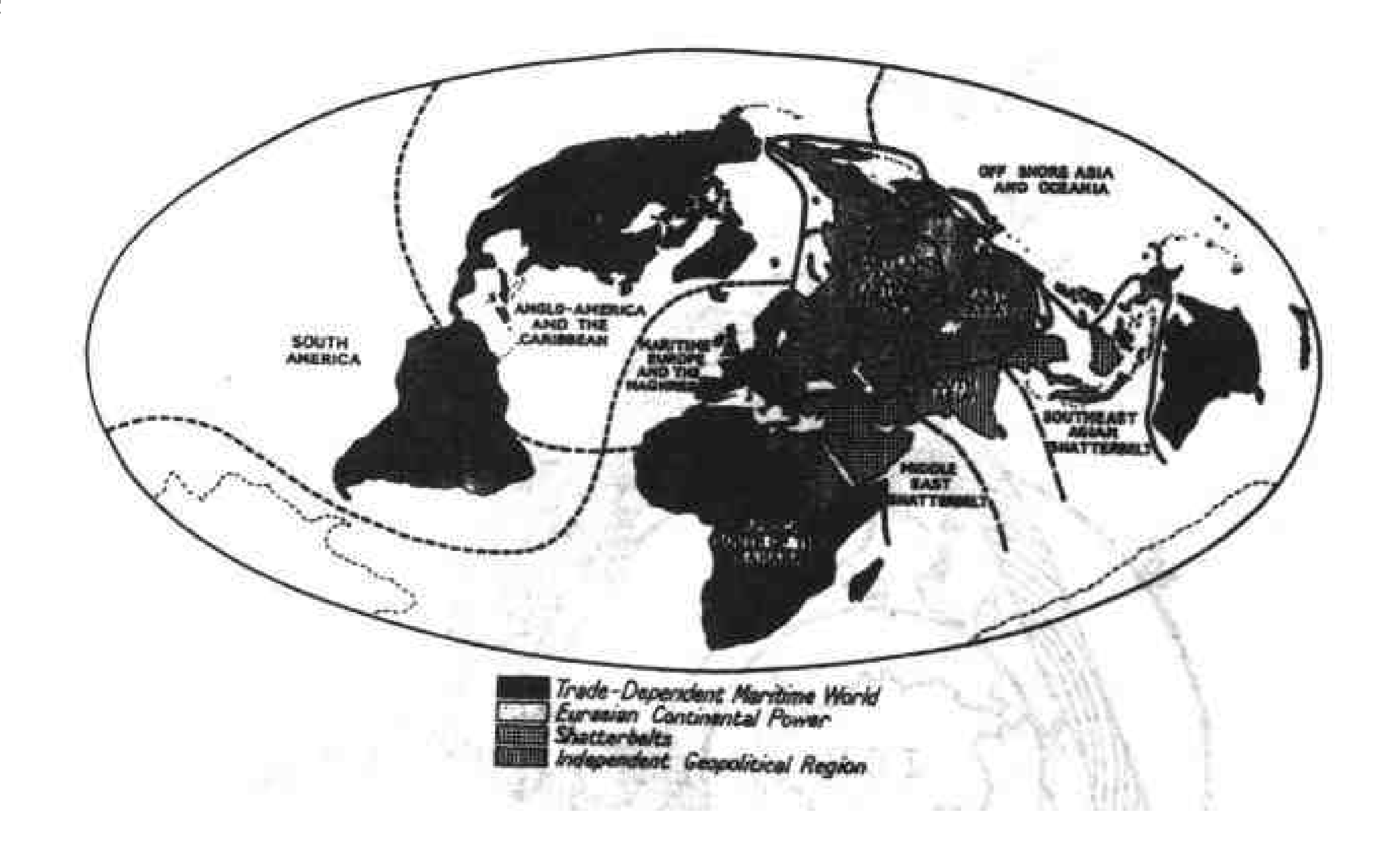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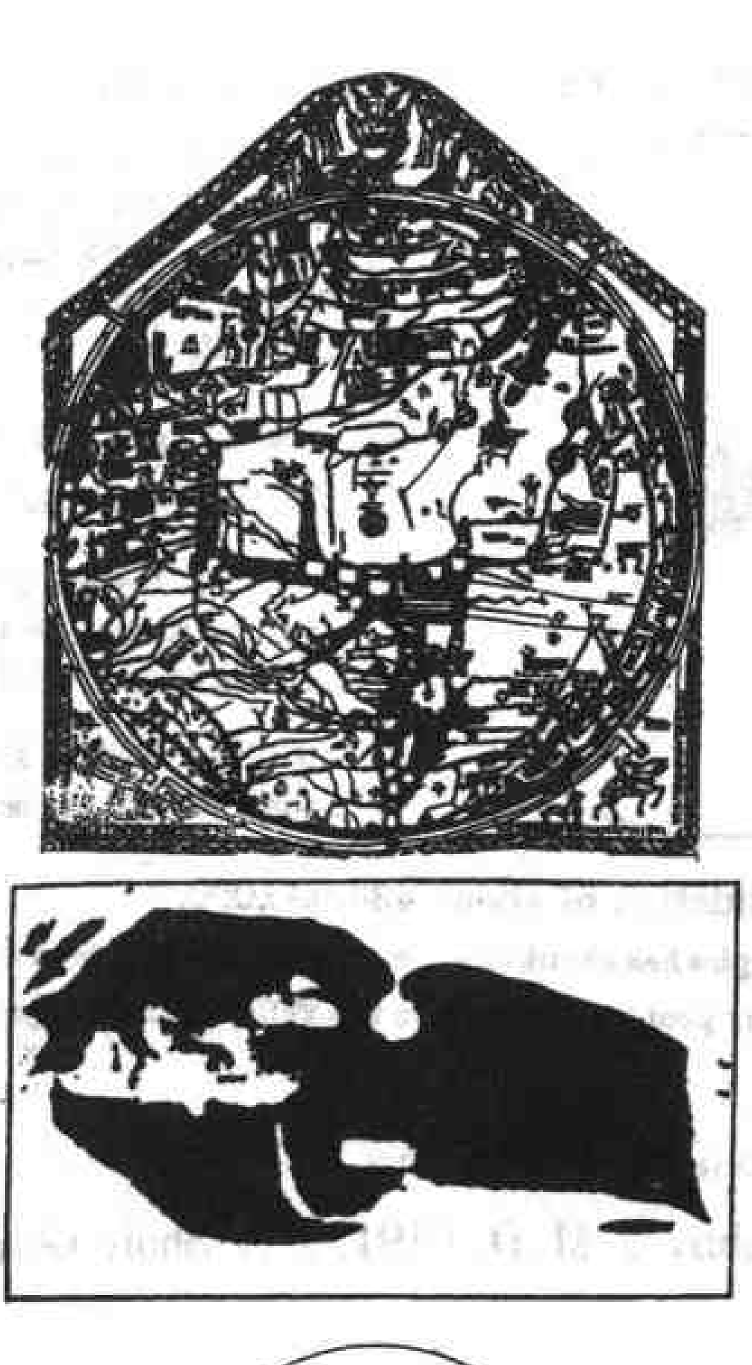


图 8.5 The world's geostrategic regions and their geopolitical subdivisions

Source: Cohen, S.B.(1964) 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a Divided World. London: Methu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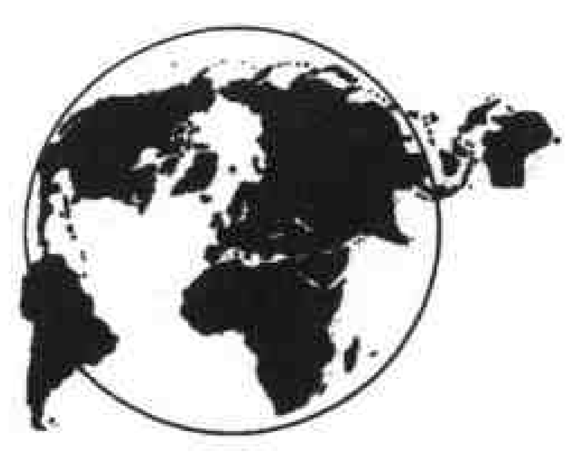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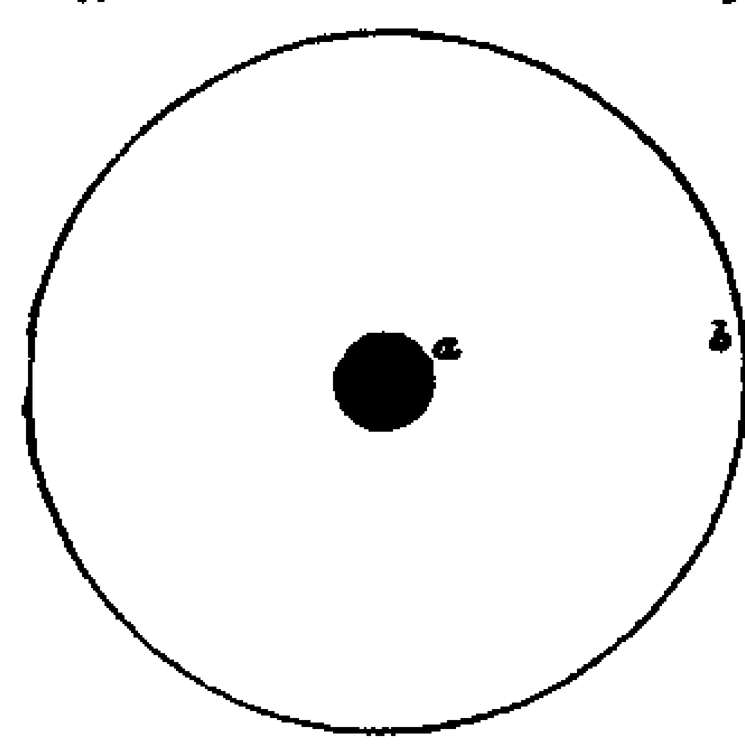


图 9.1　Changing centres and peripheries: Britain in the world

Source: Mackinder, H.J. (1902)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Se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i) 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never rises.



(ii) The British Empire is one hundred times as large as Great Britain. In this diagram, *a* is Great Britain; *b* represents the size of the British Empire.

2. It has an area of over 13,000,000 square miles.

(i) The British Empire is larger than the Russian Empire by above 4 millions of square miles.

(ii) The British Empire has about one-fourth of all the land on the globe.

3. It has a population of about 434,000,000.

(i) The British Empire has about one-fourth of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ii) The most thickly peopled part of it is the Valley of the Ganges.

图 9.2　The geometry of Empire

Source: Meiklejohn, J.M.D. (1913) A Short Geography. London: Meiklejoh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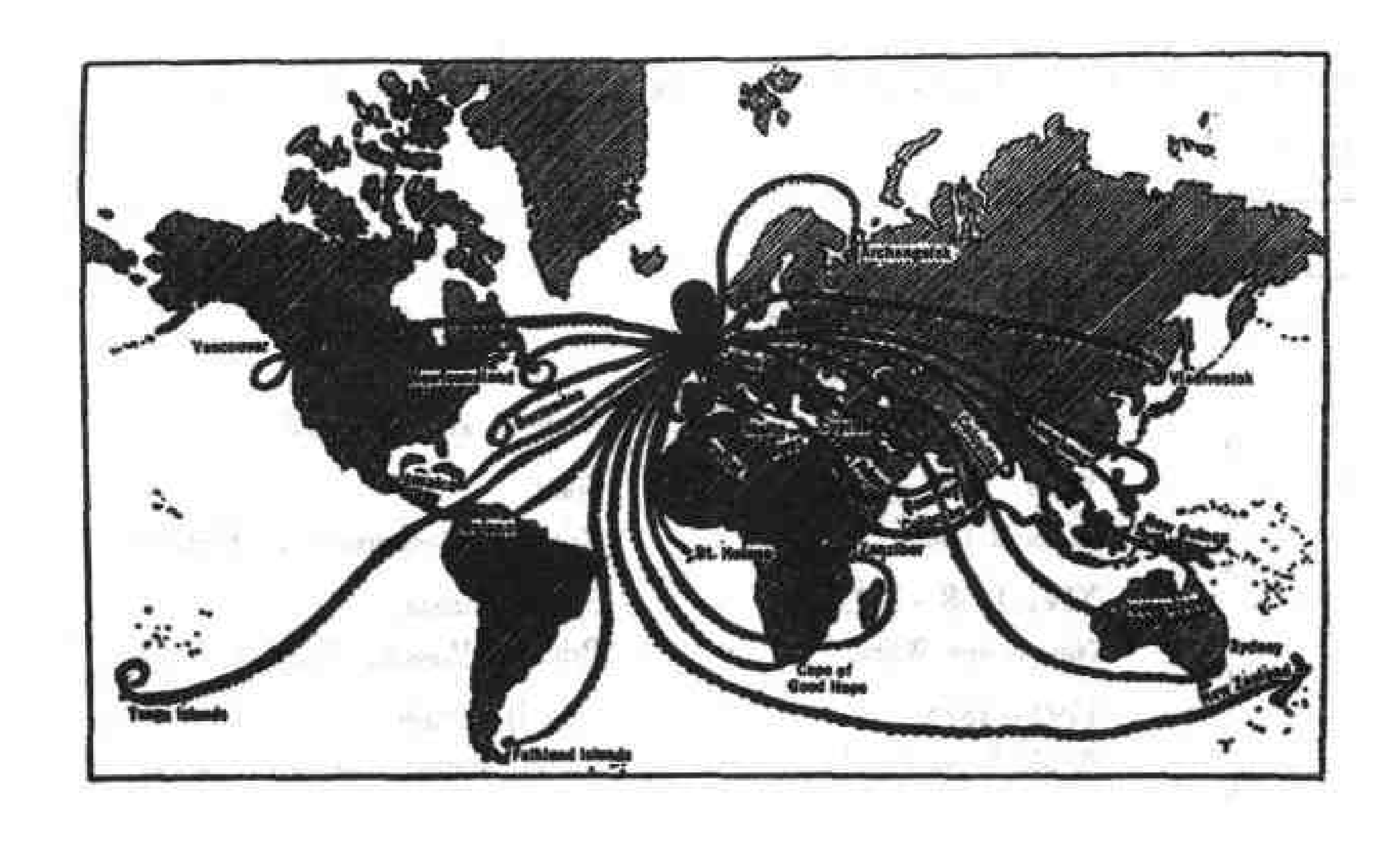


图 9.3　Haushofer's map of the British Empire

Source: Dorpalen, A. (1942) The World of General Haushofer.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表 9.1 World powers and global powers: the long cycles of conflict

Long cycle	Global war	Participating powers
1	Italian and Indian Ocean Wars, 1494 – 1516	Portugal; Spain; England; France
2	Dutch and Spanish Wars, 1580 – 1608	Netherlands; England; France; Spain
3	Wars of Louis XIV, 1688 – 1713	Britain; Netherlands; France; Spain; Russia
4	Napoleonic Wars, 1792 – 1815	Britain; Russia; France; Netherlands; Spain
5	World Wars i and II, 1914 – 45	United states; Britain; France; russia; Germany; Japan

Note: World powers are printed in bold type

Source: Based on 'Long cycles and global wars', in Modelski, G. and Thompson, W.r.(1988)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 – 1993. London: Macmill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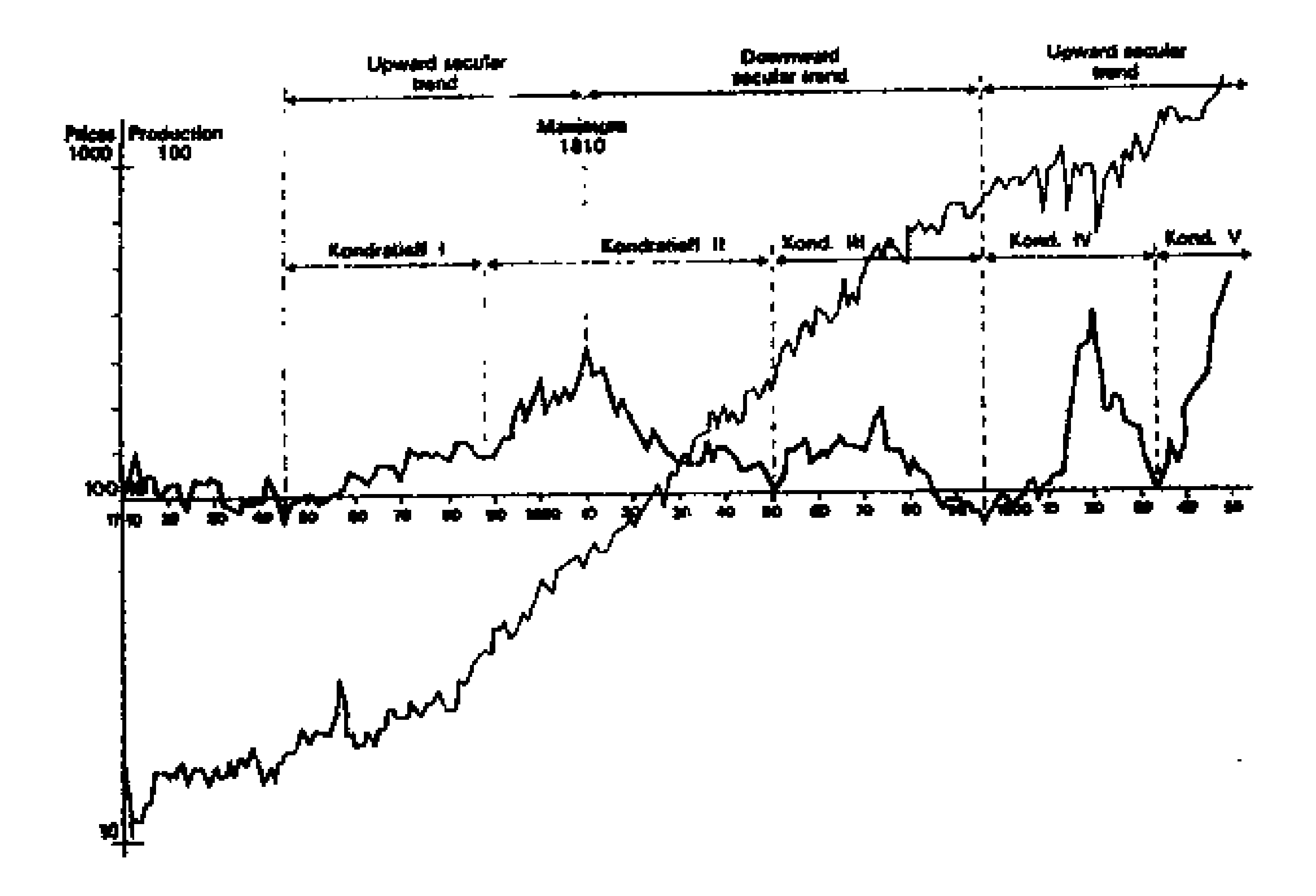


图 9.4　Kondratieff cycles and the secular trend. The graph, based in prices in Great Britain from 1700 to 1950, shows both the Kondratieff cycles and the secular trend. The production curve has been added.

Source: Based on Imbert, G. (1959) Des mouvements de longue duree Kondratief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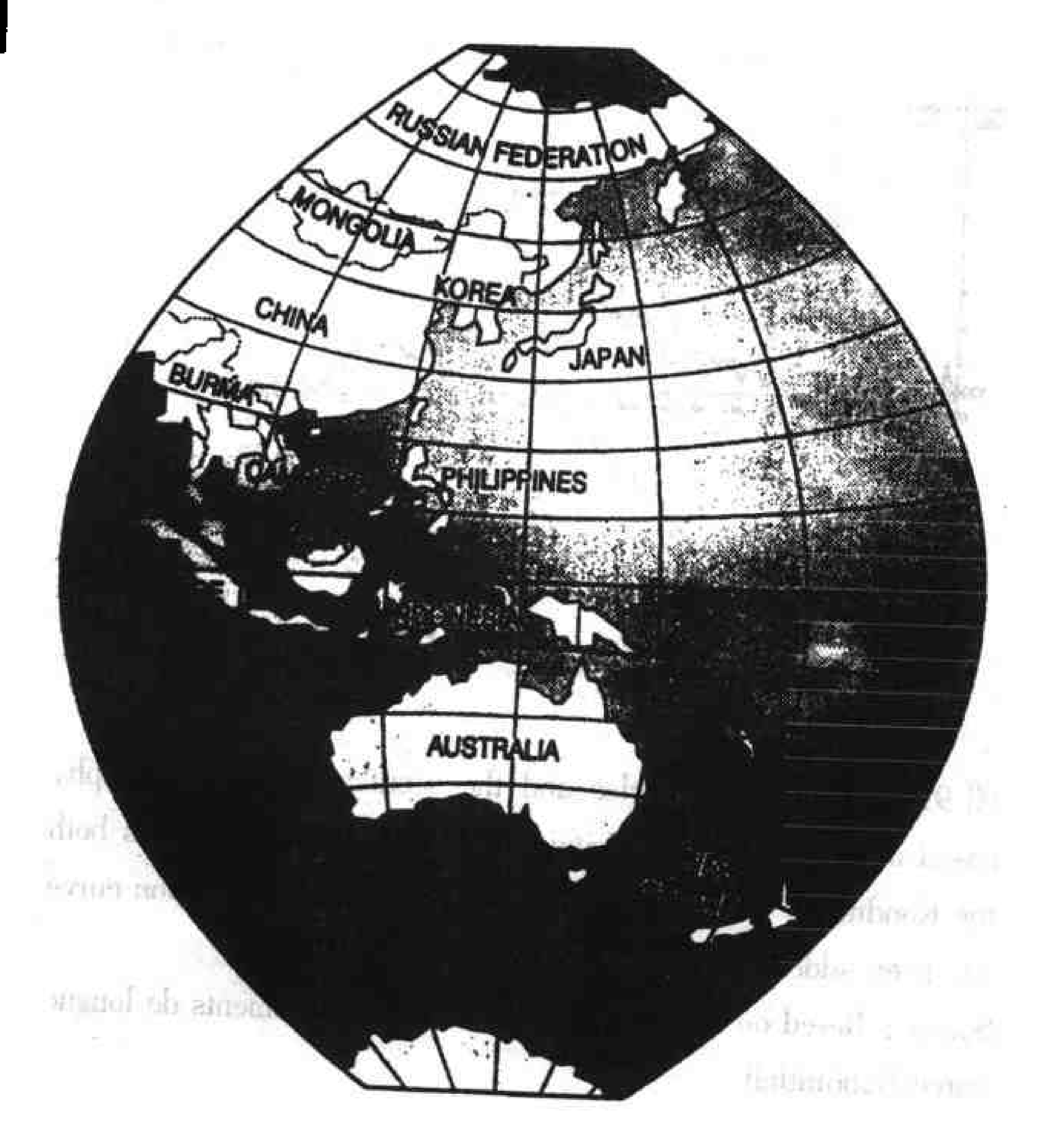


图 10.1　Australia's place in the world: the East Asian hemisphere. This Australian map represents an attempt to recast the country's identity, breaking free from its European past and forging a future within the Asia – Pacific region

Source: Based on official Australian sources,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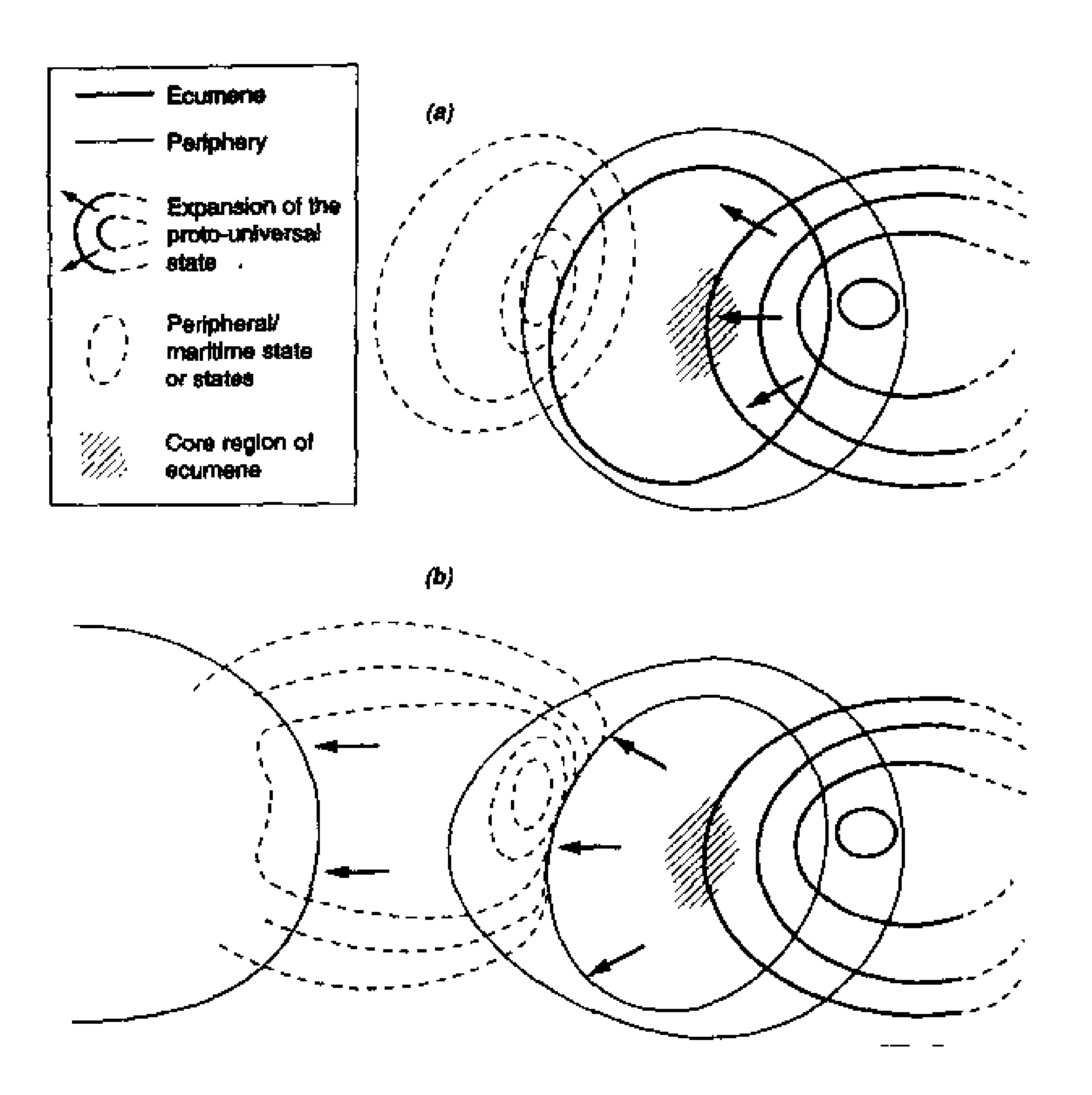


图 10.2 The Normative Geopolitical Process: (a) Stage 1: the territorial advance of the proto - universal state (b) Stage 2: the reaction of the maritime periphery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者＝
页数＝２３９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